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28 1959
9200/0212
V4 - V5 no3 (1951)

新建設

第四卷　第一期

學術工作者在愛國主義旗幟下的偉大任務(社論)
人民代表會議與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們國家的基本制度　宦鄉
論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形式　王學文
斥美帝單獨對日締和　林天摩
從西方哲學認識論的批判來學習「實踐論」　北大哲學系
「實踐論」——政治經濟學的道路　郭大力
「實踐論」解說　李達
資產階級優生學批判　方宗熙
國語語法綱要　趙元任
關於漢字的字音跟字形　林漢達
對資產階級法學反動本質的批判(學術講座)　蘇·H·Г蘇達里可夫
學習毛主席的「實踐論」(座談紀錄)　中國新哲學研究會

新建設雜誌社出版

一九五一年四月一日

學術工作者在愛國主義旗幟下的偉大任務（社論）……（一）

專著

人民代表會議與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們國家的基本制度……宦　鄉（三）
論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形式……王學文（七）
斥美帝單獨對日締和……林天摩（一〇）

學習「實踐論」

從西方哲學認識論的批判來學習「實踐論」……北大哲學系（一五）
「實踐論」——政治經濟學的道路……郭大力（二二）
「實踐論」解說（二）……李　達（二五）
資產階級優生學批判……方宗熙（三六）
國語語法綱要……趙元任（四一）
關於漢字的字音跟字形……林漢達（四四）

學術講座

對資產階級法學反動本質的批判……蘇·H·Г·蘇達里可夫（四七）

中國古代史討論

中國古代社會的早熟性……稽文甫（五〇）
半亞血族羣婚制——媵……丁　山（五二）
研究古代史料的一個新途徑……王　夔（五三）

譯 文

新編「哲學史」……蘇聯科學院哲學研究院 王子野譯（五四）

座談紀錄

學習毛主席的「實踐論」……中國新哲學研究會（五七）

學術問答

關於經學古文派與今文派的鬥爭，好像是一個學術鬥爭性質，爲什麼能與政治發生聯繫？古文派的反動性何在？今文派的進步性又何在？如康有爲又如何利用今文派進行改良主義的政治鬥爭？（宋雲彬答）……（六〇）
恩格斯批判費爾巴哈的唯物論說它是「下半個唯物論者，上半個唯心論者」，爲什麼恩格斯不說是：「上半個唯物論者，下半個唯心論者」？（陳珪如答）……（六一）
什麼叫做「土地賺買年」？它是如何計算的？爲什麼說中國土地賺買年很短？賺買年短，何以証明封建剝削之嚴重？（朱劍農答）……（六二）

書 評

關於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下）……彭澤益（六三）

學術文摘

毛澤東同志發展了眞理論……艾思奇（六八）
中國古代在天文學上的偉大貢獻……竺可楨（七〇）
數學是我國人民所擅長的科學……華羅庚（七一）
特載：在北京第三屆人民代表會議上的講話……劉少奇（七二）
本刊第三卷分類總目錄……（七五）

學術簡訊

科學院編譯局統一科學名詞工作近況——南京博物院發掘古墓祖堂山下發現南唐陵寢——方俊鑾研究高眞空獲得初步成就——蘇聯部長會議頒發一九五〇年斯大林獎金——波蘭出版大批馬列主義書籍——芬蘭出版『資本論』第二卷——美國進步作家法斯特新作——日本第二屆學術會議……（七七）
編後記……（六二）

社論

學術工作者在愛國主義旗幟下的偉大任務

在偉大愛國主義的旗幟下，中國人民已經結成了一座最堅固的鋼鐵長城了。

人民的愛國主義是新中國的歷史發展的動力。廣大人民愛我們的偉大祖國，愛我們國家的優越的人民民主制度，並且愛我們的國家的偉大前途，因此人民團結起來為保衛和發展我們的國家而奮鬥，為開闢我們國家的無限光明的前途而奮鬥。

全國的學術工作者也應該更緊密地團結起來，把愛國主義的精神貫徹到學術研究工作上去，使我們在愛國主義的社會實踐中不斷地開闢認識眞理的道路。我們的學術研究工作應該更好地為廣大人民保衛和發展我們的國家的實踐而服務；我們要通過學術研究工作來鞏固廣大人民對我們的偉大祖國的過去、現在和將來的正確認識，我們一定要不斷地提高新中國的理論水平和學術水平，發展民族的、科學的、大衆的新文化，使新中國的文化學術無愧於我們的在文化上有無限的燦爛成就的先人，並且在全世界進步的文化中成為重要的不可缺少的一個部分。

這就是新時代給予全國學術工作者的偉大而艱鉅的歷史任務，它要求全國學術工作者的通力合作，它要求每一個學術工作者進行忘我的智慧活動，它要求我們從今天起，把我們的研究室和圖書館都變為戰場和工廠。我們要不斷地爭先地以新的科學發明、新的學術創作和新的文化食糧，來配合和供應國防建設、經濟建設和廣大人民的迫切需要，我們要勇敢地保証來做人民的科學家、工程師、技師、醫生、著作家、文學家、藝術家和其他的學術工作者。

在現階段，我們每一個學術工作者的最大任務，就是要總結中國人民的鬥爭經驗，澈底完成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思想解放。我們一面繼續要同封建主義的落伍文化和帝國主義的反動文化進行毫不妥協的鬥爭，同時也要多方面地吸收古代優秀的民間文化（帶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和外國的進步文化。我們既反對妄自菲薄，也反對妄自尊大。我們要以至大的努力，掀起波瀾壯闊的愛國主義的文化建設運動，來發展我們民族的新文化和提高我們民族的自信心！

我們堅決相信，事實也已經證明：中國人民和蘇聯人民的聯合，使我們在反侵略的物質力量上無敵於天下；同樣地，在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照明之下，也一定能使我們在反帝國主義的精神力量上無敵於天下！

所以，我們願意號召全國的學術工作者，一齊團結在偉大愛國主義的旗幟下，高度發揮自己的才能和智慧，進一步展開和深入抗美援朝的思想教育，肅清一切殘餘的反動思想，來創造我們的輝煌燦爛的新民主主義文化！

我們的任務是光榮的，也是偉大的。讓我們高舉愛國主義的旗幟邁步前進吧！

專著

人民代表會議與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們國家的基本制度

宦鄉

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八日，劉少奇副主席在北京第三屆人民代表會議上的講話，對新民主主義國家制度的基本特點，作了非常寶貴的指示。我們特請宦鄉先生予以解說，並將劉副主席的講話全文，在本期內予以轉載。——編者

一

帝國主義者和反動派常常過低估計了中國人民的力量。他們太習慣於拿看待舊中國的眼光來看待解放了的、人民的新中國了，因此，他們就每每會忘記：中國人民已經有了自己的最有力的武器——人民民主專政。憑著這個武器，中國人民已經有效地把自己的力量組織了起來，把反對人民的反動份子壓倒了下去。

是的，我們的國家是一個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爲基礎、並團結各民主階級及國內各民族的、實行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對人民實行民主：創造一切條件，藉使過去被壓迫被剝削的人民大衆能在毀壞舊制度、建設人民民主主義新制度的偉大鬥爭中，儘量發揮其革命毅力、主動性和創造力；對反動派實行專政：利用人民的政權來堅決鎭壓被推翻的反革命階級，並組織武裝力量來防止並反擊帝國主義者的武裝干涉。這就是今天我們國家的最重要的特點。

人民民主專政的基本制度是人民代表會議與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我們的國家就是人民代表會議與人民代表大會制的國家。」（註一）早在一九四〇年的時候，毛澤東主席就已提出：「中國現在可以採取國民大會、省民大會、縣民大會、區民大會的系統，並由各級大會選舉政府。但必須實行無男女、信仰、財產、教育等差別的眞正普遍平等的選舉權，纔能適合於各革命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適合於表現民意與指揮革命鬥爭，適合於新民主的精神。」（註二）到了一九四五年，毛主席又再度提出：「新民主主義的政權，應該採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決定方針，選舉政府。」（註三）由毛主席所製訂的完全適合於中國目前國情的人民代表大會（在未普選前由人民代表會議代行其職權）制度，現在已經爲全國人民所擁護、所接受，並具體肯定地規定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共同綱領之中（請閱共同綱領第十二條）。成爲我們國家目前的根本大法。

我們國家管理的最高組織原則是民主集中制。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第二條很明確地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基於民主集中原則的人民代表大會制的政府。」共同綱領第十五條則對於各級政權機關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有了更詳細更具體的規定。

一個民主的、人民的組織，要求一切人民的目的、意志和行動完全一致。這就是說，要求集中化。如果沒有集中化，如果不以一個統一的目的來團結起社會的一切民主力量，不由一個中心來領導人民民主主義的事業，那是不可能成功地建設我們的人民民主主義國家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精神就在於：這個制度「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說，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只有這個制度，既能表現廣泛的民主，使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有最高的權力；又能集中處理國事，使各級政府能集中的處理被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所委托的一切事務，並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動。」（註四）

只有建基於這樣的民主集中制之上的人民代表大會制的政府，纔能充分發揮一切民主階層的人民的意志，也纔能最有力量去反對反革命的敵人。只有切實貫徹這樣的國家制度，纔能保証我們的國家和人民的長遠勝利。

二

由於各方面的具體條件還沒有完全成熟，我們還不能一下子就在全國範圍內實行普選，普遍地建立普選的人民代表大會。在我們的國家裡，革命戰爭還沒有完全進行到底；封建勢力雖已在基本上被打倒，但在若干地方仍在作着相當頑強的反抗，階級鬥爭隨着人民民主主義的改造而益形尖銳；人民的覺悟雖然日漸提高，但是在若干地方，我們還不善於幫助大家克服其落後方面的、並加强其進步方面的要求，增加其國家主人翁的責任感。由於這些缺點的存在，我們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建設，就不能不採取實事求是、逐步前進的方針。

首先，在程序上，共同綱領第十四條規定得很明白：「凡人民解放軍初解放的地方，應一律實行軍事管制……並在條件許可時召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在普選的地方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以前，由地方各界人民代表會議逐步地代行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凡在軍事行動已經完全結束，土地改革已經完全實現，各界人民已有充份組織的地方，即應實行普選，召開地方的人民代表大會」。這就說明，民主建政一般地需要經過這樣四個階段：第一步，軍事管制；第二步，召開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第三步，逐漸由人民代表會議代行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第四，也是最後一步，在條件完全成熟的時候，召開普選的人民代表大會。

其次，在代表會議的民主基礎問題上，採取逐步擴大的辦法。一般地講來，代表會議代表的產生最初由軍管會或（及）地方人民政府決定；第二步由軍管或（及）地方人民政府和上屆的協商委員會共同商定；第三步：在有組織的人民數量增加了之後，則舉行人民直接選舉或代表會議選舉；以後並視具體情況逐步增加選舉出來的代表，減少協商邀請的代表；最後是所有的代表完全由選舉產生，成立人民代表大會。（註五）

再次，在代表會議的職權問題上，也是採取逐步充實、逐步增加的辦法。最初的人民代表會議只是軍管會或（及）地方人民政府傳達政策、聯系羣衆的協議機關，其職權是相當有限的；後來就逐步代行人民代表大會的如下職權：一、聽取與審查地方人民政府的工作報告，決定地方的施政方針和政策；二、審查與通過預決算；三、建議與決議有關地方的興革事宜；四、向人民傳達並解釋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決議案，並協助政府動員人民來執行；五、選舉地方人民政府委員會。（註六）

復次、在會議的組織方式和進行形式上，也是採取穩步發展、逐次改進的辦法。在剛召開人民代表會議的時候，不去制定一套複雜難行的會議規則，組織條例之類的東西，也不去斤斤計較於這樣或那樣的儀式，而是因應當時當地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逐步逐次地使組織形式完備起來。在討論問題的時候，也是從人民最切身有關的實際生活出發，而不從條文和形式出發。在解決問題中慢慢求得形式的改善。

最後，在重點上，目前民主建政的工作，重心是放在縣人民代表會議的建立上。「縣做好了，縣下的鄉單位都易於做好。」（註七）縣做好了，省一級的人民民主制度也可以更見改進。

至於中央，則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未能普選召開以前，其職權是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全體會議來代爲行使。直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之後，人民政協纔退後於「對中央政府的工作起協商、參謀與推動的作用」的地位。（註八）

根據截止於去年十二月底止的統計，全國二千零六十八個縣中已有一千九百六十一個縣，全國五十八個旗中已有四十六個旗開過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其中九十個縣、五個旗的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已代行了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卄三個縣已舉行了人民代表大會。（註九）縣以下的區和鄉村政權，在老解放區一般均已開過人民代表會議或人民代表大會，在新解放區已普遍或正在召開農民代表會議。此次、到去年十月爲止，中央和大行政區直轄市及省和行署直轄市，全已召開過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其中七個中央和大行政區直轄市及十三個省轄市已代行了人民代表大會職權，并有兩個省轄市已召開了人民代表大會。至於省級，則已有十三個省和三個行政區開過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其中十個省和兩個行政區的已代行了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註十）

根據前述的實事求是，逐步前進的方針，全國各級人民政府、各民主黨派以及各民主階層的人民，正積極努力，要把各級人民代表會議實際地而不只是形式地建立起來，使它們能在政治上和組織上更廣大更密切地聯系各民主階級的人民羣衆，在組織形式上也逐步地使它完善起來，以便能在最近幾年內使目前的各級人民代表會議過渡爲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完全能够代表人民行使各級政權的人民代表大會。

三

我們新民主主義的人民代表會議及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若與任何舊民主主義的所謂議會制度相比較，那是更新、更高、更優越、更民主的形態。

第一、在中國歷史上，我們的人民代表會議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第一次給予佔全國絕大多數人民享受的民主制度。在我們的國家中，中央政權機關與地方政權機關都是由壓倒多數的工人、農人、勞動知識份子以及各民主階級的代表人所組成的，這就是我們人民代表會議與人民代表大會的力量與優越之所在。我們的代表會議和代表大會不僅具有廣泛的代表性，而且由於它們是對反革命派實行鎮壓實行新式專政的機構的緣故，所以也具有很大程度的純潔性。正因這樣，所以我們的人民代表會議和代表大會纔能眞正成爲人民利益的最可靠的代言人與保護者。

像我們這樣的民主制度，不僅爲中國四千年來所未有，就在全世界舊民主主義的國家內，也從來不會有過。舊民主國家雖也有多種多樣的民主形式，但歸根結底，都只是資產階級的專政，都只是爲少數（在廣大人民中眞正是一小撮）地主資本家的利益服務，同時對一切勞動者——尤其工人階級施行鎮壓的工具。因此，它們的民主便不能不是「殘缺的、醜陋的，假冒的民主制……只供富人享受，只供少數人享受的民主制。」（註十一）

第二、我們這個制度實行一年多來的效果，已經引起了人民的一種從未得有的新愛國主義，發揚了人民的智慧與積極性，幫助了人民的自我改造與自我教育。廣大人民不僅覺悟到自己是國家的主人，有管理國家的權利，而且感覺到有責任要把國家搞好；不僅熱愛自己的政權，而且嚴格地批評、監督、糾正各級政府人員中某些偏差的作風和官僚主義；代表們不僅在會上負責，在會後也同樣負責，不僅自己帶頭做，而且宣傳其他的人也做，從而做出了不少爲少數人所不易或不能完成的工作。而且，每經過一次會議，人民與人民間、人民與政府間、各民主階級相互間，各民族相互間的聯系與團結，都前進一步；集體智慧與集體力量的表現也前進一步；連會議的組織與方式也都一次比一次好。

像這些情形，我們可以引證許多具體的例子來證明，假如不是爲篇幅所限的話。這就告訴我們，人民民主制度已經顚破了反動派過去一貫的胡說八道，他們以爲從人民中出身的人是不能管理國事的。各地各級人民代表會議與代表大會的日常生活與活動，很明顯地，使人深信不疑地證明：中國的人民羣衆是在日益積極地，決定性地，參予着國家政務的管理。在過去的中國固然不會有這種事情，就在任何一個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也從來不會有過這種事情。

第三，中央與地方之間的對立及其解決，幾百年來，無論在中國，或在西方的資本主義國家中，都是一個令人頭痛萬分的問題。這是因爲，私有制（在過去的中國來說，是封建制度和帝國主義的陰謀分化）和由它所產生的全體和個人競爭，爭奪的力量，造成了地方與地方之間，地方與中央之間的互不信任乃至分裂、衝突。

由於人民代表會議和人民代表大會制的執行，這個問題，現在在中國是已經基本上得到解決了。在我們的國家中，「中央」與「地方」的關係，是建立在利益的一致與完全合作的基礎上面；因爲有以共產黨爲首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領導，所以這些基礎是具有保證的。

我們國家所採用的民主集中制，也是消滅這個矛盾的一個主要因素。共同綱領第十五條的規定，把整個國家以及國家內部的各個地方的利益、需要和要求結合起來，取消了狹隘的地方利益和全國利益的對立，取消了一切分裂的力量。

第四、我們的人民代表會議和人民代表大會，在其處理事務的辦法上，也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會有所不同。我們的人民代表們，一般的說來，雖在選出之後被吸引參予政務的實際工作，但仍然還是工業、農業、經濟、文化、國防以及其他的工作人員。他們因此不僅參加國事的決定，而且也參與其施行。人民民主的民意代表機關不能像資產階級的國會那樣，是一個不斷開會，而且一開會就是空談多少天的機關；它們只是定期召集（一年三四次），會期很短，每召集一次就必須解決若干具體問題的機關。因此，我們的代表們是與資本主義國家的議員們完全不同的。後者是職業的國會人員，脫離了人民，脫離了實際任務，他們的作用只限於在國會中演說和表決；而前者則參予着國家的實際工作。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會是不工作的高談闊論的機關，眞正的國事必須在幕後去辦；（註十二）而我們的人民代表大會則是依照民主集中制組成工作的集體。

第五、我們人民代表會議和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們，也和資本主義國家的議員們完全不同。

首先，他是在民族完全平等，男女完全平等的基礎上選出來的；而這一點，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就絕對沒法辦到，也不可能辦到。

其次，我們的選舉方法保證了眞正人民的代表可以當選。由於中國大多數人民——主要是勞動人民的不識字和過去沒有選舉經驗，因而也就暫時離於眞

正很充份地關心選舉，我們暫時還不能採用那束縛人民的過份着重的新式的選舉方法。但是，我們知道，勞動人民雖然不識字，但對於誰是朋友，誰是敵人，誰可當代表，誰不配當代表，却是鑑別得極嚴格的。所以，只要他眞能選舉他們所樂意的人去代表他們自己，就不必斤斤較量於選舉形式。這樣，我們現在所採取的還是舉手表決的方式，而不是那一時不容易辦通，辦得不好時甚至會損及人民的積極性的「普遍、平等、直接、無記名投票」的方式（註十四）

我們的代表們是人民的勤務員，必須對自己的選民負責。他在他的選區裡工作，和他的選民們經常見面，要向他們反映政府的政策，同時又要向政府反映選民們的意見。他必須經常地、密切地和選民聯系，否則被選民嚴厲地直接地監督着的他，就很有可能失掉選民的信任，其結果他可能在任期未滿時隨時被選民召回。（註十五）

像這些情形，在資本主義國家中，是不會有的。在那裡，議員是獨立的，不對其選民負責，一經當選，便誰也不能動他。所以我們的制度比起他們來，那的確是「民主」得多了。

前面所說的五個特點，僅舉出其犖犖大者，已在根本上把我們的人民代表會議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與資本主義國家的舊民主制度劃分開來，區別開來。這些特點，顯示出眞正的人民民主制對於資本主義國家的形式上的澈底虛僞的「民主」制度的無比優越性。雖然是這樣，我們還必須指出，我們的這個人民民主制度還只是向着眞正人民民主目標前進途中的第一步。我們還得加倍努力，早日走完新民主主義，進入社會主義，然後才能眞正體現「民主制度的最高形式」，成爲「最高類型的民主國家」。（註十六）

四

人民代表會議及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在全國範圍內施行了一年多以來，已經完成了許多重大的任務。

在目前這一階段上，我們國家的基本任務是：鎭壓被推翻了的反革命派的反抗；保衛國家以防衛外國武裝干涉者的進攻；恢復工農業生產，準備實行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建設，逐漸替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化準備基礎和條件。

基於這三個任務，我們的國家於今是處在三大運動的高潮之中，這三大運動就是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鎭壓反革命。不把這三大運動很好地很深刻地進行到底，就不能解决新民主主義的建設問題。至於在經濟建設方面，我們今天還在「三年準備」的階段。

要把這三大運動勝利地貫澈到底，那是非依靠全國人民羣策羣力，共同做去不可的。一年來的經驗証明，人民代表會議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聯系羣衆、加强團結、提高覺悟、增進效率、推進工作，和克服困難的最好的基本組織形式。所有與這三大運動有關的政府措施以及各地各級人民普遍與迫切的要求，假如，反帝愛國、剿匪滅特、減租退押、土地改革、徵糧收稅、救災渡荒，以及生產的恢復與發展等等，只要是經過人民代表會議或人民代表大會討論通過，取得了人民全心全意的支持的，就一定能做得非常之好；反之，就一定不容易做好，或者是事倍功半，化了力氣而仍然做不好。

我們的政策要求我們把這三大運動更向前推進一步，提高一步，因此，也就要求我們把人民代表會議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也向前推進一步，提高一步，以求更加發揚人民羣衆的無限智慧和偉大力量，來實現政府的政策，勝利完成我們當前最光輝偉大的任務。因此，各級政府必須懂得「依靠人民代表會議和人民代表大會這一有偉大功效的制度，把全國人民緊密地團結在各級人民政府週圍，在中央人民政府的統一領導之下，形成爲一個强大的統一的力量，去履行我們全國人民迫切需要履行的建設任務和國防任務。」（註十七）

在我們國家進入以經濟建設爲最中心的任務的時候，更需要我們堅持并發展人民代表大會的新民主主義制度。劉少奇副主席說得好，「新民主主義的政權建設，人民民主政權的發展，我們國家的民主化，和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建設，人民經濟事業的發展，我們國家的工業化，是不能分離的。沒有我們國家的民主化，沒有新民主主義政權的發展，就不能保障新民主主義的經濟發展和國家的工業化。反過來，新民主主義的經濟發展和國家的工業化，又要大大地加强和鞏固新民主主義政權的基礎。……在我們這裡，民主化與工業化是不能分離的。」（註十八）

劉副主席的這一段話，很正確地指示出了我們人民代表大會制的國家在我們新民主主義的經濟發展中的決定性的作用。資產階級國家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或者只能促進經濟發展的自發過程，或者只能阻礙它。（在帝國主義階段，資產階級國家的作用則是阻礙社會發展的反動力量。）我們人民民主主義國家在經濟上的作用，並不只限於促進國家經濟的發展，而更重要的是自覺地、有計劃地，根據已認識的人民民主主義經濟——社會主義經濟——共產主義的發展規律，來主動領導國家經濟的發展，（下轉第24頁）

論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形式

王學文

新民主主義經濟形式在「共同綱領」中明確地規定是：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個體經濟五種形式。

一　國營經濟

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不叫社會主義經濟，因爲我們是處于新民主主義時代，還沒有進到社會主義，在用語上應當有分寸，但是我們的經濟已帶有社會主義的因素，國營經濟就是新民主主義經濟中的社會主義的因素）。

爲什麼說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呢？

（一）從生產系統上來看。在國營企業裡，凡是參加生產的，做經濟工作的，在生產系統上是處于平等的地位，沒有階級壓迫沒有階級剝削。管理人員和工人的關係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不是老闆與僱傭者的關係，不是剝削與被剝削的關係。某某做了廠長，處長，科長，是因爲他具有這種能力。只要努力做得來做得好，誰都有當廠長處長等等的希望。在國營企業（如工廠、農場、鐵道等裡），生產者都是主人。過去企業爲四大家族所掌握的時候，人民是沒有份的。在四大家族的統治下，生產力不能發展，妨礙生產力發展的四大家族現在已被打倒了，新的生產關係建立起來，生產力得到了解放。這個新的生產關係和解放了的生產力是一致的，構成了新的生產方式。

（二）從生產手段的所有關係上來看。國營企業的生產手段（機器、原料、房屋等等）爲國家所有，是國家的財產也即爲人民所有，是人民的財產，人民有權過問，人民有權管理。在人民中居於領導地位的工人階級，直接是國營企業的主人。

（三）從勞動組織上看。在勞動組織上工人都起着同樣作用，已不是另外的階級（或其代表）在那裡指揮管理，而是自己的本階級在那裡指揮管理者。

（四）從生產結果上看。生產結果爲國家所有，也即爲人民所有，參加生產的都有份，沒有剝削與被剝削的關係。

從這四方面來說，國營經濟是屬於社會主義性質的。

國營企業包括許多方面：在生產方面，首先是工廠，有重工業（鋼鐵、機器、發電廠等），有輕工業（紡織、造紙等等），國營工廠在東北比較多；其次是國營農場，使用新式機器生產（如用拖拉機耕地，電力灌溉等），在東北、華北津沽農墾區、石家莊、華東都有。在交通方面，有鐵路、公路、郵政、電報電話、輪船、航空等，這些有的是全部國營（如鐵路、郵電），有的是部份地國營（如輪船、汽車）。在商業貿易方面，有專業的出入口公司、百貨公司、花紗布公司、糧食公司等等。金融方面，有中國人民銀行等，由國家直接經營管理。

按照中央人民政府的經濟政策，國營企業必須發展，並且努力在發展着，只有發展國營經濟，才能增强新中國經濟的領導力量，才能在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中起着更有力的推進作用，引導新中國經濟走向計劃化。

現在國營企業的發展，是和舊的生產關係的廢除、新的生產關係的建立以及中央人民政府正確的經濟方針和經濟政策的領導與各種工作的聯繫配合是分不開的。

二　合作社經濟

合作社經濟是半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

合作社經濟與個體經濟不同，個體經濟是以家庭爲生產單位，譬如一個農民，有自己的土地簡單工具與種籽，以自己的勞動進行生產。合作社經濟是集體

經營，許多人合起來搞，或搞生產，或搞運輸、商業、供銷等，其中生產是基本的。在城市搞供銷的比較多。合作社以集體的力量來經營，其財產（如生產合作的工具、原料等）是共有的，內部沒有剝削，利益大家分享。從這方面來說，是社會主義的因素。在另一方面說，合作社經濟又是建立在私有財產的基礎上的，是私有基礎上的合夥共有。照這方面說，共有之中還有私有的因素（合作社經濟是大夥集股，並有退股的自由），因此合作社經濟只是向社會主義經濟過渡的因素。過渡到社會主義經濟，還需要一個長的時期。我們把合作社經濟叫做半社會主義經濟，就是指其向社會主義經濟過渡而言。合作社經濟是國營經濟的助手，在經濟上合作社一方面與國營經濟聯繫，另一方面與個體經濟聯繫。合作社中有的是臨時性的合作，例如放牛放羊的變工，是小型合作，是合作社經濟的萌芽。此外還有勞動互助等合作社。勞動互助之中，有的已建立了共有財產。

人民政府的政策，是發展這種半社會主義性的合作社經濟，因爲它比個體經濟進步。農民的個體經濟是分散經營，你一小塊土地，我一小塊土地，只能用個小牲畜，大牲畜用不了（因爲地少）也難買（因爲積蓄困難）。如果集體經營，三家五家就可以買得起，用得了。簡單說來，在生產組織上，用集體力量合作經營有許多好處：可以分工，可以把零錢集中起來進行副業，可以改進技術（譬如一家買不起水車，合夥就能買起），可以通過供銷合作社買賣東西，不受中間剝削，合作社經濟在種種方面都比個體經濟有利。

發展合作社經濟是有困難的，但困難雖有，是能够克服的，而且必須克服。只要是在自願的原則下組織起來的，實行等價交換，訂好一個規章，大家共同執行，互相檢查督促，就容易解決問題，如果辦的好，生產就能大大地提高起來。

事實證明，凡是合作社經濟辦好的，生產力就能大大地提高。毛主席根據延安的互助經驗講過，農民實行組織起來，就可以提高生產力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一百。這是在同樣的生產技術條件下，只變更了勞動組織，就得到這樣的結果。經過土地改革的地區，生產關係變了，封建剝削者沒有了，苛捐雜稅沒有了，農民獲得了土地農具，生產就發展了，如果能組織起來，由分散的個體經濟走向合作經營，就能够提高生產。

合作經濟大體上有生產合作社（組織個體農民或手工業者集體生產的），有運輸合作社，有供銷合作社，有信用合作社，有消費合作社，以及綜合性的合作社。合作社過去都是分紅的，近一二年才改爲不分紅，因爲要分紅，就必然追逐利潤，不能爲社員服務，不能積蓄資金擴大事業。過去有的生產合作社吸收股金，人入了股並不勞動，却按股批紅。也有地主富農商人化整爲零，這裡幾股那裡幾股，又分紅取利，又能逃避負担，改變了合作社的性質。所以確定了不分紅的辦法。如供銷社就是供給社員買便宜的東西，在買賣東西方便不吃虧，由這裡爲社員服務。

某些城市初解放時，有些小資本家僱工人生產，實際上是勞資關係，掛的却是合作社的牌子（在行政上不承認爲合作社，命其改名）這和我們上面所說的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社，是根本不同的。

三　國家資本主義經濟

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是公私合作的經濟，也即國家資金與私人資本合作的經濟（資本與資金不同，資本是帶剝削性，資金不帶剝削性）。

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有幾種形式。有國家投資的形式：國家出一部份錢與資本家共同經營某種生產事業。有訂貨的形式：國家向私人工廠訂製貨物，規定質量數量價格按期交貨。還有承包形式：按照國家計劃，分出一定數量由私人資本來完成。有些東西國家來不及生產的，採取委託加工的形式：給私人工廠原料，由他們加工製造，規定質量價格和期限，給他們一定的利潤。還有租借方式：有些企業，國家暫時沒有力量舉辦，訂出條件讓私人資本經營，按照國家計劃生產。

在國家資本主義經濟中，有國家投資的，其投資數量多少不等，公私合作採取其他（投資以外）形式的，也種種不一，並且公私合作關係，有的是較長期的，有的只是一時的。因爲其形式複雜，公私合作程度多少不等，我們要認識其多樣性，不能看作是一種單純的東西。

國家資本主義比私人資本主義進步，私人資本主義爲個人所有，生產分散，國家不好管理。國家資本主義因與國家發生關係，好管理，可以避免生產的盲目性，和私人資本主義比較起來，在大小不同的程度上，能配合新中國的經濟建設。國家資本主義比私人資本主義還有較好的條件，它有的有國家資金，資金就較爲充足，和國家聯系，銷路有保證，因爲國家是最大的購買者。因之，國家資本主義要容易發展。

國家資本主義是公私合作的，一方面有國家的關係，一方面有私人資本的

關係；有不帶剝削的部份（國家資金部份），有帶剝削的部份（私人資本部份）。但因爲與國家發生關係，就受國家機關的一定程度的領導。

四 私人資本主義經濟

私人資本主義經濟是新民主主義經濟的一個組成部份，如其名稱所示，是私人資本主義性質的。因爲中國經濟發展的落後，在由農業國變爲工業國的歷史過程中，不能不發揮私人資本的積極性，來參加新中國的經濟建設，發展新中國的經濟。除了能够操縱國計民生的以外，私人資本主義在農業、工業、礦業、水陸交通運輸、商業以及金融諸方面，都可經營。

私人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第一，在生產系統上，資本家及其代理人佔支配地位，工人和職員處於被支配地位。第二，生產手段爲資本家所有，工人並沒有份。第三，在勞動組織上，是資本家及其代理人在那裡組織勞動，工人被指揮參加勞動。第四，生產結果爲資本家所有，工人只得工資，被資本家剝削。但是，因爲工人階級是新民主主義國家的領導階級，在私人資本的企業工作的職工地位，勞資關係是和解放前不同的，要按「勞資兩利」的原則辦事。

私人資本主義不能和高級的進步的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比，也不能和合作社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比。合作社經濟雖然規模在現在還小，技術還不高，但是它是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在國營經濟的領導之下，有遠大的發展前途。私人資本主義從生產關係上來看，是較這些爲低級的經濟。

五 個體經濟

個體經濟主要是個體農民的經營，一個一個地很分散，生產規模很小。在生產關係上彼此是處於平等的地位，因爲都是以家庭爲單位進行生產的，生產者彼此就是父子兄弟等關係。生產手段爲生產主持者所有。生產結果爲參加生產者所有。個體經濟在封建社會早就存在了，在新民主主義社會裡，經過土地改革，不祗打倒封建的生產關係，去掉封建的剝削，並且可以得到政府的幫助，是能够發展的，並且也不斷地發展着。

個體經濟有兩種：第一種是自給自足的，主要是搞農業生產，附帶搞副業。這種純粹自給自足的已經很少了，只有交通不方便生產很落後的地方還有。大多數是第二種，即半自給自足的，一部份爲自己生產，一部份爲出賣而生產商品，其自給自足生產與商品生產比率大小多少不等。此外還有純粹的小商品生產，如手工業生產等。

在今天中國的國民經濟比重中，根據毛主席的分析，個體經濟的生產要佔到百分之九十。個體經濟因爲它的分散，規模很小，技術落後，是新民主主義經濟構成中五種形式的最低的一種。不把個體經濟合作化，就解決不了中國經濟近代化工業化的任務，農民和手工業者也就不能最終地擺開貧困。

中國新民主主義經濟，主要有上述五種經濟形式。除此以外，在少數民族地區還有牧畜經濟，半農半牧畜經濟，以及原始的經濟等。這些經濟在新中國經濟的比重上不大，（現在正在改變中）。

六 各種經濟的相互關係

在新民主主義經濟中，居於領導地位的國營經濟規模最大，資金最多，技術最進步。雖然就生產方面說數目不多，在全國經濟中的比重不大（全國工業只佔全部生產百分之十左右，其中還有一些是私人資本主義的），但是力量比較集中，是有組織有計劃的，並配合生產以外的國營經濟，形成大的經濟力量。從這方面來說，有領導的能力。小生產雖然多，但是力量小，很分散，技術很低，不能領導新民主主義經濟向前發展。

合作社經濟是國營經濟的助手。國營經濟雖然規模大，有力量，但是直接領導許多分散的小生產者是很困難的，通過合作社經濟來和小生產者發生關係，領導小生產者就容易了。

國家資本主義也起着國營經濟的助手作用，它是國家領導的資本主義，在一定程度內按照國家的計劃生產。

這許多經濟要相互聯系配合，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國營經濟在城市、重要工礦、交通、商業貿易、金融等方面起作用，領導國家資本主義、私人資本主義共同發展生產，繁榮新中國的經濟。在廣大的農村，國營經濟通過合作社經濟起作用，領導和扶助個體經濟的發展。不單經濟上分工，而且要照顧到地區的特點建設經濟區的分工。如東北重工業最發達，就以東北爲重工業的建設重點，西北煤油資源豐富，就在西北開辦煤油工業等等。分工還要合作，要聯系配合，不能各搞各的去盲目生產。不然，就要生產太多或者生產不足，妨礙經濟建設的順利進行。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是有計劃的生產。因爲經濟成份的複雜、分散和不好管理，其計劃性現在是有限度的。隨着新民主主義經濟的發展，計劃性一天一天會增强的，並且必須增强的。

（下轉第14頁）

斥美帝單獨對日締和

林天擧

一

美國帝國主義在對日和約問題上，一貫地要弄著陰謀詭計，蠻不講理。開始的時候，它用種種方法拖宕。在拖宕期間，美國帝國主義致力於企圖在日本建立永久統治地位的打樁子工作，積極從事使日本殖民地化與軍事基地化，以爲未來的片面和約造成非法基礎。繼而，由於國際輿論的指責，蘇聯和中國人民又不斷提出早日締結對日和約的主張，日本人民也普遍要求從速締和，美國帝國主義乃裝腔作勢，表面上裝做熱心締和，實際上還是恣意阻撓與破壞。後來，美國帝國主義一方面認爲它自己在日本的統治地位已告奠定，一方面國際間及日本國內要求早日締和的壓力也越來越甚，於是，它除繼續儘可能拖延外，積極策劃排斥中蘇兩國的片面單獨和約，打算把非法造成的既成事實「條約化」、「合法化」。到了侵朝戰爭以後，美國帝國主義急於要利用日本的人力物力從事侵略戰爭，片面單獨和約的陰謀遂急轉直下。美國帝國主義企圖利用所謂「和約」的訂立，大規模武裝日本，充作擴大侵略戰爭的工具。最近杜勒斯的活動，就是爲此目的。

爲揭破美國帝國主義在對日和約問題上的陰謀詭計是怎樣非法無理，我們對於締結對日和約應採取的合法方式與程序，及其應有的合理內容，實有加以申述的必要。

二

關於締結對日和約的手續，歷次國際協議早有明文規定，並有不少既成事例可作依據，應該沒有爭論的餘地了。可是，慣於背信毀約的美國帝國主義，却一直毫無理由地故意加以歪曲和破壞。

根據歷次國際協議與既成事例，締結對日和約的完整手續，應如下述：

第一、對日和約在程序上，是必須先由中、蘇、美、英四國舉行會商，擬訂和約草案，然後召開和會。其可依據的國際協議和既成事例很多：

（一）一九四五年八月三日蘇、美、英三國波茨坦宣言，規定設置一個由中、蘇、美、英、法五大國組成的外長會議。對戰敗國的和約，即由外長會議國家起草。該宣言及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蘇、美、英三外長莫斯科會議公報，又明確規定由曾經在有關敵國投降條款上簽字的外長會議會員國，分別担任有關敵國的和約起草工作。這也就是確定了：對戰敗國和約的締結程序，必須由曾經簽字於敵國投降條款上，而又屬外長會議的會員國，先行草擬。以這個規定爲根據，對日和約理應由簽署日本投降條款的外長會議會員國中、蘇、美、英四國先行草擬，是沒有疑問的。（日本投降條款是於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由中、美、英三國以波茨坦公告提出，同年八月八日蘇聯對日宣戰，也加入簽署，成爲日本投降條款的四國共同宣言。八月十日日本發出乞降照會，聲明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投降條款，八月十一日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即代表了中、蘇、美、英四國，覆照接受日本的投降。）

（二）日本投降以前，在繼續作戰時期有關戰後對日締和的國際協議，除四國波茨坦公告外，尚有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的開羅宣言，是由中、美、英三國發佈；一九四五年二月的雅爾達協定，是由蘇、美、英三國簽訂。又日本投降後，根據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蘇、美、英三國外長莫斯科會議決議所設立的盟國對日管制委員會，是由中、蘇、美、英四國組織的。這不但於戰時證明中、蘇、美、英四大國在對日問題上有特殊地位，而且又爲戰後的事實所確定了的

。這些，也都是對日和約應先由中、蘇、美、英四國草擬的合法根據。

（三）依照對歐洲戰敗國的先例，對意大利和約是由蘇、美、英、法四國外長會議草擬；對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三國的和約是蘇、美、英三國外長會議草擬；對芬蘭的和約是由蘇、英兩國外長會議草擬；而一九四七年三月間曾在莫斯科一度舉行的對德和約起草會議，也是僅由蘇、美、英、法四國參加的。它們都符合了一九四五年八月蘇、美、英三國波茨坦宣言及同年十二月蘇、美、英三國外長莫斯科會議公報的規定。這給與對日和約應由中、蘇、美、英四國先行草擬以有力的引證。

綜上所述，對日和約應由中、蘇、美、英四國先行草擬，彰彰明甚，但美國帝國主義卻一貫地故意加以蔑視。一九四七年間，美帝因鑒於各方反對其在日本扶植侵略勢力及種種不法行爲甚烈，各方要求從速促進日本民主化，早日締結對日和約的呼聲很高，乃於七月十一日，依據其片面的決定，向遠東委員會各國建議於同年八月十九日召開對日和約預備會議，企圖推翻對日和約應由中、蘇、美、英四國先行草擬的合法規定，而以在其操縱下的所謂「多數表決制」的表決機器包辦對日和約。這個建議自然爲蘇聯所堅決反對。美帝還曾拿上述蘇、美、英三國波茨坦宣言和莫斯科外長會議公報沒有具體提到日本作藉口，擅稱它們祗適用於歐洲，意圖孤立對日和約程序。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巴黎四國外長會議上，蘇聯提出對日和約問題時，艾奇遜竟說「外長會議是討論歐洲問題」，指「外長會議不是準備對日和約的適當組織」，阻撓公正合理的對日和約的締結。目前美國帝國主義不通過中、蘇、美、英四國草擬而擅自策劃的對日和約，是完全破壞了對日和約的合法程序。

第二，討論對日和約時，另一個與程序問題相關連的基本原則，是必須採取大國一致，即大國保有否決權。這，也有不少國際法理和既成事例可作依據：

（一）根據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蘇、美、英三國外長莫斯科會議決議設立的遠東委員會條文，中、蘇、美、英四大國在該委員會內是保有否決權的。條文第五條乙項規定：「委員會之決議案，可毋需全體一致通過，惟此項決議案至少須經全體代表大多數贊成，且贊成之代表中，須包括下列四强代表：美國、英國、蘇聯及中國」。又第七條甲項規定：「遠東委員會於全體代表至少大多數以上通過決定解散時，即行停止活動，贊成解散之代表須包括下列四國代表：美國、英國、蘇聯、中國」。這兩項條文都明白規定，在遠東委員會這一協議對日事情的機構中，中、蘇、美、英四大國是保有否決權。對日和約當然更須如此。

（二）根據對歐洲戰敗國和約會議上都是大國一致原則的先例，對日和約自然也不能例外。而且，對戰時受德國壓制的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芬蘭諸國的和約，尙且要保有大國一致原則，則對於戰時像日本那樣的敵國的和約，大國一致，大國保有否決權，自然更有必要了。

（三）而且，大國一致，大國保有否決權的原則，實際上已經成爲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處理重要國際問題的慣例，並具有確切的法理的根據。聯合國機構安全理事會中，中、蘇、美、英、法五大國保有否決權，就是一個很好的範例。

因爲唯有大國一致，纔能解決國際間的重要問題。美國帝國主義在對日和約問題上，曾提出由遠東委員會國家三分之二多數表決制度締結和約，則是要推翻大國一致，大國保有否決權的原則，以達到其操縱表決機器，包辦和約的目的。這也不僅違反了已有的國際協議，而且蔑視了國際慣例。

第三，對日和約必須是一個包括所有曾經對日實際作戰的國家都在內的全面和約，任何一國或幾國，不能單獨或片面與日本締和。主要根據如下：

（一）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中、蘇、美、英、澳、加、印等二十六國在華盛頓簽署的聯合國宣言，其中曾規定：「每一政府承允與本宣言簽字國政府合作，並不與敵國締結單獨停戰協定與和約」。後來的聯合國組織，也就是從這個宣言發展開來的。顯然，在對日和約上，每一個有關國家也都應該遵守這個宣言。

（二）對意大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及芬蘭的和約，是根據一九四五年八月三日蘇、美、英波茨坦宣言與同年十二月蘇、美、英三國外長莫斯科會議公報的規定，先由有關的外長會議國家起草，然後召開「包括參加外長會議的五國及聯合國中曾以實際軍事力量積極與歐洲敵國作戰的所有國家」（莫斯科外長會議公報），即二十一國的會議締結的。這是和約必須是全面和約的明顯例證。

（三）一九四三年十月三十日中、蘇、美、英四國戰後普遍安全宣言，除重申遵守上述聯合國宣言外，並宣稱要「負責確保他們自身以及他們同盟的各國人民」，「迅速而有秩序地從戰爭過渡到和平」，又規定：「他們爲對各該國的敵人進行戰爭而約定的聯合行動，當爲和平與安全的組織和維繫，而繼續

保持下去」。很明顯，這也是不能與日本單獨締和之具體的約束。

美國帝國主義搞單獨對日和約，是完全與上述國際協議和事例相反。一九五〇年十月，美帝負責搞單獨對日和約的著名戰販杜勒斯，向有關各國提出的所謂「美國政府關於對日和約的備忘錄」，片面擬定明明爲中、蘇兩國所不能接受的「七原則」，並妄自規定「締約國家」是：「任何或一切願意在所建議的可能獲得協議的基礎上締和的對日作戰國家」。很明顯，美帝是要把它自己片面擬定的「建議」，强令別人接受。如果不順從美帝意旨，就將加以排斥。這就是說，和約不一定包括所有對日作戰國家，不一定是全面和約。這也就是說，這個和約將是不包括不接受「七原則」的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內的，由美帝包辦的，僅由順從美帝意旨的各個國家參加的，片面的單獨和約。

同年十二月，美帝答覆蘇聯備忘錄的備忘錄，又擅行宣告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聯合國宣言所規定「不與敵國單獨締和的約束，僅限於「贏得勝利爲止」，並以「美國並不認爲任何一國有一種永久不變的權力可以否決其他國家與日本締結和約」的無賴口吻，爲其非法搞單獨和約作强辯。

由此可以見到，美國帝國主義已以正式外交文件，公開宣稱不再遵守合法的國際協議了。

最近，杜勒斯策劃着的單獨對日和約，由於不僅受到中蘇兩國和日本人民的反對，連與其他國家間一時也不能獲得普遍的協議，美帝急不及待，甚至想完全跳過和會，不開任何形式的和會，逕自與日本反動政府個別締結所謂「雙邊」的單獨和約，並强令其他國家跟訂。從所謂「多數單獨和約」到「雙邊單獨和約」，證明美帝不但排斥中蘇兩國，而且也蔑視着其他國家的意見。正如美帝在答覆蘇聯備忘錄的備忘錄中所反誣別人，實際上却是自招：「除非按照一個國家指令的條件，否則就不能有和約」。

三

對日和約的程序問題搞清楚以後，我們應該重視訂約應有的根據及其基本內容。

關於訂立什麼樣的對日和約，歷次有關對日問題的國際協議，都有明確的條文可作依據，這本來也是不需要論爭的。但是美國已經不斷地破壞了這些協議，所以還有提示的必要。

可作爲訂立對日和約主要根據及其參考價值的國際協議，主要約有下述幾種：

（一）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中、美、英三國發展的開羅宣言中共同約定：「我三大盟國此次進行戰爭之目的，在於制止及懲罰日本之侵略。三國決不爲自身圖利，亦無拓展領土之意。三國之宗旨在剝奪日本自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以後在太平洋所奪得或佔領之一切島嶼等；在使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例如滿洲、台灣、澎湖羣島等，歸還中國。日本亦將被逐出其以武力或貪慾所攫取之所有土地。我三大盟國軫念朝鮮人民所受之奴隸待遇，決定在相當期間，使朝鮮自由獨立」。

（二）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一日蘇、美、英三國簽訂的雅爾達協定，規定南庫頁島，與其毗連之各島交還蘇聯，千島羣島亦移歸蘇聯。

（三）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由中、美、英三國發表，復於同年八月八日蘇聯對日宣戰後，蘇聯加入簽署的波茨坦公告，其有關條款如下：「（1）欺騙及錯誤領導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權威與勢力，必須永久剷除，蓋吾人堅持非將負責之窮兵黷武主義逐出世界，則和平安全及正義之新秩序勢不可能建立。（2）直至如此之新秩序成立時，及直至日本製造戰爭之力量業已毁滅而有確實可信之證據時，日本領土須經盟國之軍隊予以佔領，俾吾人爲此所陳述之基本目的得以完成。（3）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而日本之主權必將限於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吾人所決定其可以領有之小島內。（4）日本軍隊在完全解除武裝之後，將被允許其返鄉，享有和平與生產生活之機會。（5）吾人無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滅其國家，但對於戰爭人犯，包括虐待我們俘虜者在內，將處以法律之裁判。日本政府必須將阻止日本人民民主趨勢之復興與加强之所有障礙予以消除。言論宗教與思想自由以及對於基本人權之重視，必須成立。（6）日本將被准許維持其經濟所必需及可以償付賠款所需要之工業，但可能使其重新武裝作戰之工業，不在其內。爲了達此目的，可准其獲得原料（別於統制原料），日本最後參加國際貿易亦所允許。（7）當上述的目的達到時，及日本人民依據其自由表示之意志已成立一個傾向和平及負責之政府時，同盟國之佔領軍隊當即撤退。」

（四）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公佈的遠東委員會「對投降後日本之基本政策」內，確定最終目標如下：「（1）對投降後日本之政策，應依據下列最終目標：（甲）保證日本不再成爲世界和平與安全之威脅。（乙）儘速樹立一民主和平之政府，以履行其國際責任，尊重他國權利並支持聯合國之目標。此項

政府應根據日本人民自由表達之意志而建立之。（2）此等目標將由下列各主要方法達成之：（甲）日本之主權將限於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可能決定之附近島嶼。（乙）日本應完全解除武裝與軍備，並完全消滅其軍部權力與軍國主義之影響；嚴格取締一切表現軍國主義與侵略精神之制度。（丙）鼓勵日本人民發展個人自由與尊重基本人權之願望，尤其信仰、集會、結社、言論與新聞之自由；並鼓勵其組織民主與代表民意之機構。（丁）給予日本以某種程度上之工業，俾可支持其本身經濟，及提供公正之實物賠償，凡是以重整軍備以作戰之工業則應予禁止，爲達到此目的起見，日本可取得原料，而不許控制原料。日本並獲准參加世界貿易關係」。

（五）下列各件，也可供訂立對日和約時的參攷：（1）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四日羅斯福邱吉爾聯合宣佈的大西洋憲章。（2）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擁護大西洋憲章的華盛頓二十六國共同宣言（即聯合國宣言）。（3）一九四三年十月三十日莫斯科中、蘇、美、英四國戰後普遍安全宣言。（4）一九四三年十月三十日莫斯科外長會議蘇、美、英三國關於懲辦戰爭罪犯宣言。（5）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蘇、美、英三國德黑蘭會議公報。（6）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三日蘇、美、英三國克里米亞會議公報。（7）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在舊金山簽定的聯合國憲章。（8）一九四五年八月二日蘇、美、英三國波茨坦會議公報。（9）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莫斯科蘇、美、英三國外長會議公報。（10）一九四七年三月莫斯科蘇、美、英三國外長會議討論對德和約時所宣佈的建議。（11）一九四七年二月十日在巴黎簽訂的對意大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芬蘭五國和約。

根據上述各項國際協議的文件，可以確定對日和約的基本內容，應該如下：

第一，日本國家民族的地位，應予尊重，在日本人民管理之下，保障其獨立，使與各國和平相處。任何國家不能把日本當做殖民地，奴役日本民族；不能任意駐軍或把日本當做軍事基地。

第二，日本領土，其過去奪自他國的，除已依照開羅宣言，雅爾達協定波茨坦公告所規定，業經歸還者外，未決定者應本同盟國無拓展領土之意的立場，妥善協議處理，任何國家不能擅借託管之名，任意佔有或建立軍事基地。

第三，軍事及安全方面，須永遠根絕侵略勢力及一切表現軍國主義與侵略精神之制度，完全解除武裝及可能使其重新武裝作戰之軍需工業，並嚴懲戰爭罪犯。不能用任何理由任何掩蔽形式重整軍備與軍隊。

第四，政治方面，應建立眞正代表民意的民主政府，保障基本人權與各種自由，尤其是信仰、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等自由。任何國家不能干涉或妨礙日本人民的自主與自由。

第五，經濟方面，除根絕可能使其重新武裝作戰之軍需工業外，對于日本人民生活所需要的和平工業，應予維持，並可允予參加其和平經濟所需要的國際貿易。任何國家不准利用投資和貿易等方法加以壟斷與壓榨。

四

對日和約應該是一個怎樣的和約，從前述國際協議，可以很清楚了。但美國帝國主義所搞着的片面單獨對日和約，却完全反其道而行。而且，幾年以來，美帝一面拖延和約，一面獨霸管制，在日本所作所爲，非法罪行早已昭著於世。

大家知道，前述波茨坦公告、開羅宣言、雅爾達協定是公認的解決日本問題的典本；遠東委員會對日的基本政策，乃遠東各國共同決定的合法議案，是處理投降後日本各種事情的準繩，而聯合國憲章及其他公認的國際法理之必須遵守並適用於日本，也是無可含混的。美國帝國主義一點也沒有遵守過這些神聖的國際協議，竟悍然一一加以蹂躪與毀棄。

開羅宣言明確規定：盟國對日作戰的目的，在於制止及懲罰日本的侵略，決不爲自身圖利，除歸還日本過去由侵略所奪佔的地方於原主外，各國無拓展領土之意。波茨坦公告又規定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並指出盟國無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滅其國家。可是美帝完全違反了這個約言，它霸據日本本土及附近島嶼，長期軍事佔領，壟斷一切事物，視日本爲其殖民地。又進而以日本爲軍事基地，武裝進攻朝鮮，侵佔中國領土的台灣，並積極準備擴張侵略其他亞洲地區。

波茨坦公告和遠東委員會對日基本政策確定：盟國對日佔領的目的，是要把黷武侵略的軍國日本，變爲和平的日本，故必須解除日本軍隊武裝，摧毀日本軍事機構，消滅日本軍國主義。可是美帝在日本的獨霸管制，却完全反其道而行。日本侵略勢力和黷武軍力，不但迄未消毀，而且受到多方保護和重建。日本兵和日本伕役，甚至已有不少被驅迫而用于侵朝戰場。美國霸佔下復活了的軍國主義的日本，現在仍然是破壞和平的重要根源，美國繼承了日本

帝國主義的侵略事業。

波茨坦公告和遠東委員會對日基本政策又確定：盟國對日管制的目的，是要把法西斯的日本，變爲民主的日本。爲此目的，必須剷除日本獨裁壟斷的反動勢力，並消滅日本民主化的所有障礙，儘速促成樹立一個由日本人民自由意志表達的民主和平政府，以管理日本國家與各國建立永久的和平友好關係。可是在美帝縱容和保養之下，日本法西斯反動集團一直掌握日本政權，佔着統治地位。軍國主義分子和戰犯們，多已得到包庇與重用。反之，日本人民應享有的結社、集會、言論、出版、信仰等自由與基本人權，則橫遭兇殘的迫害，「警察國家」又在日本復活。

波茨坦公告和遠東委員會對日基本政策同時又規定：必須解消日本戰爭工業，禁止軍事生產，而准共維持人民生活所需要的和平產業，並促進日本經濟的民主化。可是美帝却多方恢復和擴張日本軍需產業，把日本當做亞洲兵工廠，和平產業則頻受壓縮。而財閥獨佔資本之繼續被扶植，土地改革之虛而不實，及勞工組織的備受摧殘，使經濟民主化完全無由建立。

美國帝國主義就是這樣背信、棄義、毀約、黷武，惡事實在做得數不清，而且還在變本加厲地做。現在美帝又積極策劃訂立一個排除中蘇兩國的所謂單獨和約，陰謀進一步把它在日本所已經造成的所有非法事情，作爲既成事實而使之「條約化」。一九五〇年十月間美國向有關各國提出的所謂「美國政府關於對日和約的備忘錄」，及十二月二十八日美國國務院發表的答覆蘇聯備忘錄的備忘錄，更顯示美國帝國主義決心要澈底撕光所有國際協議。它公然表示不願履行聯合國宣言、開羅宣言、雅爾達協定、波茨坦公告、遠東委員會對日基本政策。準備一意孤行，蠻幹到底。

在侵朝戰場上受到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部隊痛擊而屢吃敗仗，陷入泥沼的美國帝國主義，死不甘心，正在處心積慮，妄圖藉單獨和約，大規模重組日本武裝部隊，利用日本人作砲灰，挽救其既定的敗局，並進而擴大對亞洲的侵略。

最近杜勒斯率領所謂「對日和約使團」到日本、到菲律賓、到澳大利亞與新西蘭，迫切要搞成單獨對日和約，其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企圖迅速大規模武裝日本，動員日本軍隊擴大侵略戰爭。美帝想用訂立「和約」的方式，表面給與日本「自主」「獨立」，籠絡日本軍國主義分子，欺騙日本人民，迷惑國際視聽；以所謂日本「自願要求保護」做幌子，長期駐軍不撤；以所謂「自衞」爲名，重建日本武裝部隊；以所謂「集體安全」的旗幟，組織日本侵略軍隊。單獨對日締和是與武裝日本分不開的。

「和約」的主要目的既是重新武裝日本，因此一切有關對日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安排，美帝也莫不爲從屬這個主要目的而進行。

但是，美國帝國主義片面搞單獨對日和約、武裝日本的罪惡行爲，已經受到亞洲各國以至全世界人民的强烈而普遍的反對。日本國內在日共及其他愛國、進步人士號召下，如火如荼地反對單獨媾和、反對重新武裝，要求訂立全面和約的運動，也遍及於各地區各階層。日本人民都不願意當砲灰當奴隸。

曾經飽受美日帝國主義長期殘暴侵略的中國人民，堅決反對美國帝國主義跟侵略分不開的片面單獨對日締和與武裝日本。我們一定要爭取一個依據合法國際協議，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蘇聯在內的，公平而合理的對日全面和約！

（上接第9頁）

七　五種經濟的發展前途

中國經濟發展的總方向，是由落後的農業國變爲近代的工業國、是由落後的農業經濟進到進步的工業經濟的方向，是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方向。

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到了社會主義時期，就是社會主義的經濟。

半社會主義性的合作社經濟，我們正在發展，發展的前途是社會主義經濟，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要把個體的分散的小生產相當地組織起來，就得好多年，組織起來後，還要提高技術，擴大生產規模，也非短期內所能做到的事。

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根據「共同綱領」中的規定，是國家資金與私人資本合作的經濟。到了實行社會主義，國家資金部份就是社會主義的，私人資本部份也要社會主義化。

私人資本主義經濟有兩個發展前途：一個是從小到中從中到大。由小資本家發展爲中資本家，從中資本家發展爲大資本家。一個是向國家資本主義發展。無論向那一方面發展，將來都要經過一定適當的步驟轉變爲社會主義經濟。

個體經濟有兩個前途，一個是向合作社經濟方向發展，將來再發展爲社會主義經濟。一個是向資本主義方向發展，如有的小生產者有了積蓄，就要擴大生產僱傭工人，這就帶上了資本主義的性質。資本主義經濟再發展，有的還是資本主義經濟，有的發展爲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到社會主義時期，轉變爲社會主義經濟。

總地說來，新民主主義各種經濟是「條條道路通共產主義」（因爲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經濟發展的遠景。

（這是由在北京兩三個機關講演的記錄整理起來的）

從西方哲學認識論的批判來學習「實踐論」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員集體寫作

這篇提綱初稿是北京大學哲學系教員底集體寫作，寫成後大家討論過多次，在討論過程中，經過隨時修改。至于文筆不同的地方，還來不及加以整理劃一。原稿曾於二月中在新哲學研究會北京分會所召開的「實踐論」座談會上宣讀並討論過，參加討論的各位先生提出許多寶貴的意見。座談會後，我們自己將原稿作了必要的補充，並且儘量容納了討論會上的意見，就成功這裡發表的文章。我們感謝參加討論會的各位先生，還希望讀者多多批評。

一　「實踐論」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認識論

「實踐論」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的系統的說明，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的進一步發展。它是認識世界的理論，更重要是改造世界的理論，它是認識的指南，更重要是行動的指南。它是中國革命實踐的最高級的最全面的理論總結，它的思想對中國革命作了最有力的指導作用，使其很快地獲得偉大的成功，而且必然將繼續有效地指導中國革命。

認識論問題的特殊重要性，在於正確的認識論終歸要引起正確的實踐，錯誤的認識論終歸要引起錯誤的實踐。認識論問題是一切活動是成功還是失敗的關鍵。毛主席說：『人們要想得到工作的勝利即得到預想的結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於外界的規律性，如果不合，就會在實踐中失敗。』這句話包含着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的一個最重要的思想。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是正確的認識論，它認爲只有社會實踐才是眞理的標準，『實踐的觀點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之第一的與基本的觀點，』『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把實踐提到第一的地位，認爲人的認識一點也不能離開實踐，排斥一切否認實踐重要性，使認識離開實踐的錯誤理論。』所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正確革命理論與這樣的正確的認識論是密切聯系而不可分的整體。

一切非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認識論，都是在不同程度上錯誤的認識論。一切錯誤的認識論，除去它們各自特殊的缺點，又都『否認實踐重要性，使認識離開實踐。』一切錯誤的認識論之產生各由於種種不同的客觀主觀條件，而又會必然引起共同的結果，即：必然會引起錯誤的實踐，以及種種錯誤的知識與理論。

我們舊大學中一向主要講授着錯誤的認識論思想，毫無疑問，對於這些哲學工作者，錯誤的認識論思想有着深刻的影響。因此，爲了「排斥」一切錯誤的認識論在我們中的影響，同時爲了建立起正確的認識論，我們對於「實踐論」的學習是迫切需要的。學習「實踐論」的方法是一定要聯系實際，「有的放矢」。我們首先可以作的就是以「實踐論」武器來批判錯誤的認識論，肅清其可能存留於我們中間的殘餘勢力。我們要善於運用這個武器。在以下，我們預備首先選擇西洋近代哲學中幾派最有影響的認識論思想作簡要的檢討。同時這個工作也有待於一切哲學工作者底共同進一步的展開。

二　新哲學與舊哲學

毛主席的「實踐論」爲全新的哲學，它是批判舊哲學的武器，只有全新的哲學乃能解決舊哲學中的問題。就新舊哲學的關係來說，我們以爲應將新哲學和舊哲學首先嚴格區別開來。但過去哲學中的問題與混亂，可以用新哲學的武器加以解決和肅清，並且正因爲現在的思想是全新的，故能解決過去的問題，肅清過去的混亂。這樣新舊哲學的關係的看法，讓我們首先來稍加說明。

「實踐論」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底最透徹的說明。我們如果要了解「實踐論」

底內容，必須先將辯證唯物論與舊哲學嚴格加以區別。辯證唯物論是與一切舊哲學根本不同的東西。「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辯證唯物論有兩個最顯著的特點：一個是它的階級性，公然申明辯證唯物論是爲無產階級服務的；再一個是它的實踐性，强調理論對於實踐的依賴關係，理論的基礎是實踐，又轉過來爲實踐服務。」它是無產階級革命實踐的哲學。其他一切分別如革命性，科學性，等皆由此而來。因爲它是站在最進步的階級立場，才有可能認識世界之本來面目，絲毫不加揑造，所以一定不是唯心論的，一定是唯物論的，唯物論又一定不是形而上學的、機械的，而一定是辯證的唯物論。

這樣的世界觀，方法論是與世界本身的發展一致的，是客觀世界的眞實的反映，所以一定能夠解決問題。而一切舊哲學由於它們是唯心論或形而上學，所以一定解決不了問題。我們教哲學的人，在過去很以爲自己所講的舊的哲學思想，雖不是完全正確，但是解決了一部分問題，是近乎眞理的，是加以修正就可以要得的。但現在學習了馬列主義之後，認識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世界觀與一切舊哲學的根本區別，看出過去自己看法是站不住的，因爲舊哲學，不管那一派思想，由於其爲剝削階級服務的立場，或雖有一定的進步性，但乃是不澈底的，它們的立脚點出發點或多或少是錯誤的，所以儘管可能表現出近似於眞理，就其整個體系說，還是錯誤的。舊的政治舞台上是改朝換代式的改變，實際上永遠維持着完全不合理的專制剝削制度，所謂換湯不換藥，一切在舊基礎上的政治改良主義者，也是永遠成功不了的，因爲它保存着原來的根基。同樣，在舊哲學史中的一切改變，也只是換湯不換藥式的，因爲它們都是站在爲剝削階級服務或雖進步而極不澈底的立場上來看世界，來思想，來說話。它們基本上是與全局的，科學的眞理脫節的。哲學上站在舊基礎上的改良主義者，也同樣只有失敗。亞里斯多德改良柏拉圖注定要失敗的，柏克萊休謨改良洛克注定要失敗的，笛卡爾的學徒們改良笛卡爾注定要失敗的，康德改良唯理論與經驗論也注定要失敗的。

辯證唯物論是革命的哲學，同時在思想史上是對舊哲學的革命，而不是改良派的哲學，並且正因爲辯證唯物論是完全新的東西，是完全眞實的東西，所以一定可以解決問題，解決舊哲學所不能解決的問題。實在說來，新哲學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哲學，新哲學在革命實踐過程中不斷提出來自己的問題並加以解決，新哲學問題的提出與解決完全爲了實踐的需要，新哲學的理論活動從來不會與實踐脫節，因此，新哲學正確地提出了問題，而舊哲學錯誤地提出了問題。像第一次座談會上大家所說，「實踐論」所理解的知行問題不是中國哲學中所理解的知行問題。當然我們並不否認新哲學從舊哲學吸取了一切必要的思想材料，整個舊哲學中有着對新哲學是必要的歷史的遺產，可是新哲學以全新的立場解決了自己的問題，同時也就指示出舊哲學的問題解決之不妥當，它背後的爲剝削階級服務的立場，唯心的觀點、錯誤的方法。新哲學在解決自己的問題時，批判、揚棄了舊哲學的一切，對舊哲學作了總的清算，但在這個關係中，新哲學是主動的，不是被動的。

根據這樣的基本認識，以「實踐論」這個新哲學的認識論作武器，來開始我們上述的工作。

三　唯理論與經驗論在認識論上的錯誤

在實踐基礎上，一般正確認識過程中，有兩個必要步驟：（1）發現問題，提出問題；（2）分析問題，解決問題。（1）是與事實接觸，注重在獲得材料；（2）是分析材料，注重在尋求事物之內部聯系，通過表面的現象認識本質，注重在理解。這兩步根本不能分開，分開了就不能得到正確的認識。「我們的實踐證明，感覺到了的東西，我們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東西才更深刻地感覺它。」

近代資產階級爲了自己的利益發展了自然科學。自然科學在一種程度上結合了觀察實驗與演繹推理成爲其統一的工作方法，也就是，它在一定程度上結合了理論與實際，因此，它才能獲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過去哲學家對於知識的解釋受了自己立場的限制，脫離了實踐，因而出了種種偏差。從事於數學、力學研究的資產階級學者笛卡爾在哲學方面强調了推理在認識中之作用，從事於社會活動的資產階級學者洛克在哲學方面强調了感覺在認識中之作用。前者形成了唯理論，後者形成了經驗論。

理性與感性二者分開來，就都成爲絲毫無力，毫無意義，不能達到認識目的的東西。笛卡爾單獨强調理性的結果，看感性毫無是處，感性本身完全不能達到認識目的，結果客觀世界之存在還要依賴上帝來保證，那就只有陷入唯心論、僧侶主義。笛卡爾底理性離開了感性，也就成爲「無源之水」，一切「實在的」觀念便只能是「先天的」，眞理的標準便只能是主觀的「淸楚、分明」，唯一最眞實的東西，便只有「自我」。必然地達到主觀主義。這都是脫離了

實踐，分離了感性與理性的必然結果。

毫無疑問，唯理論者在基本上是爲其較保守的立場所限制，另外則是特殊地受了自然科學中片面發展的影響。當時大步發展了的數學和力學明顯表示出演繹推理在認識中之作用。它們的基本概念表面看來好像是無疑的絕對眞理，因此給人帶來一種幻覺，以爲這種抽象的基本概念是理性的單獨產物，是理性中與生俱來的先天觀念，只須掌握這些概念，加以演繹，便能得出全部眞理，而掌握這些概念，只須用理性靜觀反省便得，無須乎感覺經驗。笛卡爾研究自然科學時，並不否認感覺經驗的認識效用，但是在認識論方法，却强調理性的作用，認爲理性是眞理性的唯一標準，陷入片面的誇張。斯賓諾莎發展了唯物論的觀點，認爲最根本的是自然或物質，思想與體積都是物質的屬性，是同一自然的兩方面，因此主張思想中的理性就是具體事物的規律，只要從理性去靜觀，就得到了自然的眞理。這種唯物論的唯理論，雖然見到了眞理的一面，肯定了認識必須是理性的認識，但是由於抹殺了感覺在認識中的重要作用，仍不能說明認識的全貌。萊勃尼茲的唯理論，反映着德國當時的封建落後性，陷入唯心論的窠臼，他認爲認識只是每一個人內心中的作用，只是理性自己認識自己天賦的觀念，世界實際上是一個精神的世界。這種唯心論的唯理論，封閉了認識的來源，完全歪曲了事實。

唯理論「這一派的錯誤在於顚倒了事實。理性的東西所以靠得住，正是由於它來源於感性，否則理性的東西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只是主觀自生的靠不住的東西了」。唯理論是錯誤的認識論，這樣的錯誤的認識論是毛主席在整頓三風中所駁斥了的「理論家」的作風的系統化、理論化，反過來又必然是一切誇誇其談、重視書本知識、分離理論與實踐的教條主義的根源與理論基礎。實踐論批判唯理論是挖了一切舊知識分子或多或少存在着的教條主義的根，一切知識分子要注意從實踐論學習中得到豐富的啓示。

經驗論這派思想起源很早，我們可以把它推源到十四世紀。隨着歐洲封建社會的解體，新的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生長，維護封建社會的、專門根據基督教條來解釋一切事物的荒謬的所謂「經院哲學」逐漸在崩潰中，屬於新興資產階級的新思想在不斷的鬥爭之中逐漸發展着。

新的思想發生的基礎是新興資產階級的推進生產力的生產實踐，這樣的實踐强烈地要求對於自然界不斷開展新的認識，因而立足於觀察、實驗的新興自然科學大步前進着。所以，代表抬頭的資產階級的哲學思想必然是反宗教權威，反傳統、反教條主義、反演繹推理、看輕思想在認識中的作用；在積極方面必然是面向自然、趨向於唯物論、强調感覺之重要性、特別注重實際的經驗，提倡歸納方法。這是早期的經驗論思想。

這樣的經驗論思想在資本主義先進國家英國的哲學家培根得到了典型的表現。馬克思說，在培根看來，「自然哲學是僅有的眞正哲學，根據於感官經驗的物理學是自然哲學的主要部分。……培根認爲感官是完全可靠的，並且是一切知識的源泉。一切科學都根據於經驗，科學就是應用合理的考察方法處理感官提供的材料。歸納、分析、比較、觀察、實驗，就是這種合理的方法的主要形式。」（見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英文本序）。

經驗論認爲一切知識都是從感官得來的，我們只有通過我們的感官才能認識事物，不是從經驗中獲得的我們對它也不會有甚麼觀念，一切理論如不能被實際證驗，就是毫無價值的。培根以後的經驗論者還有霍布士，洛克。這些早期的經驗論者所主張的是唯物的經驗論思想，因爲這樣的經驗論承認獨立於人類意識而存在的客觀世界是一切感覺底源泉，一切知識都只能來自對客觀世界的經驗，除此以外，沒有其他途徑。

早期的經驗論雖是唯物的，但是由於單單見到了感性認識是必要的，並且過於重視了感性的認識，以爲認識基本上不過是感性的認識，不知道感性認識只給我們表面的、零碎的、不完全的認識，因而把認識停留在現象方面，忽略或輕視了思考作用，不知道認識是以感性認識爲根據，並且只能以感性認識爲根據，此外還必須通過思考活動上升到對事物全體，事物本質的認識，所以說唯物的經驗論對於認識的了解只有片面的眞理，從整個看來，根本還是錯誤的。

由於無產階級逐漸抬頭，資產階級顯露出保守性，日趨反動，反映到思想意識上就是丟棄了唯物論思想，採取唯心論作爲自己的武器。十八世紀的英國出現了唯心的經驗論，代表者是柏克萊，休謨。唯心的經驗論取消了唯物經驗論的僅有的，合理的，唯物的思想，對感性的認識作了極爲片面的曲解，所以是極端錯誤的思想。唯心的經驗論不承認（或懷疑）感覺是由獨立於人類意識的客觀事物所引起的，只承認感覺有片面的主觀的性質，人永遠局限於各自的感覺圈子裡逃不出去。經驗完全沒有客觀性，經驗只是主觀的反省，主觀的體驗。十九、二十世紀的反動的實證主義，馬哈主義、新實在論、實驗主義等骨子裡都是這樣的思想。

經驗論者，將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應用到對意識的分析上。他們把理性看

成爲極簡單的東西。理性與感性並無重要的區別，普遍的知識只是簡單觀念之集合，結果將基本上與感覺不同的理性知識還原爲簡單的性質上相同的觀念，這等於取消了理性認識。經驗論者不了解自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的「突變」「躍進」。取消了理性，也就是自願停留於表面的感覺到的現象。這就把握不了事物的本質。，這就承認事物是不可理解的。這就是引導到主觀主義，唯心論去的主要道路。這就形成了狹隘的經驗論、懷疑論。

經驗論這種錯誤的認識論是滿足於局部經驗的人們的思想的系統化，反過來也就必然成爲一切庸俗的事務主義、經驗主義的根源與理論基礎。『庸俗的事務主義家……尊重經驗而看輕理論，因而不能通觀客觀過程的全體，缺乏明確的方針，沒有遠大的前途，沾沾自喜於一得之功與一孔之見。這種人如果指導革命，就會引導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

四　康德的錯誤

在資產階級哲學家中，康德關於認識問題說的話最多，而且有他一整套。他看出唯理論和經驗論死守着感性認識或理性認識的毛病，於是努力將二者機械地結合起來（「直觀無概念則盲，思想無內容則空」）。

康德認爲：感性的能力是直觀，直觀的形式是空間、時間，在直觀的形式中，我們只能覺察到印象的方向與地位，悟性（理性）的能力是思惟（判斷），它的形式是範疇（因——果，本質——附性等等），只有在直觀形式與思惟形式的交織中，我們才能認識事物的存在和關係（如必然的同時存在，先後存在，交互關係等等）——這就是人們所認識的現象界（宇宙的表象）；而現象界後面的本體（宇宙的眞象）爲不可知。（不可知論）。他這個認識方法是「反求諸已」的「先驗方法」：考察認識主體的能力和條件。他以爲掌握住認識的能力和條件，外界也就被認識了。所以他全力地分析時空、範疇，使它們依附認識的主體，他努力「證明」外界的法則，即是人心的法則（自然律即思想律），將世界完全顚倒過來，使自然服從人心，認識是理性的自然認識——這是十足的主觀唯心論。

他在進行認識自然之先，先去研究認識能力本身（感性、悟性、理性），就是說，他首先將待認識的東西，從認識過程中分裂出去。（此即黑格爾所諷刺他的學游泳而又不肯下水。）切斷了自然作用於主體的一面。而專從事於孤立的，機械的分析感性及其「先天形式」（空間，時間）悟性及其「先天形式」（範疇）再用這類的「先天形式」去說明經驗，說明科學（的事實）：如：從空間之爲「純直觀」証明幾何是可能的，再從幾何之爲科學這件事實——幾何是由一切感性經驗解放出來的科學——去証明空間爲「純直觀。」

他不知道，幾何是和一切其他科學一樣是從人類實踐產生出來的。

同樣從範疇之爲「純概念」，去證明「純自然科學」（力學）是可能的。

馬克思說：自然知識「只是由商業和工業，由人類感性活動才達到它的目的，和取得它的材料的。」（「德意志意識形態」）。除掉人類實踐，那裡有所謂「純自然科學」？

還有「純概念」在他是從邏輯（判斷形式）引申出來的，如假言判斷：「如果A——則B」是純悟性的產物，它是可靠的（必然的），由此推演出來的：因——果「純概念」，也是可靠的（必然的），我們即以此保証先後發生的經驗是合乎條理的——「純自然科學」即是描寫這類經驗的科學——因此（！）自然界是有條理的。（自然律服從思想律）。

他不以邏輯的規律，是人類實踐的結果，又用回去指導經驗，而說它們是「純悟性」所創造的規律。

既然純悟性有此功能，故它是具有統一性、綜合性、常住性的，爲「認識的主體」，它在人人是畢同的（同一的），所以人們才有共同的知識（自然科學）和被自然科學所說明的自然界。自然界是在認識的過程中成立的，也就是說，自然是被我們所創造的，沒有「認識的主體」和它的主觀形式（空間、時間、因——果等：）「則觀念界還抵不了一個夢」——觀念在康德不是外界的映象！

甲、這樣的「認識的主體」，是「理論的人」，「抽象的人」，而決不是勞動的人，生產的人，此之謂主體的分裂——人的二重性。

乙、既將自然從認識過程中分裂出去，就必然產生客體的分裂——自然的二重性：a經驗中的自然（現象），b經驗外的自然（「物自體」）

a、b，是質的分別，原則的分別。

恩格斯指出康德的錯誤說：『把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學遁辭駁斥得最撤底是實踐，即實驗和工業。既然我們能以親自製造出自然界某一現象，依它的條件把它產生出來，並使它服務於我們目的的事實來証明我們對於這一現象認識的正確，那麼，康德的那個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算完結了。』由人二的

重性及自然的二重性是無法認識客觀眞理的；這是唯心論的認識論必然的結局。

認識的活動中，不包含實踐；實踐的積極的意義，拿到道德範圍內發揮去了。

五　黑格爾的錯誤

在認識問題上，黑格爾確實邁進了一步。「實踐在黑格爾那裡，是作爲分析認識過程中的環節，並且正是作爲到客觀的（絕對的——按黑格爾的說法）眞理的推移」（列寧：「哲學筆記」），黑格爾在「小邏輯學」中曾指出：爲着要獲知甚麼是事物中的眞理的東西，只靠一個注意是不够的。這必須要有我們的直接改造存在物的主觀活動。他在邏輯學中論到客觀性時，又曾指出實踐是從主觀概念與主觀目的到客觀眞理的過渡；列寧在這裡就稱讚他爲「接近了人以自己的實踐來証明自己的觀念，知識，科學的客觀正確性這一點了」（列寧：「哲學筆記」）。在這一點上，黑格爾可以說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的先驅者，列寧在哲學筆記中就曾明白地說：「馬克思是直接隣接着黑格爾，將實踐這標準放在認識論中」。

可是，在這個問題上，黑格爾的唯心論基礎，使它終於不能達到正確的結論。誠然，黑格爾是說到了人的活動對客體的積極的關係，亦說到了實踐是眞理的標準；可是，首先，在黑格爾全部現實是被溶解於思想之中的，因而他所謂客體、自然，亦不過只是思想，觀念；由此，他所謂活動、實踐等，亦只是由思想出發，附屬於思想的東西。在上文所引「小邏輯學」中的那幾句話，說明直觀不足辯識眞理而需有直接改造存在的活動之後，黑格爾隨即補充說：「只有通過用沉思來製定的改造直接的東西，才能達到對本體的認識」。既然客體與主體同樣都是思想，那麼主體與客體之間的一切交互作用，當然只不過是通過沉思。這樣，所謂活動，就是思想對自己的遊戲。所謂改造，就是思想改造自己。這就在實際上根本抹殺了客觀現實這一面，這正是馬克思所要批判的。馬克思說：

「……與唯物論相反，唯心論發展了活動這一方面；但是只是抽象地發展了，因爲唯心論當然是不知道眞正的現實的感覺活動的」（馬克思：費爾巴哈論綱）

這就可見，黑格爾雖然如同像列寧所說只是在觀念的辯證法中猜到了事物的辯証法一樣，在認識論上，亦猜到了實踐在認識上的某種作用，可是由於他的唯心論的作祟，結果是被在根本上完全抽空，因而絲毫也沒有說明認識與實踐之間的眞正的關係。

六　費爾巴哈的錯誤

舊唯物論的根本的缺點，在於它的直觀性，即被稱爲「恢復了唯物主義應有權威的哲學家」的費爾巴哈也不是例外。就是說，在人和自然的關係問題上，舊唯物論採取了這樣的看法；即一方面存在着自然，另一方面站立着局外的觀察者——人。馬克思在費爾巴哈論綱中一開頭就指出：

「從前一切唯物論，連費爾巴哈的唯物論也包括在內，其主要的缺點就在於只是在客體的或直觀的形式下來把握事物、現實，感覺界；而不是作爲人的感覺的活動，實踐，即不是主體地來把握。」

舊唯物論的這種直觀性顯然要引導到另一缺點，就是機械性。人既是僅僅在觀察着自然，那麼他就只是消極的，被動的，單方面地被決定於自然，而絲毫沒有積極的能動性，不起作用亦無所影響於自然。這樣，舊唯物論就有着消極的宿命論的傾向。

機械性又必然引導到庸俗性，既已把人理解爲只是在自然規律下的機械的東西，而又不能否認人確有所活動這一事實，於是當然只能把人底活動僅就生理的「情慾」這種低度來理解，費爾巴哈和其它舊唯物論者一樣，就把實踐看作是屬於卑汚的、低級的、與認識無關的「情慾」的領域。他曾說：『……實踐的觀點，飲食的觀點……』；他還有一句名言：『人就是他所吃的』。他把實踐歸結爲僅僅飲食，他只是生理學地和物理學地去了解人，而沒有看到人還是社會的和歷史發展的生物，沒有看到人還有勞動生產這種積極的活動。馬克思批判費爾巴哈說：

『他在「基督敎底本質」一書中，只把理論活動才看作是眞正人的活動，而把實踐則只在汚穢的猶太人的表現形式上加以理解和確定。因此他不了解革命的即實踐——批判的活動的意義』。

這幾句話，就指出了費爾巴哈的唯物論的直觀性和庸俗性；說明着他根本沒有正確地理解到實踐本身的意義，當然更沒有看到實踐和認識的關係。

這樣說來，費爾巴哈底錯誤是在：首先，對於人和自然的關係了解不正確。在人和自然的關係上，他是把人當作自然的一部分，當作單純地被動的東西來看待，把人放在消極的、無能爲力的地位上，而不知道人是在自然規律之下而同時亦有其主觀的，積極的能動作用。由此，它對於人類的實踐活動，也就不能正確理解其性質，從而更不能正確理解其對自然的作用。舊唯物論的這種錯誤理解，歸根結底，是在於它離開人的社會性和人的歷史發展而去觀察人，在思想方法論上說，亦就是孤立地、靜止地，亦即抽象地而非具體地去觀察人。由於這一根本的理解上的錯誤，舊唯物論在理解歷史和社會現象時，就不得不陷入唯心論的泥沼；而在認識問題上，則是不能正確了解認識和實踐的關係。毛主席在「實踐論」上開頭就指出

「馬克思以前的唯物論，離開人的社會性，離開人的歷史發展，去觀察認識問題，因此不能了解認識對於社會實踐的依賴關係即認識對生產與階級鬥爭的依賴關係」。

七　美國實用主義的錯誤及其反動性

很多人都覺得馬列主義的認識論注重實踐，與美國的實用主義有些相同。詹姆士和杜威有許多話，表面看來，似乎也很接近毛主席的「實踐論」其實是根本不同的。我們現在要指出何以詹姆士杜威的實用主義完全是唯心的、反動的、爲帝國主義服務的。

實用主義者主張「實效考驗」，認爲實際效用是眞理的標準，好像與毛主席所說的「馬克思主義者認爲只有人們的社會實踐才是人們對於外界認識的眞理性的標準」有些相似。

毛主席說：「人的認識一點也不能離開實踐」。杜威也認爲知識起源於行爲，行在先，知在後，人的知識或概念簡直就是一系列的動作或行爲形成的。毛主席說：「你要有知識，你就得參加變革現實的實踐。」杜威也說：「你要知道一個對象，你必須改變那對象。」

如果只是孤立地抽象地從字面去比附，會以爲兩種學說是太相同太接近了。然而試進一步從唯物觀點，辯證方法及無產階級立場三方面去檢查，則美國的實用主義的矛盾性與反動性就明白暴露出來了。

第一、詹姆士及杜威表面上雖然反對康德黑格爾的唯心論，然而他們的世界觀基本上都是唯心論，而且是列寧所嚴格批判了的馬赫主義的唯心論。詹姆士將純粹經驗論，認爲世界的原始材料是純粹經驗。心物以及事物的關係都是從這純粹經驗派生出來的。（羅素的中立一元論亦自此說出發）杜威在他的「經驗與自然」一書中，將經驗與自然等同了起來，一方面認爲物質、外物、自然事實等都只是經驗，一方面又認爲人的幻想、夢囈、先驗觀念等也是經驗，也是自然事實；經驗之外，更無所謂自然和物質。這不顯然與馬赫派的唯心論者一鼻孔出氣嗎？

第二、實用主義的認識論注重行在知先，重視實效考驗，然而過分地强調了科學與工程實驗的考驗，而全部忽略了歷史的社會實踐的考驗，却適足證明其爲剝削階級服務的立場，他們過分强調「眞的就是有用的，有用的就是眞的」，認爲一切眞理都是假設，都是工具，都必須放在行爲的實效中去証實，其實所見到的只是某一個特定的個人或某一個特權階級的利益，完全爲資產階級打算，其所謂實效是非常主觀，非常狹隘的，根本見不到客觀事物規律的必然性。所以實用主義者犯了嚴重的唯心主觀主義與相對主義的錯誤，只是盲目地冒險嘗試（嘗試錯誤式的教育方法）他們把一切眞理都看成假設，看成暫時使用的工具，看成一個相對的偶然的東西，否認了客觀規律的必然性，以及假設証實後的必然性，結果認爲人生只是一場冒險，陷入主觀的浪漫的嘗試主義與冒險主義，他們不知道相對眞理與絕對眞理的辯証關係，武斷眞理是個主觀的東西，完全缺乏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正反映着美國反動資產階級目光如豆，橫蠻專斷。

第三、實用主義者認爲知識必須改變對象，但只是社會改良主義，與徹底改造社會的革命思想完全無關。詹姆士只談個人的神秘宗教經驗，根本與社會脫節。杜威雖然口口聲聲注重社會性，却只是枝枝節節，頭痛醫頭，脚痛醫脚，只是瑣瑣屑屑地談問題，不敢談澈底改造社會的主義。實用主義表現在行爲上就是專家主義，技術觀點，這種改變對象的認識論，不但對資本家毫無損害，而且正好可以替資本家解決技術問題，爲資本家服務。不知道辯証法，不注意社會現象的全面，不理會社會發展的規律與革命實踐，改變對象便只不過是徒托空言而已，不但無益，而且有害。

我們明明白白地看到美國的實用主義是爲美國反動資產階級服務的御用哲

學。當一個國家發展到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即成爲帝國主義的時代，作爲反映這個時代與社會的哲學是只有反動性，決不會有進步性的。

至於實用主義的階級性，明顯地是屬於美國反動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美國著名的實用主義教授H，W施耐德爾在他的著作美國哲學史中說，政治上的實用主義，就是「權力學說，它是多元的和機會主義的」，「它提供了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學說的實際代替品。」這話說明了，實用主義是反動資產階級用來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武器！絕對不能與毛主席的「實踐論」相提並論，魚目混珠。

杜威在一九一九年五月一日到中國，正在『五四』的前三天。他到各地講演。二十多年以來大批留美學生回國，宣傳美國的思想與教育。故此「五四」以來，實用主義對中國知識分子有不少的壞影響。主要的它使中國知識分子脫離了人民，不能與工農結合。一些中國知識分子留戀着實用主義科學的僞裝，沒有弄清楚它的有毒素本質。胡適宣傳實用主義，提倡『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這是他從實用主義得到反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利器，反對馬克思主義從社會發展規律解決國家的問題，而只承認點滴改造的社會改良主義的學說。他提倡狹隘的證據的方法，作枝節的學問研究，使青年看不見社會歷史的發展，改造社會的革命的遠大的前途，當時李大釗先生提出反駁，以爲『一個社會的解決，必須靠着社會上多數人共同的運動。』『必須有一個根本解決，纔有把一個一個的具體問題都解決了的希望。』二十多年以來我國知識分子走着革命的和反革命的（或不革命的）兩條道路，凡是不脫離實用主義的，都停止在社會上層的剝削階級當中，不能與工農結合，不能爲人民服務。學習毛主席「實踐論」，我們必須肅淸實用主義殘餘的思想。

八　結論

我們在上面所批判的幾個人物，幾派哲學，除實用主義外都是馬克思主義出現以前西方資產階級哲學中代表的人物或代表的學派。我們指出這些人物和學派在認識論上的錯誤；或者偏重感性認識（經驗論）或者偏重理性認識（唯理論），或者雖表面上作感性認識與理性認識的結合，其實是機械的，虛僞的結合（康德）；而各個人物，各個學派犯錯誤的原因，都是由於他們不了解實踐在認識中的地位。

既是一切的舊哲學有共同的錯誤是在脫離實踐，因此也就不能回答人類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馬克思主義正好來完成這一件偉大的歷史任務。毛主席說：認識既從實踐發生，而又服務於實踐。列寧說：「實踐高於（理論的）認識，因爲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有直接現實性的品格」。在實踐問題上，資產階級哲學與無產階級哲學中間劃了一道鴻溝。使兩個哲學營壘，分明對立起來，强烈地標幟着兩個階級不同的興趣，不同的利益。所以新舊哲學之間，是連續性中斷的質變。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和德國古典哲學（康德、黑格爾、費爾巴哈）鬥爭中產生出來的。我們不應該强調他們的相似與聯系，而要强調他們間原則上的區別。德國的唯心論（包含左派黑格爾左派在內）都以爲意識的解放，人類即獲得自由。人生是意識的活動，意識到自由，即是自由了。馬克思主義者嚴格地分別意識的自由和人生的自由；因爲意識的解放，不等於人生的解放，而要求意識解放，「意志自由」，正是一切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一切機會主義的特色。他們替資產階級辯護，掩蓋資產階級的剝削，因此也掩蓋他們哲學的黨性和階級性，不敢面對實踐問題。和他們相反，無產階級在人類面前，敢於公開他的哲學的黨性和階級性，也將實踐性提到認識論中主要的地位，以與資產階級在思想上作不妥協的鬥爭。

毛主席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指出，在蘇聯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時候，『也只在這時，中國人從思想到生活，才出現了一個嶄新時期。中國人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眞理，中國的面目，就起了變化了。』

嶄新的社會，必然地要產生出嶄新的意識形態。多年來，我們在大學裡用西洋資本主義哲學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灌輸青年，走資本主義的思想道路，我們也有儒道雜糅，儒佛雜糅，中西雜糅的「新體系」，這也許是人民日報（一月二十九日）社論所指的：「在近代中國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裡面，流行過各種形式的神秘主義和經驗主義的思潮，企圖建築一些空中樓閣的反動哲學。這類反動思潮和反動哲學都已在人民革命實踐面前，一一宣告破產了。」

我們學校中人，雖在理論上接受馬列主義的思想，而在實際上還是沒有脫離或沒有完全脫離自己研究多年的哲學束縛，因此在思想方法上，在工作方法上都自覺地或不自覺地受了很大的限制。

讓我們學習毛主席的「實踐論」，「改造我們的學習」。

「實踐論」——政治經濟學的道路

郭大力

「實踐論」的中心論題，是關於人類認識的本質，關於認識和實踐的關係。「實踐論」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理論，證明了『認識對社會實踐的依賴關係，即認識對生產與階級鬥爭的依賴關係。』這個論文科學地說明了，認識要從實踐出發，要在實踐中由感性階段深化為理性階段，要由實踐來證明，最後還要跟實踐一同向前發展。

政治經濟學的思想發展，就是「實踐論」裡而包含的眞理的最確實的證明——『理論的基礎是實踐。』

這是大家知道的，馬克思的經濟學說，繼承了十九世紀初期英國政治經濟學的優秀成果。但馬克思不是簡單地繼承它。他拋棄了它的糟粕，發展了它的價值學說，創造了科學的剩餘價值理論，並由此得到結論：資本主義的滅亡，是無可避免的。這個理論和當時及以後的無產階級運動，是分不開的。不待說，馬克思的天才條件在這裡有重大的作用。不過把這個偉大的成就，簡單地歸因於個人的天才，是不够的。馬克思是生在資本主義時期。他已經完全置身於無產階級的革命實踐，所以他能够認識無產階級的革命需要，能够認識資本主義社會的規律，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革命的規律。

這又是大家知道的，列寧和斯大林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列寧和斯大林分析了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帝國主義階段，並由這種分析指出了：由於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社會主義有可能在單獨一個國家獲得勝利。這個理論，和一九一七年俄國的社會主義十月革命，是分不開的。不待說，列寧和斯大林的天才條件在這裡有重大的作用。不過，把這個卓越的成就，簡單地歸因於個人的天才，也是不够的。他們是生在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階段。他們已經完全置身於無產階級的革命實踐，所以他們能够認識無產階級的革命需要，能够認識資本主義社會的規律的新發展，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革命的規律的新發展。

這又是大家知道的，毛澤東同志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他分析了中國的具體情況，指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革命必須分為兩個階段：新民主主義的階段和社會主義的階段。『我們現時的革命，是在做第一步。』這個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勝利是分不開的。不待說，毛澤東同志的天才條件在這裡有重大的作用。不過，把這個偉大的成就，簡單地歸因於個人的天才，又是不够的。毛澤東同志生在帝國主義侵略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事實上，也只有一個數十年不斷置身於中國革命實踐的人，加上他的天才條件，才有可能完全地深刻地認識中國社會發展的規律和中國革命的規律。

在政治經濟學理論範圍內看到的如下的事實，也恰好做了「實踐論」的眞理的證明。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不拘守馬克思主義的個別教條，但經常與實踐相結合，跟實踐一同前進。

列寧是最忠實於馬克思主義的。列寧為要實現無產階級實踐的最高表現——馬克思主義——貢獻了他的一切。這一位最忠實的馬克思主義者，同時就是最能靈活運用馬克思主義原則的人。他不拘守馬克思主義的個別文句，但把它發展成為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斯大林說得對，『列寧不僅是馬克思、恩格斯學說的繼續者。他針對着新的發展條件，針對着資本主義的新階段，針對着帝國主義，而向前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學說。列寧在階級鬥爭的新條件下，向前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學說。』

毛澤東同志是最忠實於馬克思主義的。毛澤東同志為了實現無產階級實踐的最高表現——馬克思主義——貢獻了他的一切。這一位最忠實的馬克思主義者，同時也是最能靈活運用馬克思主義的人。他不拘守馬克思主義的個別文句，而針對着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創造性地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應用和發展於中國具體的條件。劉少奇同志說得對：『我們的毛澤東同志是天才的創造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將人類這一最高思想——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眞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而把我們民族的思想，提到了從來未有的合理的高度。』

我們這些有志於經濟理論工作的人學習「實踐論」，任務還不僅是由經濟

理論，來證明「實踐論」的眞理；更重要的，是實踐地，把這個眞理應用到政治經濟學的理論研究上而來。『從實踐始，經過實踐得到了理論的認識，還須再回到實踐去。』——『通過實踐而發現眞理，又通過實踐而證實眞理與發展眞理。』——着重實踐，把實踐放在第一位，這就是「實踐論」指示給我們的方向。

這個教訓，爲什麼對於我們這些有志於經濟理論工作的人會特別重要呢？這就是因爲，雖然在我們這些研究經濟理論的人中間，個別的成就還是有的，但一般而言，我們應當承認自己還是小學生。爲什麼我們不能有更多一些成就呢？除了別的原因，我想，是應當特別指出這一點來的：我們大部分從事理論工作的人，是和實踐，和生產及階級鬥爭的實際活動離得遠了一些了。只要忘記了我們的任務不單是說明世界，並且還更是改造世界，我們就很容易發生一種錯覺，好像我們的任務，就只是理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某一些理論，或者更多一些，應用它們來說明一些可以在日常生活上碰着的問題了。由這種錯覺引起的必然的結果，就是過分重視書本知識，以致忘記了，這些記載在書本裡面的有價值的理論，也只是前人由實踐獲得的，在實踐中深化的，由實踐證明的；並且忘記了，這些東西之所以可貴，還只是因爲它們是服務於實踐的，不是死的教條，但經常能够和具體的實踐相結合。

並且，一經有這個錯覺，我們就只可能同那些只搞日常事務，不能從經驗抽出高級認識——理性認識的人一樣，成爲『思想上的懶漢』了。

但是，甘心做一個『思想上的懶漢』的理由，在那裡呢？因爲引經據典更不易犯錯誤麼？因爲我們沒有新的問題，沒有眞實的材料，值得研究麼？當然都不是的。所以，主要的理由，還是我們沒有懂得實踐的重要；沒有懂得，離開實踐，我們就無從給我們的理論以新的生命；並且，沒有懂得，離開實踐，我們能够做的，就不過是一些既成理論的反覆咀嚼。

離開實踐，因此就限制了並且消滅了我們在思想工作上的創造性。離開實踐又還不僅僅限制了我們在思想工作上的創造性。它也阻礙了我們的學習。

拿馬克思「資本論」的學習來做例好了。

讀「資本論」的目的，當然是爲了理解它的內容。但是，如果我們在讀這一部著作時，竟然忘記了這個著作的重要目的，是科學地解剖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指出它的運動規律，忘記了它所以成爲無產階級的聖經，就因爲它是一部和實踐——無產階級的革命實踐——分不開的著作，因爲它曾經向全世界的工人階級指出革命的道路，並由此加强了無產階級的革命信心，我們又能從那裡得到一些什麼呢？如果我們忘記了這些，我們能够做的，自然就只是從它的外形，理解一些表面的皮毛了。

但是，從單純外形看到的「資本論」，和在革命實踐聯繫中看到的「資本論」，將會是全然兩樣的東西。這是爲了什麼呢？馬克思自己說到他在「資本論」所用的研究方法和說明方法時，曾經告訴我們：

『說明的方法，在形式上當然要與研究的方法相區別。研究必須搜尋豐富的材料，分析它的不同的發展形態，並探尋出這種種形態的內部聯繫。不完成這種工作，便不能對於現實的運動，有適當的說明。不過，這一層一經做到，材料的生命一經觀念地反映出來，看起來我們就好像是先驗地處理一個結構了。』

以價值實體的理論來做例。馬克思說，價值的實體，是抽象的同一的人類勞動。這是一個科學的，基礎的理論。但是，如果我們在學習這個理論時，竟然忘記了人類在交換行爲中億萬次的經驗，忘記了這裡所說，只是人與人間的現實關係，忘記了商品的生產過程，忘記了無數小生產者的剝奪過程，忘記了在這個基礎上形成的資本主義剝削關係，忘記了階級鬥爭，而以爲這裡處理的，只是勞動與價值這兩個概念的關係，我們又將會獲得什麼結果呢？唯一的結果，怕就是用反覆而無味的咀嚼，來代替現實關係的研究了。如果我們以爲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處理的，好像只是一些概念間的關係。那末，儘管我們口頭上反對資產階級經濟學，事實上，我們在研究方法上也就是把自己壓低到和資產階級經濟學不相上下的水準了。

資產階級經濟學者只是處理一些概念間的關係，把經濟理論看成是概念的堆積和結合，却是當然的。

儘管在早期資產階級經濟學者中，已經有了科學的政治經濟學的某種萌芽，即勞動決定價值的學說，但自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爆發爲公開的鬥爭以來，自資產階級脫離生產機能，而只留下剝削機能以來，資產階級經濟學早已墮落成爲不知羞恥的辯護了。因此，概念的游戲就代替了科學的分析。七十餘年前，關於資產階級經濟學，馬克思已經說過如下的話：

『從此以往，成爲問題的，已經不是這個理論還是那個理論合於眞理的問題，祇是它於資本有益還是有害，便利還是不便利，違背警章還是不違背警章的問題。超利害關係的研究沒有了，代替的東西是領津貼的論難攻擊，無拘束的

科學研究沒有了，代替的東西是辯護論者的歪曲的良心和邪惡的意圖」。

資產階級的經濟學早已經完全腐化了。獨佔資本家完全不敢面對眞理，他們的代言人也完全不敢。獨佔資本家完全不敢正視現實關係，他們的代言人也完全不敢。因此，他們能够做的，就不過是在一些沒有內容的空虛的概念上面打轉轉了。

難道我們也有什麼理由，要同他們一樣，在一些空虛的概念上面打轉轉麼？

我們，每一個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旗幟下的理論工作者，是沒有任何理由要這樣做的。這樣做的結果，就是把馬克思的經濟學看做公式，而忘記了那是行動的指南；就是把事情看得簡單，而忘記了現實關係是複雜的；就是把政治經濟學簡單地看成只是一種概念上的統一，而抹殺了現實存在的矛盾；就是把概念間的關係看成不變的，而不知道現實關係是不斷變動的。因此我們有的，將只是若干概念間劃成的循環，但永遠不能從這種循環找到出路。是形而上學的，但決不是辯證法的。這件事，對於一個有志於成爲馬克思主義者的人，自然是一件非立即挽救不可的事情。

挽救的方法，就是接近於實踐，置身於實踐，把理論和實踐聯系起來。只有從實踐出發，我們方才有可能眞正理解前人的理論，方才有可能靈活運用前人的理論，並且才有可能把理論提高一步。

把理論和實踐結合起來，我們的政治經濟學就有了這個新的重大的任務：運用馬列主義的基本原則，來理解新民主主義經濟內包含着的生產力、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理解它的本質，並由這種理解，來理解它的發展規律。新民主主義是一個過渡的階段。這個過渡階段的歷史任務，是爲中國革命的第二階段，創造必要的物質基礎，卽實現社會主義所必要的物質生產力。我們的政治經濟學將盡其全力，用它的理論，來加强我們對於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成功的信心，並加强我們對於新民主主義和平進入社會主義的信心。這將是毛澤東的政治經濟學，是在毛澤東思想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政治經濟學。

(註一) 劉少奇：「在北京第三屆人民代表會議上的講話」。
(註二) 毛主席：「新民主主義論」第五節。
(註三) 毛主席：「論聯合政府」第四章中「我們的一般綱領」節。
(註四) 同註三
(註五) 中央人民政府關於省市縣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組織通則。
(註六) 同前
(註七) 謝覺哉：「關於人民民主建政工作報告。」
(註八) 周恩來：「關於共同綱領的報告」。
(註九)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一日新華社消息。
(註十) 董必武：「一年來中央人民政府在政治法律方面的幾項重要工作」。
(註十一) 列寧：「國家與革命」，解放社版，一一三頁。
(註十二) 列寧：「國家與革命」，解放社版，頁五三—五四。
(註十三) 馬克思：「法蘭西內戰」，解放社版，頁七二。
(註十四) 同註一。
(註十五) 同註五，每個條例的第五條都有這樣的規定。
(註十六) 列寧：「我國革命中無產階級的任務」，英文本•頁三十七。
(註十七) 同註一。
(註十八) 同註一。

（上接第6頁）由限制自由經濟走向完全計劃經濟，由容許部份爲利潤而生產走向爲人民利益而生產。像這樣有步驟、有計劃、有領導的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建設工作，沒有一個以勞動人民及共政黨爲領導，團結着極廣大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政權，那是根本不可能辦到的。所以，要發展我們國家的新民主主義的工業化，就更要發展我們新民主主義的民主政治。

× × ×

一年來人民代表會議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一切成功的基礎，是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毛主席的政策，是一切人民代表會議和人民代表大會的活動的最重要的基礎。中國共產黨對於各級人民代表會議和代表大會實行它的領導，可是它絕不是包辦代替這些人民代表會議和人民代表大會，絕不對它們的工作從事掣肘。恰恰相反，黨的領導方面經常指示各級黨員應當力圖密切黨羣的關係和黨與其他黨派的關係，加强統一戰線的工作，努力把各級人民代表會議和代表大會搞好，把全國絕大多數的人民團結在人民代表會議和人民代表大會之內和它們的週圍。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不可否認地，是中國人民在創造的新型民主制度的强大有力和不可戰勝的基礎！

一九五一、三、廿二、北京

「實踐論」解說（二）

李達

『這種基於實踐的由淺入深的辯證唯物論的關於認識發展過程的理論，在馬克思主義以前，是沒有一個人這樣解決過的。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第一次正確地解決了這個問題，唯物地而且辯證地指出了認識的深化的運動，指出了社會的人在他們的生產與階級鬥爭的複雜的、經常反覆的實踐中，由感性認識到論理認識的推移的運動。列寧說過：『物質的抽象，自然規律的抽象，價值的抽象及其他等等，一句話，那一切科學的（正確的、鄭重的、非瞎說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確，更完全地反映了自然。』（註三）馬克思列寧主義認為：認識過程中兩個階段的特性，在低級階段，認識表現為感性的，在高級階段，認識表現為論理的，但任何階段，都是統一的認識過程中的階段。感性與理性二者的性質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離的，它們在實踐的基礎上統一起來了。我們的實踐證明：感覺到了的東西，我們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東西才更深刻地感覺它。感覺祇解決現象問題，理論才解決本質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一點也不能離開實踐。無論何人要認識什麼事物，除了同那個事物接觸，即生活於（實踐於）那個事物的環境中，是沒有法子解決的。不能在封建社會就預先認識資本主義社會的規律，因為資本主義還未出現，還無這種實踐。馬克思主義只能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馬克思不能在自由資本主義時代就預先具體地認識帝國主義時代的某些特異的規律，因為帝國主義這個資本主義最後階段還未到來，還無這種實踐，只有列寧和斯大林才能担當此項任務。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之所以能夠作出他們的理論，除了他們的天才條件之外，主要地是他們親自參加了當時的階級鬥爭與科學實驗的實踐，沒有這後一個條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秀才不出門，全知天下事』，在技術不發達的古代只是一句空話，在技術發達的現代雖然可以實現這句話，然而眞正親知的是天下實踐着的人，那些人在他們的實踐中間取得了『知』，經過文字與技術的傳達而到達於『秀才』之手，秀才乃能間接地『知天下事』。如果要直接地認識某種或某些事物，便只有親身參加於變革現實、變革某種或某些事物的實踐的鬥爭中，才能觸到那種或那些事物的現象，也祇有在親身參加變革現實的實踐的鬥爭中，才能暴露那種或那些事物的本質而理解它們。這是任何人實際上走着的認識路程，不過有些人故意歪曲地說些反對的話罷了。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識裏手（註四）』，有了道聽途說的一知半解，便自封為『天下第一』，適足見其不自量而已。知識的問題是一個科學問題，來不得半點的虛偽與驕傲，決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誠實與謙遜的態度。你要有知識，你就得參加變革現實的實踐。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變革梨子，親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組織同性質，你就得實行物理學和化學的實驗，變革原子的情況。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論與方法，你就得參加革命。一切眞知都是從直接經驗發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經驗，事實上多數的知識都是間接經驗的東西。這就是一切古代的與外域的知識。這些知識在古人在外人是直接經驗的東西，如果在古人外人直接經驗時是符合於列寧所說的條件：『科學的抽象』，是科學地反映了客觀的事物，那末這些知識是可靠的，否則就是不可靠的。所以，一個人的知識，不外直接經驗的和間接經驗的兩部份。而且在我為間接經驗者，在人則仍為直接經驗的。因此，就知識的總體說來，無論何種知識都是不能離開直接經驗的。任何知識的來源，在於人的肉體感官對客觀外界的感覺

，否認了這個感覺，否認了直接經驗，否認親自參加變革現實的實踐，他就不是唯物論者。『知識裏手』之所以可笑，原因就是在這個地方。中國人有一句老話：『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這句話對於人們的實踐是眞理，對於認識論也是眞理。離開實踐的認識是不可能的。」

如上所述，在社會實踐的過程中，外界事物作用於人們的感官，便引起感覺，人們就把感覺的材料進行思惟，引出論理的結論。像這樣由外物到感覺到思惟的認識過程之科學的說明，是馬克思所首創的偉大的業績。在馬克思以前，關於感性與理性的關係如何一問題，總沒有一個哲學家曾經正確的解決它。就一切唯心論哲學家來看，他們有一個共通的原則，就是主張精神是本源的東西，物質世界及其規律性，都是精神的產物。他們根本否認精神以外還有物質世界存在，因而否認認識是外界事物及其規律性的反映。他們主張認識的各種因素，如感覺、經驗、印象、概念等，都是主觀意識中所固有的東西。他們以爲認識的任務，是在於把那些感覺、經驗、概念等加以組織，臆造出物質的事物及其規律性，這樣來說明世界。所以這種哲學是否認了物質世界的世界觀。他們把認識過程，封鎖於純主觀領域中，與外界事物完全隔離，他們把認識當作純主觀的意識的活動，對於感覺與思惟的關係如何的問題，各憑自已的主觀來解答。有的唯心論者，例如巴克列，把主觀的、內省的、感性的經驗，作爲認識的惟一對象，否定論理的概念對於認識所具有的意義。有的唯心論者，例如萊卡尼茲，主張祇有思惟能給人們以正確的知識，而感覺是不能相信的。直到黑格爾，才在唯心辯證法上企圖解決這一問題，他主張認識的運動是由感性到理性。但他雖然承認感性是認識的始點，却否認感覺是外界事物的反映，不能改造感覺的豐富材料，以到達於論理的認識，他以爲認識越是上升到高級階段，就越發遠離於感性，逐漸與感覺的具體性相分離，因而思惟與感性就不能保持聯繫。所以黑格爾對於論理的認識一階段，雖然發表過很貴重的思想，但在全體的方向上，完全是唯心論的。

其次，就唯物論的哲學家來說，他們雖然都主張物質規定精神，承認認識過程中各種因素都是外界事物的映像，却都沒有理解感覺與思惟的正確關係。有些唯物論者，認定感性經驗是認識的眞實源泉，却輕視思惟的意義。例如洛克認爲思惟過程中所發生的複雜概念，不反映眞實的事物，有的唯物論者，例如斯賓諾沙，認爲眞實的認識由理性所發掘，不需要感性的幫助，直到費爾巴哈，才正確地提起感覺與思惟關係的問題。他主張思惟依存於感覺，思惟的法則依存於感覺的眞理性；感覺不單對思惟提供材料，並且是對於外界事物的論理認識的基礎；思惟是在感覺中去發見聯繫，不是自已去創造聯繫，這種主張是正確的。可惜他缺乏實踐的觀點，不能理解認識對於社會實踐的依賴關係，祇知道認識是受動的反映，不知道認識還是能動的反映，所以他雖正確地提起這一問題，却不能現實地解決這一問題。

祇有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才第一次正確地解決了這個問題，唯物地而且辯證地說明了人的認識過程是在實踐中由感性認識推移到理性認識的過程。感性的認識是屬於事物之片面的、現象的、外部聯繫的東西，爲要從感性認識推移於論理認識，就必須就那感性的材料，進行具體的分析，實行抽象。這樣抽象出來的東西（論理認識），和感性材料比較起來，其內容是好像比較空虛了，並且距離外界事物也比較遠了，但它却『更深刻、更正確、更完全地反映了』事物。例如我們就感性上所反映的千差萬別的物質的東西（自然的和社會的），抽象其共通的『物質』這一普遍性（離人類意識獨立的客觀實在），捨棄其千差萬別的個別性，構成『物質的抽象』。又如就感性上所反映的各種個別的自然現象，抽象其共通的規律性（即由一種形態發展到另一種形態的規律性）。捨棄其他各種個別的屬性，構成『自然規律的抽象』。又如就感性上所反映的商品的現象，抽象一切商品所共通的本質即價值，捨棄其各種物理學的、化學的、生物學的屬性，構成『價值的抽象』。這一類的抽象，是『科學的抽象』，即『正確的鄭重的』抽象，不是『瞎說的』任意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確，更完全地反映了自然』。

感性認識和論理認識，是統一的認識過程中的兩個階段。在感性的階段，人們祇能認識事物之片面的、現象的、外部聯繫；到論理的階段，人們才能認識事物之全體的、本質的、內部聯繫。這兩種認識，形成爲一個統一，即片面與全體、現象與本質、外部聯繫與內部聯繫、形成爲一個統一。這就是感性認識與論理認識的統一。所以這兩種認識，決不是各自獨立的認識階段，兩者完全是一脈相通的。我們說，在感性的階段祇能認識事物之片面的、現象的、外部聯繫，却不是說我們的感覺祇反映事物之片

面的，現象的外部聯繫，而不反映其全體的、本質的、內部聯繫。（若果這樣說，他就會成爲不可知論者）。實際上，事物之片面的、現象的、外部聯繫與其全體的、本質的、內部聯繫，是同時在感覺上完全給與着的，不過我們在沒有實行抽象的思惟之前，我們祇能有直覺的認識，即祇能理解其片面的、現象的、外部聯繫；而那些全體的、本質的、內部聯繫，是被片面的、現象的、內部聯繫隱藏着，必須要我們運用抽象的思惟才能發現它（譬如商品中隱藏的價值，要靠抽象才能發見它，不是肉眼所能看出的）。在思惟中所有的東西，已在感覺中給與着；感覺中所沒有的東西，思惟中是不能有的。思惟祇在感覺中發現本質，發見內部聯繫，決不是自己於感覺之外去創造本質，創造內部聯繫（祇有唯心論者才這樣做）。所以感性與理性二者的性質雖然不同，却不是互相分離的，他們都是統一的認識過程中的階段。

感性認識與理性認識的統一的基礎，是實踐。在實踐過程中，人們感觸到新的事物時，就開始來理解它。在理解它的時候，還是要感觸它（即實踐）。照這樣，一種新事物，在實踐中感覺了才去理解，在理解中再到實踐中去感覺，直到完全理解爲止。所以感性與理性認識兩者，是在實踐的基礎上統一起來的。

感性與理性，互相滲透，互爲條件。實踐證明：我們對於事物的認識，總是先感覺到它，然後才去理解它，並不能先理解了它，然後才去感覺它。這便是說，理性認識必須以感性認識爲前提。祇有我們對於事物的感覺隨着實踐的發展而發展了，我們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它。在另一方面，我們對於事物有了理解，才能更正確更深刻地理解它。譬如對於某種自然現象或社會事變發生時，在沒有科學修養的人，祇能有淺薄的直觀的認識，但在科學家看來，却能深刻地感覺到它。一九五〇年六月，美帝侵略北朝鮮的事變發生時，在理解了美帝國主義本質的人看來，立刻知道美帝的目的是要佔領全朝鮮，作爲進攻中國和蘇聯的基地。但在對美帝國主義本質全無理解的人看來，就說美帝之進攻北朝鮮，祇是偶發的事件，或者在北朝鮮與南朝鮮孰先進攻的問題中兜圈子，實際上作了美帝侵略的辯護人。所以感覺祇能認識事物的現象，理性才能認識事物的本質。但現象是本質的現象，本質是現象的本質。在實踐過程中，感覺與思惟互相發展，互相滲透，本質浮現於現象之上，而現象也轉變爲本質。於是認識便由感性推移於理性。由現象的認識進到本質的認識了。在天文學沒有發達的時代，人們看到月球是一個發光體（這是現象），但由於科學的試驗，就知道月球並非發光體（這是本質），它的光是由於日光的反射。於是現象與本質統一了。又如中了美帝的毒素的人，看到美帝有錢有勢，海陸空軍，非常強大，還有原子彈，就認美帝是個眞老虎（這是現象）。但是，人民領袖毛澤東，多年以前，早就認識了美帝在經濟上的腐朽性、寄生性和垂死性，認識了美帝國家內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尖銳的對立，以及美帝與英法等僕從國之利害的衝突，並且估計了世界人民與中國人民力量之壓倒的優勢等等，就斷定美帝是個紙老虎（這是本質）。這個紙老虎，在朝鮮遭受了朝鮮人民軍與中國人民志願軍的痛擊，已經現出了原形，即本質浮現於現象，而現象轉變爲本質（眞老虎轉變爲紙老虎）。

認識依賴於生產與階級鬥爭，如果沒有一定時代的生產與階級鬥爭的實況，就不能產生關於那個時代的階級鬥爭的革命理論。馬克思主義是在資本主義大工業發生而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鬥爭的時候才形成的。若在封建時代，既沒有資本主義的大工業，無產階級也沒有出現，就不能預先認識資本主義社會的規律，創造出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馬克思主義。馬克思所處的時代，是自由資本主義時代，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帝國主義還沒有到來，獨佔資本主義的各種特徵還不發達，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性，單獨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性還不顯著，所以還是處在『訓練無產者去幹革命的時期，在無產階級革命還不是必不可免的直接實踐問題的時期』（斯大林「論列寧主義基礎」）他當然不能預先具體地認識帝國主義時代的某些特異的規律，提出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具體指示。祇有列寧和斯大林才能担當此項任務，因爲他們『是在帝國主義充分發展了的時期，在無產階級革命開展着的時期，在無產階級革命已在一個國家獲得了勝利，打破了資產階級民主制，開闢了無產階級民主制紀元，即蘇維埃紀元時期活動的。』（見前書）。馬克思和恩格斯所以創造了馬克思主義，列寧和斯大林所以創造了『帝國主義與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列寧——斯大林主義』，一方面固然是由於他們的天才條件，而主要地是他們親自參加了當時的階級鬥爭與科學實驗的實踐。同樣，中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與俄國十月革命以前，也不可能有毛澤東思想。『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一百年來 ， 其優秀人物奮鬥犧牲，前仆後繼，摸索救國救民的眞理，是

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與俄國十月革命之後，才找到了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這個最好的眞理，作爲解放我們民族最好的武器，而中國共產黨則是拿起這個武器的倡導者、宣傳者與組織者。馬列主義的普遍眞理一經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就使中國革命的面目爲之一新」（「改造我們的學習」）。而馬列主義的普遍眞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之結合，正是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之所以鍛鍊成功，除了毛澤東的天才條件之外，主要的是從中國民族與中國人民長期革命鬥爭中生長和發展起來的。所以偉大的革命領袖的革命理論，都是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創造與發展的。

可是，中國有句古話：『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這豈不是說，知識是與實踐沒有關係了麽？『秀才』不參加於社會實踐也可以得到知識麽？那句古話，在交通和技術不發達，文化傳播不便利的時代，祇是一句空話。『秀才』祇不過從一些古書上『知』道一點天文、地理和人事，至於當時的新事變與新知識，卻不一定能够知道。到了近代，交通發達，技術進步，文化傳播也很便利，『不出門』的『秀才』當然可以多讀一點書，多『知』一些『天下事』，但那些知識，是天下眞正實踐的人在實踐中取得的『知』識，不過經由文字與技術的傳達，『秀才』才能間接『知天下事』。『秀才』從書本上得到的知識，原是別人在實踐中得到的知識。知識仍是離不開實踐。所以人們要直接地認識某種自然物，祇有在改造自然的過程中，親自接觸那自然物，才能認識它的規律性；人們要認識某一社會事變，祇有在社會鬥爭過程中，親自接觸那一事變，才能認識那事變的眞相。這是任何人實際上走着的認識路程。可是有些『知識裡手』，卻故意歪曲地說些反對的話，以爲知識與實踐無關。他們從別人那裡得到一知半解，便自以爲無所不知。或者從馬列主義書籍中，摘取片言隻語，拿來嚇唬人們，自以爲是百分之百的馬克思主義者。這樣的人，否認了參加變革現實的實踐，正是十足的教條主義者。『馬列主義是科學，科學是老老實實的學問，任何一點跳皮都不行的，我們還是老實一點罷！』（「改造我們的學習」）

一切眞知都是從直接經驗發源的。人要求得知識，必須參加變革現實的實踐。祇有在實踐中才能接觸到外界事物，發生感覺，積蓄經驗，然後就經驗實行思惟，才能認識外界事物的性質和規律，並且還要通過實踐證明了這一認識的正確，才算是眞實的知識。所以人們要知道自然物之物理學和化學的性質和規律，就必須實行物理學和化學的實驗；要知道革命的理論和方法，就必須到革命工作崗位上去鍛鍊。

所說知識發源於直接經驗，這是就認識與實踐的歷史性說的。事實上，我們不能事事直接經驗，我們的知識多半是間接的東西。我們學習馬列主義，學習毛澤東思想，就要閱讀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的著作，這些革命領袖的著作，都是他們革命經驗的科學總結，都是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正確理論，都是由革命的實踐證明了的眞理。我們從他們的著作學得的知識，是完全可靠的，問題是在於我們能不能把這些知識實際應用到革命建設的工作罷了。所以我們的知識，不外直接經驗的和間接經驗的兩部份。馬、恩、列、斯、毛的革命經驗，在我們是間接經驗，在他們卻是直接經驗。歸結起來，一切知識，都是不能離開直接經驗的。在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說來，一切知識的來源，都在於外界事物所引起的感覺，而感覺的積累便是經驗。人們如果否認感覺，否認經驗，否認親自參加生產與階級鬥爭的實踐，他就不是唯物論者，而是唯心論者，是教條主義者。『知識裡手』（即教條主義者）之所以可笑，原因就在這個地方。中國有句老話：『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虎子』是在『虎穴』之中的，你『不入虎穴』。當然不能得到『虎子』。同樣，革命的知識是從革命的實踐發生的，你不去參加革命，當然不能得到革命的知識。縱然你從書本上學得馬列主義的知識，若果不到革命工作中去應用，那就和沒有知識一樣的。

『爲了明瞭基於變革現實的實踐而產生的辯證唯物論的認識運動——認識的逐漸深化的運動，下面再舉出幾個具體的例子。

無產階級對於資本主義社會的認識，在其實踐的初期——破壞機器與自發鬥爭時期，他們還只在感性認識的階段，只認識資本主義各個現象的片面及其外部的聯繫。這時，他們還是一個所謂『自在的階級』。但是到了他們實踐的第二個時期——有意識有組織的經濟鬥爭與政治鬥爭時期，由於實踐，由於長期鬥爭的經驗，經過馬克思、恩格斯用科學的方法把這種種經驗總結起來，產生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用以教育無產階級，這樣就使無產階級理解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理解了社會階級的剝削關係，理解了無產階級的歷史任務，這時他們就變成了一個『自爲的階級』。』

現在擧出幾個具體的實例，說明基於實踐而產生的辯證唯物論的認識運動——認識的深化運動。

無產階級在其實踐的初期，對於資本主義社會的認識，還祇是感性認識。他們看到多少的手工業工場，都依次採用了機械生產；看到了採用機械的工場，一方面解僱了大批男工，一方面又添僱了一些女工和童工；看到已被解僱了的工人失了業，未被解僱的工人的工資是降低了。他們所感受的壓迫和剝削日益加重，他們的生活水平都被降低到饑餓線上。但他們不能在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當中去尋找自己貧困的原因，祇知道在工場的機械當中尋找那個原因。他們不能把機械和機械之資本主義的利用分別開來，祇知道惱恨自己的工場企業家，不知道那企業家正是剝削者階級的代表。他們基於在奴隸生活條件下所得的體驗和知覺，被迫着起來向個別企業家作鬥爭。『最初單個的工人，然後一個工廠的工人們，然後一個地方同一個勞動部門的工人們，向着那直接剝削他們的單個的資產者作鬥爭。工人們不僅反對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而且反對生產工具本身；他們毁壞那些來自外國的競爭着的商品，打壞機器，燒燬工廠，他們企圖用强力來恢復那已經失去了的中世紀工人的地位（「共產黨宣言」）。這樣的自發的鬥爭，是初期無產階級鬥爭史上所常見的。他們因爲還不會理解資本主義的本質，所以還不能對資產階級作有意識的鬥爭。他們還是『自在的階級』，卽還是沒有階級意識的階級。他們還不能了解自己整個階級的任務，不能把那些企業家當作一個階級來鬥爭。

『但是隨着工業的發展，無產階級不但在數量上生長了；他們被集合爲巨大的羣衆，他們的力量增長起來，並且他們自己也更加感覺到自己的力量了。隨着機器的一步一步地消除勞動的差別，並且把工錢差不多到處壓到同樣低的水平，無產階級內部的利益與生活狀況就一步一步地趨於平均化了。資產者中間日益增長的競爭以及由此產生的商業危機，使得工人們的工資越發動搖不定；日益迅速發展的機器的不斷改進。使得無產者的生活狀况越發沒有保證；個別工人與個別資產者中間的衝突越發帶上兩個階級間的衝突的性質。工人們開始形成反對資產者的團體；他們共同地來保衞自己的工資。他們甚至建立經常的團體，以便在可能發生的衝突之時有所準備。有些地方，鬥爭轉變爲公開的起義。工人們有時得到勝利，可是這種勝利只是暫時的。他們鬥爭的眞實結果還不是直接的成功，而是工人們日益擴大的團結。大工業所造成的日益發展的交通工具，建立了各地工人們的相互聯系，促進了工人們的團結。祇要有了這種聯系，就可以使到處性質相同的許多地方鬥爭策源地集中起來，並匯合爲一個民族的階級鬥爭。而任何階級鬥爭都是政治鬥爭』（「共產黨宣言」）。從這個時候起，馬克思和恩格斯，用科學方法綜合了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的經驗，創造了馬克思主義理論，作爲無產階級革命的指導。無產階級基於鬥爭的經驗，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教育，把自己組成爲一個階級，組織革命的政黨，去準備推翻資產階級的國家機關，企圖建設共產主義的社會了。這是無產階級就由『自在的階級』轉變爲『自爲的階級』了。這是無產階級對於資本主義社會的認識過程，卽由感性到理性到實踐的過程。

就中國人民對於帝國主義的認識過程，擧例來說。中國自從一八四〇年鴉片戰役失敗以後，就陷入了帝國主義殖民地化的過程，但中國人民對於帝國主義的認識，直到『五四』運動以前（卽俄國十月革命以前），還停頓在感性認識的階段。歷年來，他們親眼看到外國人奪取我們的領土，在中國境內設置租借地，開闢租界，增開商埠，駐紮軍隊，把握海關，行使領事裁判權，奪取內河航行權，築路權和開礦權。還劃分勢力範圍，洋貨充斥國內，利權外溢，國內農業手工業因而破產，此外，它們還在中國傳敎，辦學校，作爲侵略的工具。這一連串的事實，使得我們人民感受到列强的侵略和剝削，覺得中國就要瓜分豆剖，國亡無日。中國人民基於這樣的認識，就起來做救亡運動了。但是救亡運動如何進行？靠政府的力量麼？當時的滿淸皇朝被列强征服以後，已向列强投降，做了列强的傀儡，幫助列强壓迫着人民。人民也不知道組織武力來對付侵略者，於是祇有對列强做自發的鬥爭。這鬥爭的方式，就是排外主義，卽排斥外國人，排斥外國貨。他們不知道帝國主義的本質，以爲祇要洋人和洋貨排斥了，中國就可以得救。所以每逢某國對中國加緊侵略時，就排斥那一國的人和那

『中國人民對於帝國主義的認識也是這樣。第一階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認識階段，表現在太平天國運動與義和團運動等籠統的排外主義的鬥爭上。第二階段才進到理性的認識階段，看出了帝國主義內部與外部的各種矛盾，並看出了帝國主義聯合中國買辦階級和封建階級以壓榨中國人民大衆的實質，這種認識是從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前後才開始的。』

一國的貨。基於這種自發鬥爭的經驗，我國人民就知道一切來到中國的洋人都是虎狼，都是侵略者，祇要把他們斬盡殺絕，中國才能免於滅亡。義和團運動，就是依照這種認識才發動的。這一類排外主義運動，無疑地是反帝的民族鬥爭，祇因為當時還不能理解帝國主義的本質，更理解不到帝國主義與中國封建主義互相勾結壓迫中國人民的連鎖性，所以做出了錯誤的鬥爭方法，致使像太平天國、義和團那樣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終於失敗。但在這一類運動中，可以看出一個特點，就是參加這一類鬥爭的人，主要地是工農羣衆與青年學生，而當時的資產階級卻不曾參加過。孫中山當年所倡導的民族主義，完全是以滿清為對象的，從未提起過反帝國主義，這因為他們是以帝國主義為師的。他們當時以為滿清政府一經推倒，民族主義已經實現了。（直到一九二四年孫中山改組中國國民黨之時，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主張，才把民族主義解釋為反帝國主義）。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以後，歐美帝國主義者忙着在歐洲打仗去了，中國在當時成了日本帝國主義者獨吞的局面，它首先奪去了山東，還奪取了許多特權。從這個時候起，中國人民在反日的鬥爭中，民族意識增強了，直到十月革命給我們送來了馬列主義以後，中國人民才在反日鬥爭中，學習了馬列主義，知道反帝反封建的鬥爭是中華民族求解放的唯一道路。『五四』運動，正是反帝反封建的鬥爭的序幕。從這個時候起，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的認識，就從感性的階段，進到了理性的階段。革命的先驅者已經知道了：帝國主義是最後階段的資本主義，是垂死的資本主義，是社會革命的前夜；帝國主義國家內部的無產階級的革命危機已經尖銳化；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帝國主義者相互間重新分割殖民地的戰爭，而中國正是它們宰割的對象；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十數億人民與少數帝國主義的鬥爭已經開始了，而中國人民已經到了與帝國主義者短兵相接的地步了。依據這些基本的認識，就從一次一次地反帝和反封建的實踐運動當中，逐漸地認識了帝國主義勾結封建階級及買辦階級壓迫和剝削中國人民大衆的實質，於是就得到了一個結論：中國人民祇有打倒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才能獲得解放。中國共產黨就是在這種形勢之下出現的。

『我們再來看戰爭。戰爭的領導者，如果他們是一些沒有戰爭經驗的人，對於一個具體的戰爭（例如我們過去十年的土地革命戰爭）的深刻的指導規律，在開始階段是不了解的。他們在開始階段只是身歷了許多作戰的經驗，而且敗仗是打得很多的。然而由於這些經驗（勝仗，特別是敗仗的經驗），使他們能够理解貫串整個戰爭的內部的東西，即那個具體戰爭的規律性，懂得了戰略與戰術，因而能够有把握地去指導戰爭。此時，如果改換一個無經驗的人去指導，又會要在吃了一些敗仗之後（有了經驗之後）才能理會戰爭的正確的規律。』

再就軍事規律的認識過程舉例來說。戰爭的領導者，必須學習軍事規律，以便應用這規律於戰爭。

『軍事的規律，同其他事物的規律一樣，是客觀實際對於我們頭腦的反映，除了我們的頭腦以外，一切都是客觀實際的東西，因此，學習與認識的對象，包括敵我兩方面，這兩方面都應該把它看成研究的對象，祇有我們的頭腦（思想）才是研究的主體』。（「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戰爭的領導者，如果他們是初出茅廬臨陣作戰的人，他們對於敵我雙方的情況和當時的戰爭環境，祇能有感性的認識，這不能理解一個具體戰爭的深刻的指導規律。他們根據感性的認識，擬定作戰計劃，一定是勝仗打得很少，敗仗打得很多。但他們在戰爭中學習戰爭，身歷了多次敗仗和勝仗的經驗，以後就從那些經驗中吸取教訓。他們知道『使用一切可能的與必要的偵察手段』，偵察敵方的情況，『將偵察得來的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眞，由此及彼，由表及裡的思索，然後將自己方面的情況加上去，對比着看相互的關係，因而構成判斷，定下決心，作出計劃』。像這樣去『指導戰爭，或作戰，就比較有把握，比較能打勝仗。這是在長時間戰爭中間，認識了敵我雙方的情況，找出了行動的規規，解決了主觀與客觀的融洽不融洽的問題。這一過程是非常重要的，沒有這一種長時間的經驗，要了解與把握整個戰爭的規律是困難的』。（以上方括弧中的語句均見前著）

中國人民在過去十年土地革命戰爭中，是有過這樣的經驗的。『我們的戰爭，是從一九二七年秋天開始的，當時根本沒有經驗。南昌暴動，廣州暴動是失敗了，秋收暴動在湘鄂贛邊界地區的部隊，也打了幾個敗仗，轉移到井崗山。第二年五月，南昌暴動失敗後保存的部隊，經過湘南游擊戰爭也轉到了井崗山。然而從一九二八年五月開始，適應當時情況的帶着樸素性的游擊戰爭基本原則，已經產生出來了，那就是所謂『敵進我退，

敵據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訣』。（見前著）。這十六字訣的原則，在敵强我弱的十年土地革命戰爭中，是合乎軍事規律的。但從一九三二年一月開始，那十六字訣的原則被『新原則』所代替，『反游擊主義的空氣，統治了整整三個年頭，其第一階段是軍事冒險主義，第二階段轉到軍事保守主義，最後第三階段變成逃跑主義。直到黨的政治局會議在一九三五年一月舉行於貴州的遵義時，才宣告這個錯誤原則的破產，重新承認過去原則的正確性。這是費了很大的代價得來的』（見前著）。

所以戰爭的領導者，必須理解那個具體戰爭的規律性，懂得了戰略與戰術，才能有把握地去指導戰爭。在這種時候，如果又改換一個初出茅廬的領導者去指導戰爭，又必須在戰爭中歷鍊一番，學習一番，才能理解戰爭的正確規律。

『常常聽到一些同志在不能勇敢接受工作任務時說出來的一句話：沒有把握。爲什麼沒有把握呢？因爲他對於這項工作的內容與環境沒有規律性的了解，或者他從來就沒有接觸過這類工作，或者接觸得不多，因而無從談到這類工作的規律性。及至把工作的情況同環境給以詳細分析之後，他就覺得比較地有了把握，願意去做這項工作。如果這個人在這項工作中經過了一個時期，他有了這項工作的經驗了，而他又是一個肯虛心體察情況的人，不是一個主觀地、片面地、表面地看問題的人，他就能夠自己做出應該怎樣進行工作的結論，他的工作勇氣也就可以大大地提高了。只有那些主觀地、片面地與表面地看問題的人，跑到一個地方，不問環境的情況，不看事情的全體（事情的歷史與全部現狀），也不觸到事情的本質（事情的性質及此一事情與其他事情的內部聯繫），就自以爲是地發號施令起來，這樣的人是沒有不跌交子的。』

再就工作同志對於新工作任務的認識過程舉例來說。某些工作同志們，當他們接受新的工作任務時，總覺得沒有把握。因爲他們對於這一新的工作，沒有經驗，或者經驗不多，不能懂得這一工作的規律性。等到有人把這一工作的情況和環境給以分析之後，他就覺得比較有了把握，接受這一工作了。他在這一工作中，積蓄了經驗以後，如果能夠虛心學習，善於體察工作的情況，能够客觀地、全面地、深入地去看問題，他就能理解這一工作的規律性，完成這一工作的任務。例如湖南大學的學生，在報名參加土改工作之時，他們對於這一工作是全無把握的。後來進行土改學習，學習土改法令和政策，學習「劃分農村階級成份的決定」，又聽取了老幹部同志們關於土改工作的報告，從他們學習土改工作的經驗。經過了這一番學習之後，他們就覺得有了一些把握。他們下鄉參加工作以後，多數都能堅決地站在農民的立場，端正工作的態度，虛心地向老幹部學習，向農民學習。他們在工作中積蓄了一些經驗，能够分淸敵友我三方面。他們體會了下述的步驟，即首先訪問貧僱農，和他們打成一片，倚靠他們，發動他們，幫助他們組織起來，接着進行反霸戰爭，團結中農，中立富農，打垮地主，再進一步是劃分階級成份，分土地，分果實，最後是帮助農民組織政權，實行對地主專政。如果他們虛心學習，善於體察工作的情況，不從主觀地、片面地、表面地去看問題，是能够理解土改工作的規律性的。

犯有主觀主義毛病的人，跑到一個工作崗位，常是主觀地、片面地、表面地去看問題，不肯虛心體察客觀的情況，看不到工作的全體，不觸到那一工作的性質以及這一工作和別一工作的聯繫，做一句話說，就是不懂得那一工作的規律性，便自以爲是地發號施令起來，結果一定要招致失敗。例如有個別參加土改工作的新幹部，跑到一個鄉村去，也不個別地訪問貧僱農，就召開貧僱農大會，以致地主的狗腿子都混了進去。於是他對那些羣衆講一些土改政策和法令，也不進行反霸鬥爭，便出一個劃階級成份的榜，實行分田。像這樣實行土改，在農民看來，和沒有實行土改一樣，他們並不會翻身，封建勢力並不會削減。像這樣『和平分田』，算是土改工作的失敗。所以『和平分田』的鄉村，還得重新再來一次土改，澈底消滅封建勢力，農民才得翻身，土改的目的才能實現。（湖南有幾個鄉在最初是這樣實行『和平分田』的，後來已經改正過來了）。

『由此看來，認識的過程，第一步，是開始接觸外界事情，屬於感覺的階段。第二步，是綜合感覺的材料加以整頓和改造，屬於概念、判斷與推理的階段。只有感覺的材料十分豐富（不是零碎不全）與合於實際（不是錯覺），才能根據這樣的材料造出正確的概念與論理來。』

從上文看來，可以知道，認識過程的第一步，屬於感覺的階段。我們的認識是從感覺開始的。即是說，在生產與階級鬥爭中，外界事情引起我們的感覺，因而發生知覺，構成印象。這感覺、知覺、印象等，都是感覺

的材料，是思惟的源泉。於是認識就進到第二步，即進到論理的階段。我們就感覺的材料，實行分析與綜合，抽象與概括，就造出反映外界事情的普遍性的概念。概念是思惟形式，有了概念之後，我們就可以進行思惟，就概念進行判斷，表現外界事情的性質，於是又從一個判斷或幾個判斷，引出新的判斷，作成論理的結論。所以感覺的材料，必須是完全而可靠的東西，然後才能作出正確的論理的結論。因爲論理的東西，完全是從感覺的東西抽象出來的，決不能在感覺的東西以外，任意添加什麼東西進去（若果這樣做，便是唯心論者）。感覺的東西若果是不完全的，或者是不正確的，是錯覺的，不合於實際的，那就不能從這樣的感覺材料抽象出科學的結論。我們考察任何一個問題，必須盡量搜集關於這一問題的材料，並且還要辨別其中某些不正確的材料，把它剔除出去，然後才能從這些完全而正確的材料，運用唯物的辯証的思惟方法，正確地解決這一問題。

『這裏有兩個要點必須着重指明。第一個，在前面已經說過的，這裏再重複說一說，就是理性認識依賴於感性認識的問題。如果以爲理性認識可以不從感性認識得來，他就是一個唯心論者。哲學史上有所謂『唯理論』一派，就是只承認理性的實在性，不承認經驗的實在性，以爲只有理性靠得住，而感覺的經驗是靠不住的，這一派的錯誤在於顚倒了事實。理性的東西所以靠得住，正是由於它來源於感性，否則理性的東西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只是主觀自生的靠不住的東西了。從認識過程的秩序說來，感覺經驗是第一的東西，我們强調社會實踐在認識過程中的意義，就在於只有社會實踐才能使人的認識開始發生，開始從客觀外界得到感覺經驗。一個閉目塞聽，同客觀外界根本絕緣的人，是無所謂認識的。認識開始於經驗——這就是認識論的唯物論。』

前面說過，認識過程，是在實踐基礎上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的統一過程，感性認識以理性認識爲歸結，理性認識以感性認識爲前提。兩者互爲條件，互相補充，互相發展，互相豐富其內容。兩者具有有機的不可分離的關係，決不是各自獨立的認識階段，其間決沒有不可踰越的界限。做一句話說，感性認識有待於發展到理性認識，理性認識依賴於感性認識。人們如果割裂感性認識與理性認識，把兩者分別開來，或者專重理性認識而無視或輕視感性認識，或者專重感性認識而無視或輕視理性認識，就背離於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而陷入於主觀主義，陷入於『唯理論』或『經驗論』。這裡先指出『唯理論』的錯誤。

哲學上的『唯理論』有唯心論與唯物論的兩派。這兩派的錯誤有兩個共通點：其一是切斷認識過程的兩個階段，祇承認理性的實在性，不承認經驗的實在性，以爲祇有理性靠得住，而感覺的經驗是靠不住的。其二是切斷認識與實踐的關係，祇有認識，沒有實踐，因爲感性的東西是從實踐發源的。唯心論的唯理論，例如前面所述的萊勃尼茲的唯理論，主張認識是主觀的心理活動，根本否認外界事物的存在，他主張祇有思惟能給人們以正確的知識，而感覺是不能相信的。唯物論的唯理論，例如斯賓諾沙的唯理論，雖然主張精神是從物質發生的，但他認爲眞實的知識由理性所發掘，不需要感性的幫助。這兩種『唯理論』，從認識過程中，割去感性的階段，祇採取理性的階段,雖然有唯心的與唯物的區別,却都是主觀主義的。理性認識是從感性認識發源的，若果否認了感性的東西，就變爲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祇是主觀的自生的靠不住的東西了。唯心論的唯理論，是辯証唯物論的死敵，我們固然要堅決地打擊它；就是唯物論的唯理論，也是辯証唯物論的大敵，我們也決不能輕易放過。因爲唯物論的唯理論雖是唯物論的，却是唯理論的，它輕視感性認識，就等於輕視社會實踐的重要性。因爲感性認識是在社會實踐中用五官四肢感觸到外界事物的結果，否認感性認識的人，就是不參加社會實踐的人，是閉着眼睛塞着耳朵不接觸外界事物的人，這樣的人，正是教條主義者，他與唯物論的唯理論者有血統的關係。

教條主義者因爲否認了感性認識即否認了經驗，脫離了社會實踐，所以他們談學習，談問題，做文章，做工作，總是從主觀的見解出發，從定義出發，從教條出發。談學習，他們是爲學習而學習，『抽象地無目的地去研究馬、恩、列、斯的理論，不問它與中國革命有什麼聯繫；不是爲着要解決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策略問題而到馬、恩、列、斯那裡找立場找方法，而是爲理論而理論，爲馬、列而馬、列』，（「改造我們的學習」）。談問題，他們總是主觀地看問題，他們的思想，『不根據與不符合於客觀事實，是空想，是假道理，如果照了做去，就要失敗』（「論持久戰」）。做文章，他們總是向馬、恩、列、斯的著作，尋章摘句，誇誇其談。

『下筆千言，離題萬里』。做工作，他們自以爲是，『老子天下第一，欽差大臣滿天飛』，他們「『下車伊始』，就呱喇呱喇地發議論，這也批評，那也指摘，其實這種人十個有十個要失敗的。因爲這種議論或批評，沒有經過周密調查，不過是無知妄說」。(「農村問題調查序言二」)。總起來說，教條主義者脫離了實踐，所以沒有感性認識，沒有經驗，因而也不能有理性認識。

認識開始於經驗——這是認識論的唯物論。人們要求得革命的知識，必須參加於革命的實踐，取得革命的經驗，然後用科學的方法，把革命的經驗總結爲革命的知識。所以革命的知識，依存於革命的實踐，從革命的經驗出發。教條主義者的認識，從教條出發，其必然的歸結，是陷於認識論的唯心論，即是主觀主義。

『第二是認識有待於深化，認識的感性階段有待於發展到理性階段——這就是認識論的辯證法(註五)。如果以爲認識可以停頓在低級的感性階段，以爲只有感性認識可靠，而理性認識是靠不住的，這便是重複了歷史上的『經驗論』的錯誤。這種理論的錯誤，在於不知道感覺材料固然是客觀外界某些眞實性的反映(我這裏不來說經驗只是所謂內省體驗的那種唯心的經驗論)。但他們僅是片面的與表面的東西，這種反映是不完全的，是沒有反映事物本質的。要完全地反映整個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質，反映事物的內部規律性，就必須經過思考作用，將豐富的感覺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僞存眞，由此及彼，由表及裏的改造製作工夫，造成概念及理論的系統，就必須從感性認識躍進到理性認識。這種改造過的認識，不是更空虛了更不可靠了的認識，相反，只要是在認識過程中根據於實踐基礎而科學地改造過的東西，正如列寧所說乃是更深刻、更正確、更完全地反映客觀事物的東西。庸俗的事務主義家不是這樣，他們尊重經驗而看輕理論，因而不能通觀客觀過程的全體，缺乏明確的方針，沒有遠大的前途，沾沾自喜於一得之功與一孔之見。這種人如果指導革命，就會引導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

列寧在「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中說：『爲了理解，必須在經驗上開始理解，研究，從經驗升高到一般』。這便是說，我們爲要認識一個對象或一個問題必先就關於那對象或問題所得的一切感性的經驗，用科學的方法加以分析，作出總結，『然後才可以使經驗帶上條理性綜合性，上升到理論』(即一般)。所以認識有待於深化，認識的感性階段有待於發展到理性階段—這就是認識論的辯証法。如果以爲認識可以停頓在低級的感性階段，以爲祇有感性認識可靠，而理性認識是靠不住的，這便是重複了歷史上的『經驗論』的錯誤。

哲學史上的經驗論，有唯心論的與唯物論的兩種。唯心論的經驗論，和唯物論的經驗論不同，它根本否認經驗是客觀事物的反映，反而主張客觀事物是精神所創造的東西。它主張經驗是主觀意識中所固有的東西，是主觀的內省的東西，它把這種主觀的經驗，作爲認識的唯一的對象，並否定理性的認識，例如柏克萊、休謨、馬赫與波格達諸夫等，都是唯心論的經驗論者，他們都否定論理的概念對於認識所具有的意義。至於唯物論的經驗論，例如培根、洛克等的經驗論，都主張感性的認識是外界事物的映像，是人類知識的來源，這是正確的。但在它重視感性的經驗而輕視理性認識這一點，却是片面的認識，因而是主觀主義的。唯心論的經驗論，是唯物論的死敵，我們應對它作無情的鬥爭。唯物論的經驗論，在其對感性經驗作唯物論的說明這一點是正確的，但它從整個認識過程中分離感性與理性兩個階段，重視感性經驗而輕視理性認識這一點，却是辯證唯物論所排斥的。因爲感性的經驗雖然是客觀事物的反映，但祇是直觀階段的反映，人們所能認識的祇是片面的、現象的、外部聯繫。而事物之全面的、本質的、內部聯繫，仍然是隱藏着，不是感性所能發現的。爲要認識事物之全面的、本質的、內部聯繫，就必須應用科學的方法，就豐富的感覺材料即感性經驗做一番思索的工夫。這就是說，要就那些經驗，辨別一番，分析一番，剔除那些不合於實際的東西，保存那些合於實際的東西，除去那些粗糙的東西，取出那些精華的東西，於是從那些完全而合乎實際的材料，分別研究，由一部份進到別一部份，比較對照，發見矛盾，提出問題。爲要解決問題，更要做系統的周密的分析，從外部聯繫進到內部聯繫，暴露其基本的矛盾。指出矛盾的主導的方面，由此進行綜合，實行概括，對於那一事物就能造出明晰的概念與理論的系統，即到達於論理的認識了。

論理的認識是把感性經驗改造過了的認識，是關於客觀事物的規律性的認識。這種規律性的認識的內容，比較感性階段上所反映的混沌複雜的現象，好像是貧弱了，空虛了，但是祇要它是在認識過程中，在實踐基礎上

，用科學的方法改造過了，它便是可靠的認識，正如列寧所說，乃是更深刻、更正確，更完全地反映客觀事物的東西。毛澤東同志研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社會，得到一個結論：中國社會在其發展過程中，必須經過新民主主義的革命，才能到達於共產主義。這種規律性的認識，和感性階段上所反映的中國社會的現象比較起來，好像是非常空虛了，但它卻更深刻、更正確，更完全地反映了中國社會，這是非常明白的。

人在實踐過程中，積蓄了一定的經驗之後，必須把經驗實行科學的總結，使之上升爲理論，然後才能促進實踐向前發展。若果長此停頓在經驗的階段，不去分析經驗，總結經驗，他做起工作來，祇能敷衍了事，甚至壞事，更談不到使事業發展了。例如模範工程師于松如，天津解放前在中紡一廠工作。他曾在上海、蕪湖、石景山、保定各發電廠担任工程師，對於電機和鍋爐，積有二十五年的豐富經驗。但在反動派統治之下，他無意總結那些經驗。什麼技術改良，連想都沒有想過，機器壞了，對付對付就算了。但到天津解放以後，他的思想解放了，再加上在工作中的學習，他正確地認識了工人階級做主人翁的地位，於是放棄了保守觀點，要想發展技術了。天津中紡一廠原有兩部發電機，發電用的鍋爐，都是舊的鍊條式鍋爐，原是根據陳舊的理論裝設的：『爐膛內部隔斷（彎曲）多，瓦斯才可充分利用』。他總結他的經驗，認爲要增高鍋爐膛爐內瓦斯溫度，必須根據新的理論來裝設，於是他把爐膛升高，把爐膛的隔斷由四段改爲兩段，可使爐膛內的煤充分燃燒。初步成績顯出爐膛內的溫度已增達一千二百度。於是他在改進了鍋爐爐膛的設備之後，又研究了通風問題，結果使爐膛內的瓦斯溫度也相當地到達了一千五百度，接近於蘇聯的紀錄（蘇聯的是一千六百度，事實載在「新華月報」一九五〇年十月號）。像于松如這樣把經驗改造爲理論，是一種科學的知識，它更深刻、更正確、更完全地認識了空氣與燃燒的規律性。

經驗，尤其是革命的經驗，原是至可寶貴的。馬克思主義、列寧——斯大林主義、毛澤東思想，都是革命領袖們的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經驗的科學總結啊！但是革命的工作者，決不能僅以經驗爲滿足，不能把認識停滯在經驗的階段而故步自封。如果是這樣，他就會變成庸俗的事務主義家、經驗主義者。經驗主義者重視經驗而看輕理論，對於一種客觀事件如何發生？現狀怎樣？將來如何演變？是不能有通盤的理解的。因此他不能把握還一事件發展的規律，不能有計劃有步驟地完成任務或指導工作。所以把有經驗主義毛病的人，常常滿足於局部工作的零細雜多的經驗而沾沾自喜，不肯苦心思索，也不肯虛心學習，甚至以爲學習馬列主義就會變成教條主義者。他寫文章，做報告，常是『甲乙丙丁，開中藥鋪』。他談問題時，則常是不假思索，『不去思考事物的本質，而滿足於甲乙丙丁的現象羅列』，（以上方括弧中的話，均見「整頓學風黨風文風」及「反對黨八股」）。至於担任某一工作時，他不受時間、地點與條件的限制，常把局部的經驗推行於全部，把一時一地的經驗，應用於異時異地，而不考慮當時當地具體的主觀客觀條件。例如把游擊時代的作風應用於大陸幾已完全解放的今天；把農村的工作方法，應用於城市，把內戰時期老解放區土改工作方法，應用於今日的新解放區。經驗主義者像這樣祇憑經驗，輕視理論，若担任工作，必出偏差，若指導革命，必招失敗。經驗主義者『否認理性認識所必然引出的邏輯的結果，就是限制感性認識，並使感性認識歸於無用。』（見人民日報「學習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論』」）。

『理性認識依賴於感性認識，感性認識有待於發展到理性認識，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哲學上的『唯理論』與『經驗論』都不懂得認識的歷史性或辯證性，雖然各有片面的眞理（對於唯物的唯理論與經驗論而言，非指唯心的唯理論與經驗論），但在認識論的全體上則都是錯誤的。由感性到理性之辯證唯物論的認識運動，對於一個小的認識過程（例如對於一個事物或一件工作的認識）是如此，對於一個大的認識過程（例如對於一個社會或一個革命的認識）也是如此。』

概括以上所說，理性認識依賴於感性認識，感性認識有待於發展到理性認識，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哲學上的『唯理論』與『經驗論』，有一個共通的缺點，就是它們都不懂得認識的歷史性或辯證性，任何事物或對象，都具有歷史性，都有其發生、發展和轉變的過程，因而反映那事物或對象的認識，也有其發生、發展和轉變的過程。在實踐中，認識從反映外界事物的感覺發生，隨着實踐的發展，認識也發展起來，以至於引起突變，由感性階段躍進到理性階段。這種認識的歷史性或辯證性，在『唯理論』和『經驗論』都是不能懂得的。

唯心論的『唯理論』與『經驗論』，如上文所述，都是唯物論的敵人，

姑且不去說它們。在這裡，祇以唯物論的『唯理論』與『經驗論』爲問題，因爲唯物論的『唯理論』是今日教條主義的來源，唯物論的『經驗論』是今日經驗主義的來源。教條主義注重理論而看輕經驗，經驗主義注重經驗而看輕理論；前者從統一的認識過程剝奪去經驗，後者則剝奪去理論。兩者雖然各有片面的眞理，但在認識論的全體上則都是錯誤的。

所以教條主義與經驗主義，是兩種不完全的知識，『一種是現成書本上的知識，那怕是馬列主義，也可以使它變成空洞的東西。一種是偏於感性與局部的知識，沒有發展成爲理性的與普遍的東西。這二者都有片面性。祇有使二者互相結合，才會產生好的比較完全的東西』。『有書本知識的人要向實際方面發展，然後才可以不停止在書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條主義的錯誤。有工作經驗的人，要向理論方面學習，要認眞讀書，然後才可以使經驗帶上條理性，綜合性，上升到理論，然後才可以不把局部經驗誤認爲即是普遍眞理，才可以不犯經驗主義的錯誤』（『整頓學風黨風文風』）。

由感性到理性的辯證唯物論的認識運動，對於一個小的認識過程，例如對於一個事物或一件工作的認識過程；對於一個大的認識過程，例如對於一個社會或一個革命的認識過程，都必須由感性認識發展到理性認識。這裡就這四個認識過程分別舉例說明。

先就一個事物的認識過程舉例來說。中國共產黨的好女兒趙桂蘭，一九四九年在大連建新工廠做化學配置女工，一直以非凡的熱情工作着，十二月間，她因爲月經病常感頭昏，全身發軟沒勁，但仍堅持工作。十九日那一天，放工的汽笛響了，她從一個工作室裡拿了一包用棉紙包的『雷汞』，準備送到配置室去。當她走到離配置室還有二十步遠的地方，突然頭昏了，房子在眼前直轉，地也動，兩腿直打顫，身子亂幌。她一想不好，手裡拿的『雷汞』，是配置間鑛山用的，一觸地就要爆炸，可是就在這時，她已經堅持不住，撲通一聲跌倒了。她知道『雷汞』觸出去用不上一分鐘就要爆炸。她想把『雷汞』扔出去，可是她又想到工廠裡擺着那麽多機器、原料，要是把『雷汞』扔在空地上還好，否則工廠就要遭到重大損失。『一不能！』她緊閉着眼，咬着牙，握緊了『雷汞』。就在這一刹那，轟的一聲爆炸了。結果她自己受了重傷，工廠安全無恙。（節錄一九五〇年四月號『新華月報』）。就這件事實來看，趙桂蘭在工作經驗上，祇知道『雷汞』是爆炸品，平日愼重處理，決無問題。當她帶病堅持工作，也覺得可以和平日一樣操作。但在當着拿起『雷汞』送往配置室的途中，她忽然發昏跌倒，人急智生，想了『一想』，知道『雷汞』觸地後一分鐘就要爆炸，扔出去則恐怕毀壞工廠中的機器和原料，緊握着不扔出去則毀壞自己，她在最後的一刹那，發揮了共產黨員的高度忘我精神，決意犧牲自己，保全工廠。這時候，她對於『雷汞』的處理，不但有理性認識，而且把理性認識化爲光榮的行動了。

再就一種工作的認識過程舉例來說。我志願軍郭忠田英雄排，在朝鮮北部參加對美帝匪軍作戰一星期以後，積蓄了一些經驗。當他們奉命到龍源里截擊向北增援與向南潰退的美帝匪軍時，他們從經驗上知道了美帝匪軍的技術（最初是用飛機轟炸，其次用大砲轟擊，最後是步兵衝鋒），知道了自己部隊的戰鬥能力，於是選擇有利地形，修築工事。匪軍到來以後，一經接觸，果然舊技重演，我郭忠田英雄排，等匪軍衝上山腰時，就給以殲滅性的猛擊。如此連續三次，終於把敵人打敗，全排無一人傷亡。於是郭忠田英雄排，總結了作戰的經驗，得到了這樣的結論：『以前光聽說美國兵是紙老虎，但是心裡沒有底，現在總算把紙老虎打破了。美國人飛機多，大砲多，坦克多，汽車多，跑得快，這些算是他們的特點。但他們缺乏犧牲精神，一個比一個怕死；他們怕近戰，怕包圍，怕迂回，怕機關槍，怕手榴彈；他們既不能攻，又不能守，是一羣怕死鬼』。（見志願軍歸國代表柴川若廣播詞）。

再次，就大的認識過程舉例來說。毛澤東同志在共『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及其他許多著作中，對於中國社會的研究，對於中國革命的研究，十足地體現了由感性到理性之辯證唯物論的認識運動，給了我們極其輝煌的範例，我們必須認眞地去學習，去體會，這裡不再撮要復述了。（未完）

本刊啓事

我們爲了減輕投稿諸同志的負担，已經郵局許可，關於郵資一項，可以按照「零寄整付」辦法，由我們總付，投稿諸同志可不必再貼郵票（限於平寄），但須於信封上書明「稿件」字樣，將左上角剪開，以便郵局查驗，並請書明「編輯部收」。至於需要退稿者，仍請付足回件郵資爲荷。此啓。

資產階級優生學批判

——資產階級優生學的最大罪惡是它把社會問題、歪曲簡化、成爲生物學問題——

方宗熙

現代資產階級的優生學是資本主義最後階段——帝國主義的產物，是資產階級統治發生動搖的一個反映。它企圖利用自然科學的一些不成熟的理論，來鞏固資產階級的統治地位。它把達爾文主義中比較不健全的部分——生存競爭說，和孟德爾遺傳學的片面智識，機械地應用到人類社會來。它一面假定人類的形態、生理、心理上的種種重要差別，是遺傳的；一面又假定生存競爭存在於人類之間，以引起自然淘汰，促成社會進化。再在這兩個假定之間，做個簡單推理，於是便有了階級優越論和種族優越論。

這兩大謬論都是爲資產階級服務的，它們運用遮眼手法，把社會問題變成生物學問題，把人爲的不平等變成自然的不平等。它們企圖利用科學來麻醉被壓迫的勞動人民，使他們相信資產階級之所以成爲統治階級，是因其具有優秀品質，尤其是優秀的遺傳性。所以資產階級之成爲統治階級是有其自然原因、和科學根據的，是動搖不得的。「所以勞苦的人們」，僞善的學者可以這樣說教，「你們現在的處境的確是不好。但這不好，是因爲你們的遺傳上有毛病，是因爲你們的遺傳性比不上他人。這是天生的不同，不是人爲的，這也是上帝的意思。修修善吧，不要造反，不要把登上天堂的希望毀在自己的手裡！」

於是資產階級的優生學者，裝出了慈悲的臉孔，要來救世救民。他們說，要使社會進步、人生幸福，最澈底的辦法，是改良人種。要改良人種，那只有應用「汰劣留良」的優生方法，鼓勵好種早點結婚和多生後代，使劣種不要結婚，或結婚而不生後代。於是他們提出了「絕育法」。認爲絕育法一旦普遍實行，劣種就可以消滅，或最少是大大地減少。於是社會文化就可毫無阻礙地發展了。

這種荒唐妙論，現在還在帝國主義的社會裡流行，也還多少存留於一部分中國人的意識裡，因爲不久以前，這種謬論還是被當做科學在學校裡講解，在書報裡宣傳。在這清除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遺毒的當兒，我們把這毒素的假科學面貌揭露出來，也是必要的。

一　論優生學的理論基礎

優生學的理論基礎，主要有兩部分，即達爾文的生存競爭自然淘汰的學說和孟德爾遺傳學的片面智識。

達爾文認爲生物的繁殖率常常超出食物的供應量。爲着生存，生物便起了競爭。因爲生物之間存在着變異，競爭結果，生物具有最適於生存的變異的，便傳下後代，具有不良變異的，便被淘汰掉。這樣，生物通過了生存競爭和自然淘汰，質便提高了，進化了。這個理論，一被生物學界接受之後，便廣泛地給應用到人類社會上來。說動植物界如此，人類社會亦然。意思是說，通過了生存競爭和自然淘汰，優秀分子便爬上了社會的頂層，成爲統治者，其餘的人便成爲被統治者。社會因爲是一些具有優良遺傳性的人們在領導，所以社會便進步了。同時，通過了資本家們的競爭，統治者的質又更提高了，社會又更進步了。這全是生存競爭自然淘汰的功績。難怪尼采，這極端的個人主義者，會大聲疾呼，說人類必須繼續進行自然淘汰的工作，以便產生超人。

統治階級的遺傳性之是否比被統治階級優秀，這留待以後分析。這裡先批判達爾文主義的比較不健全的部分——生存競爭說。

所謂生存競爭是指每一生物和其它生物競爭。這包括同種和異種之間的生物在內。動植物界裡沒有生存競爭嗎？有的，尤其是異種生物之間。至於同種生物，生存競爭，如果有之，也並非主要的事。例如一條鯽魚產生了許多卵，這些卵還沒有孵化，便有一部分被別的生物吃掉。孵化出來的小鯽魚，在沒有感到食料不足以前，便有一部分做了別的生物的食料，沒有機會長成大魚。這是異種生物之間的殘殺現象，並不是同種之內的生存競爭。還有，這世上充滿了微生物，它們有一大部分是動植物的敵人。例如一大批人之死於瘟疫，並不是人與人之間的鬥爭，而是細菌或其它微生物與人的鬥爭的結果。事實上，生物界中，同時還有另一面的事實，即合作和互助。所以恩格斯說：

「現在的達爾文派，在以前只看到有機自然界中的和諧的通力合作，說植物怎樣以食品和氧氣供給動物，而動物則以糞、亞摩尼亞和碳酸氣供給植物。但是達爾文的學說一被公認之後，這些先生們又到處只看到鬥爭。在某種極狹的範圍內，這兩個概念都是正確不誤的，然而它們兩個又同是片面的，偏執的。」（自然辯證法，二四七頁）

偉大的達爾文主義怎會含有這種不正確的理論呢？這是因爲達爾文受了資產階級學者霍布斯的萬物互鬥說（或譯個體和全體鬥爭說）和馬爾薩斯的人口論的影響，這也是因爲達爾文所代表的當時資產階級是含有進步性和反動性的緣故。所以恩格斯又說：

「達爾文的生存競爭說，實在只是霍布斯萬物互鬥說之單純翻版，也是資產階級經濟競爭說之翻版，又是馬爾薩斯人口論之翻版，不過從社會部門移到有機自然界而已。玩了這一鬼計之後，很容易再把它從自然史中搬到社會史中。如說因此一搬，它就變成了社會生活之正確的自然法則，就未免太幼稚了。」（同上，二四八頁）。

所以，生存競爭說在動植物史中只是片面的眞理，在社會發展史中則是邪說。如所週知，社會發展史就是階級鬥爭史。反動的學者想用生存競爭說來代替階級鬥爭理論，以便欺騙被壓迫的人民，轉移人民鬥爭的目標，是徒勞的。

這就是說，優生學的一個理論基礎——生存競爭說，是一攻就破的，是不能成立的。它的另一理論基礎也同樣是脆弱的，幻想的，一揭就穿的。

優生學的另一理論基礎是孟德爾遺傳學。這遺傳學接受了魏斯曼的唯心理論，把遺傳性一面和其餘的肉體組織分離開來，一面又和生物的生活條件分離開來，並且把遺傳性的作用誇大了，說這世上人與人之間的一切重要的變異是起源於遺傳性的不同。再把「變異」和社會的「不平等」放在一起講，在這兩者之間，劃一個等號，於是便有了個結論：人類是天生的不平等。

我們要指出，變異不就是「不平等」，而生物的特性也並非單獨受遺傳性的支配，而是遺傳性和環境交互作用的結果。比方說，骨骼是人類所共有的特性。這一特性並不直接傳給下一代。如果要在生殖細胞裡找骨頭，那是要失望的。可是形成骨骼的可能性，卻是通過生殖細胞，傳給下一代的。但是，這一可能性，如果要在下一代的身體裡成爲現實性——骨骼，那是要靠種種的外界條件的，例如鈣、磷等化合物以及丁種維他命等。沒有或缺少它們，骨骼就形成不起來，或形成得不好。又，同型雙生（或叫同胞雙生）是從同一個授精卵在大致相同的環境裡，發育起來的。所以他們有絕大部分的相像。可是如果細細觀察，他們彼此仍有許多不同，如身材的高低，指紋的差別，脾氣的不同等。這些變異的發生，主要是由於他們發育的環境略有不同，如一個胎兒可能得到較多的養料，一個可能受到較大的壓力等。這就是說，變異是普遍的，環境在產生變異中是極其重要的。

變異和不平等也不是一個東西。比方說，白種人的皮膚是缺乏色素的，黑種人的皮膚則含有很多色素。這是不同，是變異，但這和不平等並無關係。同理，藍眼睛也不比黑眼睛高貴。又如黑人對於肺癆的抵抗力不强，白人對於瘧疾的抵抗力頗弱，這也是不同，是變異，但這和不平等有什麼關係？又如在西歐白人的社會裡，找到血裡含有一種叫做 Rh 的蛋白質的約只佔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又找到沒有這蛋白質的女人如果和含有它的男人結婚，他們的子女，可能有一部分要死在母親的子宮裡或一生出來就患貧血，不易養活。在我們中國人裡，只有極其少數的人沒有這蛋白質，因此，在中國，嬰孩因這蛋白質的不調協而死去的，是稀罕之至。所以 Rh 的不調協現象，在歐美醫藥上已經成爲一重要問題，在我國根本不成爲一問題。這也是不同，是變異。但這並不是說我們比西歐的白人高出一級，應該去統治他們。（智力的差異情形，留在以後分析。）這充分說明了，變異是一回事，不平等是另一回事。

二　論階級優越

一九四九年，英國出版了一本惹人注意的遺傳學。兩個著者之一是達林頓（Darlington）。他是反對米邱林遺傳學的健將。他的名字在美國比在他本國是被叫得更響些。他這本書裡有一部分是論述人類遺傳和社會文化的關係的。根據這書和他在別處發表的高見，他和最反動的優生學家相差不遠。他和他的朋友們有一套理論，說歷史的推動力是統治階級，而統治階級之所以能負起這個偉大任務，是因爲它具有優秀的遺傳性，較小的生殖力和內婚制度。詳細點說來，就是統治階級本來具有較高的智慧，和較大的能力，這就便於進行生存競爭；他們因爲子女較少，負担較輕，要往上爬也較容易。所以競爭結果，他們是出人頭地成爲勝利者了。爲要維持勝利者的地位，他們必須繼續維持這遺傳性的優越性。這也做到了，就是實行內婚制度，不和被統治階級雜婚。

可是不幸得很，他們不勝遺憾地說，生殖力的大小也是遺傳的，結果統治階級的人材便逐漸減少了。還有，內婚的結果，統治階級的遺傳性，變得太純

粹了，於是缺之伸縮性。在社會變動或外力壓迫的時候，他們因爲遺傳性缺之伸縮力，便失去了應付和適應的能力了。結果，統治者垮台了，國家滅亡了，文化衰落了！

這就是反蘇健將及其朋友們的「科學」理論。

對嗎？當然不對！理由明白之至，國家興亡，文化起落，是社會歷史問題，不是遺傳問題。要在遺傳學裡找答案，不僅是緣木求魚，而且是自欺欺人。

但是，反動的理論既然披上科學的外衣，我們就來用科學的事實，把這外衣撕破吧。第一是統治階級的智慧優越問題。根據美國英國和加拿大的統計材料，因爲智力缺陷而送入隔離病院的孩子，各階級都有，而且比例相同。比方說，窮人之子有低能，資本家之子有白癡；雖然這類隔離病院裡的孩子，多是勞苦人家的子弟，這是因爲這世上窮人佔大多數。如果按各階級的人數比例來說，各階級所生的「智力缺陷」的孩子數目，根本是比例一致的。還有，根據資產階級學者所發明的智力測驗方法，雖然測出工農孩子所得到的分數，一般比上層階級的孩子們略低，但這表示什麼意義呢？這能表示工農孩子的智慧比較低嗎？不能夠。因爲任何科學的比較，必須在同一個條件之下來做。不然，結論便不可靠。現在工農孩子所處的環境很不同於上層階級的，而且是壞得很多。所以智力測驗成績的不同，不能歸因於遺傳，因爲智慧也是遺傳性和環境的交互作用的產物。我們就引用美國的材料吧。根據紐曼（New u an）等人的研究，一對同型雙生子，如果自幼就分開，而且所處環境不同。結果脾氣和智力測驗成績也不同。住在環境較好的孩子，比住在環境較壞的孩子，成績來的好些。還有，美國南部受壓迫的貧苦黑人的智力測驗成績比同區佔優越地位的白人來得差些；可是住在美國北部有較好的社會教育環境的黑人，其智力成績則相等或甚至超出南方的白人。這不是說明環境對於智慧發育的重要嗎？

第二是統治階級的生殖力大小問題。幾十年前，一位英國科學家，曾把英國貴族的生殖力，作了一個調査，在一千家裡，只有一個孩子的是三十五家，有十個孩子的是五十家，而多數的家庭，有三個到九個孩子。這不是說明統治階級的生殖力並不小嗎？但是，現在美英法等帝國主義的社會裡，都發現工農階級的生殖力一般比資產階級來得強些。這是什麼緣故呢？這主要是上層階級的人們，因爲有機會可以多受教育，常不能早婚。遲婚的結果，自然少生了一些孩子，因爲女人的最大的生殖力，據調査，是在十六歲到二十五歲之間。還有，現代避孕的方法很多，凡是不願多生孩子的人們，都可設法避免。但這有個不同：就是多受教育或住在城市的人們，容易獲知避孕的方法，人家苦窮而或鄉村的人們，多是見聞寡陋，就不知如何避孕了。這是說，現代各階層人們生殖力的差異，主要是社會的原因。至於少數家庭的生殖力頗小之有遺傳傾向，則是散見於各階層的社會，並不集中在一個階級裡。

第三是內婚和適應力的關係問題。不管那一階級的人，其遺傳性是極不純粹的，理由是人類一向就是雜交的動物。所謂雜交是和純系自交相對的。白色來克抗雞的自己交配，就是純系自交，因這類雞是一純系，其遺傳性是頗爲純粹的。人類裡向來沒有純系自交，就是古代埃及帝王的兄弟姊妹的自己結婚，嚴格講來，也不是純系自交，因爲誰也不敢保證這一系是純的。至於內婚和雜婚，都是程度稍有不同的雜交吧了。要用雜婚，產出純系，是不可能的。要用內婚，產生純系，理論上雖有可能，實際上不能辦到，因爲不管是那一統治階級的內婚，並不是簡單的數學演算，不能完全避去雜婚。所以過去統治階級由內婚而達到遺傳性太純粹的說法，是學院式的假定而已。

在動植物裡，純系的適應力，確常較弱。如春小麥普通不能在秋末冬初播種，來克杭雞對於一些疾病的抵抗力常比雜種雞較弱等。這是體質上的適應。體質上的適應在人類當然也有，如溫帶的人常可以到寒帶也可以到熱帶去居住等。但人類尚有另一重要的適應。這是心理的，行爲的，階級的。這是人類在社會實踐中獲得的。同一遺傳性，在不同社會裡，不同階級中，是反應不同的。過去的統治階級以及現代的資產階級，在社會演變中，常常表現缺之應付能力，這並不是因爲它們的遺傳性忽然變純了，缺之伸縮力了，而是他們爲他們的階級意識所蔽，以致不能視遠。所以要用內婚和遺傳的適應力來說明歷史，是要鑽入牛角尖裡去的。

所以階級優越並不是生物學的問題。

三　論種族優越

資產階級爲要繼續統治殖民地、爲要征服全世界，就常發出狂論，說白人比有色人種——尤其是黑人優秀，說某族某族是世界最優的，如納粹時代的德國說日耳曼族是世界上最高尚的種族，法西斯時代的日本說大和民族是天帝的子孫等。這當然都是從遺傳性上出發的。

英國反動的學者，曾研究黑人和猩猩的形態和構造，結論說，黑人較之白人，更接近猩猩。另一個反動學者說，我們如果能夠証明黑人是猩猩的一族，

我們就不必去解放他們了。又一個反動的學者說，黑人是本質低劣的人種，要去教育他們，是白費心機的。

事實如何呢？事實是世上所有的人種同屬一種。黑人和白人能結婚生子，就是黑白人同一物種的明證。又例如黑人和白人都同具有A、B、AB和O四型的血。如一A型的白人患嚴重貧血病，一個A型的黑人可以給他輸血，一個B型白人如果給他輸血，他就可能因此致命。

這並非說，種族之間沒有差別。差別是有的，如皮膚顏色的不同，就是一例。但差別並不是說一個要比另一個高等。這一意思，在論優生學的理論基礎時，已經提過了。

有人曾找出黑人的頭腦，平均比白人小一點。於是就推論到黑人的智慧較低，不能創造高尚文化，缺少自治能力。可是如果這世界該讓頭腦大的人們來統治，那末這世界的統治者應該是埃斯基摩人，因爲他們的頭腦平均比白人的大些。還有，在白人之中，有許多腦子比黑人的小，而他們的成就，有的却很大，例如名文學家法郎士的小小的腦子，就是一例。

在美國所舉行的智力測驗，發現我們中國人的孩子的成績，和日本與美國人的孩子相比，是一樣的；而黑人和印地安人的孩子成績，則較差些。又，美國北部的黑人，其測驗成績比之南部白人，是相等，或甚至較好。

在歐洲各種族之間，據美國移民的智力測驗成績看來，日耳曼族比其它歐洲族來得好些。可是如果這些測驗，在各原來的國家裡舉行，則發現各族間的不同，都是很有限的，都可看做是大體相同的。

還有，白人之中有天才和白癡，黑人之中也有。現在這世上不知有多少的科學家，文學家，哲學家，教育家，等等是出身黑種。而舉世聞名的俄國大詩人普式金的曾祖父，就是一個黑人哩。

至於我們中華民族之爲世界優秀民族之一，那已是公認的事實。我們的勞動人民，在幾千年前，就在這遼闊的地面上創造出燦爛的文化。而現在，在短短的時期裡，就打垮了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和對中國侵略已有悠長歷史的帝國主義。這並不是因爲我們中國的勞動人民的遺傳性，現在突然發生了變化，而是因爲人民覺醒了，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努力鬥爭，終於建立了一個新民主主義的社會制度。

如果今天，黑人也能有和我們同樣的好制度，他們就也可以很快地用事實來答覆反動學者的誣蔑。看看蘇聯境內的許多少數民族吧。這包括了各色人種。在不久以前他們是最落後的人民，現在他們已是最進步的民族之一。所以，白人的遺傳性優於有色人種的說法，是無稽的，是反動學者爲帝國主義的侵略，安排下的一件文化武器。

接着來批判純粹種族論。講民族也好，種族也好，都沒有純粹的。希特勒的日耳曼族，只存在於他和他的朋友們的幻想裡。實際上，日耳曼族的遺傳性，和世上其它的種族相同，是相異很大的，不是由一型，而是由千千萬萬型組成的。因爲人類自從遠古以來，隨着遷徙、雜婚和別的原因，早已把純種消滅。恐怕在人類本來就沒有純種這東西。你從東方走向西方，從南邊走向北邊，可以發現膚色在改變，眼色在改變，頭顱的型式在改變。你可以找到非常多的特性是介於兩個極端的特性之間。

嚴格講起來，民族是政治經濟和歷史文化的產物，和遺傳性是沒有什麼關係的。所以種族優越，同樣不是生物學的問題。

四　論絕育

絕育是施行手術使人不能生育的事。方法並不復雜，對男人，是把他的輸精管結紮或割斷便行；對女人，是結紮她的輸卵管。對男人，手術簡單，因爲輸精管長在身體外邊，容易開刀。對女人，而稍有危險，因爲輸卵管長在腹腔裡，要剖開肚皮才行。危險當然不大，約如開肚皮割盲腸一般。但因此喪命的，也間或有之。

據說，絕育對於改良人種，功效極大。美國的優生學家瓦爾妥(Walter)曾這樣寫着：如果全美國都能實行絕育法律，不要四個世代，即不必一百年，美國現在所有的犯罪，瘋癲，和疾病，十分之九可以消滅。瘋人院，監獄，和醫院可以大大減少，失業問題，貧病問題，退化問題，都不會再來麻煩人類。

換句話說，資產階級的優生學者們，是相信，可是一直沒有證明過，大部分的犯罪，瘋癲和疾病是遺傳的。他們主張最少如下的四類人是應該絕育的。(一)智力不足者，(二)會患精神病者，(三)身體有缺陷而又有遺傳傾向者，(四)可能產生身心不全的後代者。

我們來把這四類人分析一下吧。智力不足是用什麼標準來判定呢？如用智力測驗，則不可靠，尤其是對於智力介於所謂常態與低能之間的人們，至於眞眞屬於低能白癡的人，根本不必對他們施行絕育手術，因爲他們的生殖器官多發育不好，沒有什麼繁殖力；而且在歐美社會裡，他們多數住在隔離病院裡，沒

有生育機會。

會患精神病者該受絕育手術，也不合理。因爲瘋病和遺傳的關係，至今尙未十分明白，有些瘋病，確有遺傳傾向，有些則是環境的產物。例如美國患精神病者，年年增加，這並非由於美國人的遺傳性在年年變壞，而是美國的緊張的、複雜的，不合理的吃人制度所使然。

身體有缺陷而又有遺傳傾向者，這一點十分籠統。實際上，有遺傳傾向者是不易辨認得淸。比方說近視，有些是遺傳的，有些是後天的。倘使能正確無誤地査出一些近視是遺傳的吧，這也不要緊，因爲普通配上眼鏡便行。就是遺傳情形已經十分淸楚的缺陷吧，絕育手術也不一定能用。例如說「血友病」，要向這病人開刀，那簡直是要他的命。因爲這是破皮流血不易自止的遺傳病。

至於對可能產生身心不全的後代者施行手術，也屬難辦，主要是因爲不容易確定那一個人能產生身心不全的後代。査家譜，有時雖然也可得些材料，但不可靠的時候很多。要知道，人類遺傳學還是個很年輕的科學。

這並不是說絕育是毫不足取的方法。對有些缺陷，絕育是有效的。例如有一種四肢無指的身體缺陷，這是由父或母直接傳給子女的，要對付這種缺陷的遺傳，最好是施行絕育手術。

但屬於這樣容易辨出的顯性遺傳病，並不多。而大多數缺陷的遺傳性是複雜的，隱性的，或比較容易受環境影響的。要用絕育方法來對付這類毛病，是不容易見效的。比方假定智力缺陷純是隱性遺傳，又假定孟德爾遺傳定律完全正確吧，那末，要用絕育方法去對付所謂智力缺陷的人，使他們在全人口裡，從百分之一減少到千分之一，據計算，需要經過二十二代約六百六十年的時間；要從千分之一減少到萬分之一，需要經過六十八代約二千四十年的時間。說絕育法可以在三四代之間，減少了十分之九的罪犯、瘋癲、和疾病的美國優生學者，簡直是無知的騙子。至於這些缺陷，或完全或絕大部分是社會問題不是遺傳學問題，已是常識了。

美國現在已有許多州是在實行絕育法的。我們來看看這法律在那裡是怎樣發生作用的吧。

時間是一九二二年，地點是華盛頓州。有個農場苦力，名叫約翰希爾(John Hill)，年約四十，體大力壯，有妻一，子女五人。因爲貧窮，子女吃穿常感不足。他須時常請求社會救濟或進行偷竊，以免餓死。有一天，他偷了許多火腿，價值二十五元以上，被抓住了，承認有罪。依法，他可被判監禁六個月至十五年之久，法庭因看他和他的家庭都是智力低下的人，便向他提議施行絕育手術，可以不必坐監。經法庭解釋絕育手術的詳情之後，他同意了。

如果他不同意，他可能要去坐十五年的監哩。而且法官也沒有敍述應用什麼測驗方法去査出他們整家都是智力不足的人。如果根據一般法庭上的問答，那末，在法官面前，就是智力健全的人，也會吶吶答不出話來的。

另一例是強迫施行手術的。地點也是「文明的」美國。罪人是克里斯馬可來(Chris McCauley)，犯盜竊罪。據法官說：「這個人，年約三十五歲，智力常態以下，一舉一動，帶有很濃厚的不道德根性。他的血管裡流着黑人的血液，而貌可憎。」倘使他的膚色嫩白，像法官一樣，那強迫施行手術的事，可能避免吧!?

這就是美國的絕育法的實施例子，據說這法律的創立是完全沒有含着階級和種族偏見的。

這也就是美國的統治者把貧窮、失業問題，從社會學裡移到生物學裡的巧妙手法。

五　結語

（1）從以上簡短的論述裡，我們可以了解資產階級優生學的荒謬理論是沒有一絲的科學根據的。它是資產階級的一種統治武器，侵略武器。它是在無產階級覺醒的社會中、殖民地人民獨立運動的鬥爭中，發展起來，用以麻醉被壓迫的人民，用以轉移人民的鬥爭目標的。它的最大罪惡是要把社會問題、歪曲簡化、成爲生物學問題。

（2）我們並沒有否認人類之間，普遍存在着變異。但是變異和社會上的不平等，全無相同之處。變異是遺傳和環境的產物，而不平等則是階級社會的人爲的產物。要想用優生方法，以改良人種，使社會進步，人生幸福，完全是夢想。實際上，人種並沒有變壞，變壞的以及愈變愈壞的是帝國主義者本身。要使社會進步，人生幸福，最有效的是從打倒萬惡之源的帝國主義、改革社會制度入手。蘇聯是一個例子，我們中國又是另一鮮明的例子。

（3）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者，時常誣衊共產黨，說共產黨無視了而且摧殘了個性，說共產黨要把每一個人的工作、興趣和需要都劃一化，都變爲純型。這當然是無恥的讕言，實際上，無產階級的革命理論與實踐，都是尊重而且幫助個性的正常發展的。在「各盡所能、各取所值」的社會主義時代是這樣，在「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社會，也是如此。

國語語法綱要

趙元任

編者按：關於中國文法（或語法）的研究，在近若干年來，經許多專家的努力，已經有了很多的成績。雖然各家所提出的文法系統各有不同，但是無論如何，都足以表明中國語言是有它自己的完密而豐富的規律的。如果有人以爲中國語言沒有什麽文法，或不必講求文法，這些意見都是錯誤的。這種錯誤的觀念，事實上至今仍在社會上居於支配的地位。因而，從學校的語文教育中，學生完全得不到關於中國文法的知識，報紙雜誌上的作者與編者，也很少注意文法問題，以至在目前各種流行的讀物中表現出語法上的嚴重混亂現象。爲了改變這種情形，並配合愛國主義運動，我們認爲發展關於中國文法的研究並普及這種知識，是有很大意義的。本刊願意提供一部分篇幅，來進行這種討論。

甲 詞

一 字跟詞

漢字是單音節的。例如：人，有，每，今，的。

可是咱們分析漢語句子的構造，就知道能够單獨說的，自由運用的造句單位，不一定都是單字，常常是兩個或者更多的字的聯合。這種造句單位，或者是一個字或者是幾個字，並沒有公認的名稱。研究語法的人管他叫詞，可是詞是學術名詞，不是日常用字。例如：人，有，每回，知道，一定。

二 自由字跟黏坿字

要是一個字同時又是一個詞，咱們管他叫自由字。例如：好，霧。要是他一定要跟別的字（無論一個或者幾個，無論自由的或者黏坿的）聯合起來才能造成一個詞，咱們就管他叫黏坿字。例如今字年字都是黏坿字，聯合起來可以造成一個詞：今年。

咱們要注意，黏坿字永遠是黏坿的，可是自由字只是有時候兒是自由的。事實上，除了歎詞，所有的自由字都可以黏坿起來造成詞。例如車字頭字兩個自由字，可以黏坿起來，造成車頭這個詞。

單獨說一個自由字，比單獨念一個黏坿字容易聽懂些。（根據定義，黏坿字是決不單獨說的。）不過，無論黏坿字或者自由字，用的時候很少脫離實際環境跟上下文的。字容易不容易了解，看底下五個因素而定：

1、常用不常用，

2、有沒有同音字，

3、跟別的同音字比起來，常用不常用，

4、上下文，

5、實際環境。

例如：1.踹字是自由字，因爲不常用，脫離了實際環境、上下文，就不容易聽懂。2.外頭的外是黏坿字，因爲沒有別的同音字，就容易聽懂。3.要是咱們聽見 yaw 的聲音，就會聽成要字，因爲音 yaw 的同音字裡頭，要字是最常用的。4.可是聽見 chy—yaw（喫藥）的聲音，就很容易聽懂 yaw 就是名詞藥字。5.要是護士手裡拿個小瓶兒，對着病人說 yaw ，實際環境就能够確定這是藥字。

乙 句子

三 完整句跟簡略句

漢語的句子大多數是完整句，就是包含主語跟謂語的，例如：我不信鬼。比較不常用的是簡略句：有些只有謂語，例如：不高興去；可以查查字典；下雨了。（註一）對話常常用謂語句，例如：爲甚麽不要？因爲不好；請坐呀！歎詞也是簡略句。

完整句的主語跟謂語當間兒有（或者可能有）停頓，或者停頓小詞啊，吶，嘔。例如：你太瘦；你啊，太瘦。主語長的時候，後頭總跟着停頓或者停頓小詞。事實上，咱們的標點習慣，長主語後頭總用讀點點斷。主語跟動詞黏坿到一塊兒的例子很少，例如：這是，那是。

四　謂語的意義

主語跟謂語在語音上連繫的很鬆，意義上也是這樣子。在漢語的句子裡，主語可以從字面解釋成主題，謂語不過是跟主題有關的話。謂語不一定要指主語所指的那個東西的動作或者特性。例如：這地方兒可以游水；我是兩毛錢。

因此，動詞動作的方向只能由上下文決定。比方說，雞不喫了，要是咱們說的是餿雞，這句話的意思是說雞不再喫東西了，要是咱們喫飽了，主人又拿雞出來，那麼，說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咱們不再喫雞了。咱們可以說兩個人坐一把椅子，咱們也可以說一把椅子坐兩個人。簡單的說，漢語動詞沒有主動被動的區別。

五　謂語的種類

1、動詞謂語　最常見的謂語是包含一個動詞的。例如：他要點兒酒錢；這樣兒行。

2、體詞（注二）謂語　我傻子？我太太安徽人；今兒幾兒？今兒初三；他五尺半；我昨天到的。

謂語裡頭用體詞結構，最常用的辦法是加個動詞是字，把整個謂語造成動詞謂語。

3、主謂謂語　主語—謂語結構也可以用作別的主語的謂語，好像這個人心好。這句話跟只有一個主語的單純句這個人的心好意思差不多，可是兩句句子不完全一樣。別的例子：我道路生；我誰知道？（註三）

有些謂語本來是主謂結構，實際上用途却跟不可拆開的詞一樣。例如：您很面善；他太性急；謂語前頭可以加不，很，太這一類副詞。在眞正的主謂結構的謂語裡，副詞一定要擱在當間兒，例如他記性很好。要把眞正的主謂結構的謂語改成否定式，可以把不字擱在當間兒，也可以把不是擱在前頭，例如他不是記性壞。有些個主謂結構謂語有兩種否定方式，例如我頭不疼了，我不頭疼了。

六　主語的種類

1、體詞主語　主語的最大多數是體詞結構。例如：飯好了；你上哪兒去？這兒冷。有一種特殊的，常用的體詞主語，末了兒是的字，後頭跟着做謂語的形容詞，例如他寫的好；這個好的多。就表面上看起來，的好，的多是副詞。的好，的多不能是副詞，因爲在漢語裡頭，修飾者一定得擱在被修飾者的前頭（第八節）。正確的分析是他寫的（東西，樣子，……）好；這個好的（地方兒，程度，……）多。（註四）

2、動詞主語　例如：走行，不走也行；打是疼，罵是愛。動詞主語加體詞謂語要是有的話，一定非常少。逃僞頭可能是個例子。不過，咱們既然可以說眞僞頭，眞是副詞。逃僞頭的僞頭可以算是形容詞謂語。

3、主謂主語　完整句當主語用的例子：冰比水輕是眞的；他不來很好。

4、賓語兼主語　體詞結構可以是前頭動詞的賓語，同時又是後頭謂語的主語。例如：我叫他來；歸誰付錢？最普通的賓語兼主語是在動詞有字後頭的，例如我有個朋友會唱戲。

丙　造句法

造句法從詞出發來研究語言的結構。造詞法研究字怎樣造成詞。自由字才有造句的關係。

既然自由字的定義是能够單獨說的字，問題是咱們怎麼知道句子裡頭的字實際上自由不自由。咱們說過，主語跟謂語的當間兒可以有停頓或者停頓小詞。在主語或者謂語裡頭，詞可以給表示遲疑的呃—，嗯—，這個—這個這些字給分開了，更常見的是拖長詞尾的元音（上聲後頭是低調，別的調類後頭是原調尾的延長）。還有一點，咱們不在複雜的詞的當間兒遲疑。要是說話遲疑的人或者口吃的人在詞的當間兒打住的話，他一定打那個詞的起頭兒重說，好像我要理—，理—，理髮。

除了上文已經說過的主語跟謂語的關係，咱們還要討論底下各種造句結構。

七　並列關係

漢語的並列關係只用連着說來表示，例如你我他都來了；張三李四是兩個人。並列的項目可以用停頓或者停頓小詞隔開，例如猪肉，羊肉，牛肉，甚麼都買不着，每一項後頭都可以加啊或者咧。在你跟我都去這一類結構裡，跟不是眞正的並列連詞。這句話實在是動詞結構連用式。在又笨又傻裡頭，又是副

詞。因此，這句話又是連着說的並列關係的例子。反復式問句（二十九節）也是並列結構。

八　從屬關係

從屬關係最簡單的規則是修飾者擱在被修飾者的前頭，例如房子的頂兒，保險的公司，李四的紙，包東西的紙，包給誰的紙，我包的東西，我包東西的紙，包東西的人，這兒的東西，報上的新聞，在這兒的東西。當間兒不擱的字的直接從屬關係，結構常常很緊，就造成一個詞，例如房頂兒，白紙，不好，保險公司。這種結構介乎造句的跟造詞的之間。

九　動詞賓語結構

動詞—賓語結構也跟從屬關係一樣，常常結的很緊，是介乎仂語跟詞之間的單位。在眞正的動賓結構裡，賓語總是重讀的，除了老是念輕聲，要對比才重讀的代名詞。要是動詞有後加成分，或者賓語前頭有修飾語，那就成了仂語。比方說，喝水：他喝了一碗涼水。

有些動賓結構是黏附字造成的，動詞要賓語在靠近的上下文才能自由，賓語要動詞在靠近的上下文才能自由。比方說理髮的理字跟髮字都不是自由字。可是咱們可以問，你今兒去理髮不理，回答可以說理。拿他跟我現在理（leu）我的理髮這句話對比，理（leu）跟頭髮是甚麼地方都可以用的詞。還有別的黏附字拆開說的例子，費神：我費了您許多神，費神的神在別的地方不是自由字，咱們管這些字叫游離字。

十　動詞結構連用式

動詞結構連用式（下文有時簡稱連動式）是漢語很特別的結構。咱們已經說過連着說的並列關係，例如他天天兒寫信會客。在並列的造句結構裡，次序常常可以顛倒，例如他天天兒會客寫信。在動詞結構連用式裡，動詞結構的次序是固定的。其中第一個動詞結構有以下幾種主要的意義：

1、時間次序在先　等一會兒去：去等一會兒；我起來看了一份兒報：我看了一份兒報起來；拿刀給他。

2、條件　不難受不哭：不哭不難受。

3、地點　打這兒走；離這兒太遠；在水裡扔球；望東走；對他放槍。

4、方法　拿手喫東西；用心做。

5、目的　替我說話；給他拿刀；給我滾！對他道歉。

6、比較　你比他矮；他越睡越睏。

7、前置外動詞　把碗砸了。（註五）

（本節完，全文未完）

（李　榮譯）

·附注·

註一　無主語的動—賓結構　漢語的句子不單可以省略主語，並且可以根本沒有主語。例如，下雨了。關於天氣的說話大多數是用動詞—賓語句式，例如颳風了，下霧了，着火了。了字表示這是說話時候注意到的新情形。

註二　譯者註：原文沒有給體詞下定義。體詞大概包括名詞，地位詞，時間詞，代名詞，助名詞複合詞。

註三　主—謂謂語　他心好不可以分析成他的心好，雖然這兩句的意思差不多一樣。他是心好的主詞，心又是好的主詞。

註四　補足語跟謂語　在聽得懂（意思是能聽懂），聽得清楚（能聽清楚），寫得好（能寫好）這幾句話裡頭，得懂，得清楚，得好是可能補足語。

在他寫的（東西，樣子，……）好這句話裡頭，寫的的意思是說寫的東西，寫的樣子。他寫的是主語，好是謂語。

在口語裡頭，寫得好跟寫的好同音，意思由上下文決定。得跟的是寫法的不同，用來表示意思的不同的。

在敍述句加嗎或者啊造成的問句裡頭，意思也是兩可的。口語裡，他寫得好嗎？跟他寫的好嗎同音。可是在反復問句裡頭，說法是不同的：他寫得好寫不好？他寫的好不好？在否定句裡，說法也是不同的：他寫不好，他寫的不好。

註五　前置外動詞　動詞有賓語又有補足語的時候兒，漢語最常用的說法是把他打散，改成兩個動詞結構。第一部分是前置外動詞把字加賓語，第二部分是主要動詞加補足語。比方說，碰瞎了眼睛，更常用的說法是把眼睛碰瞎了。同樣的，把這碗飯喫完了；把這扇門開開。

訂　正

本刊第三卷第六期第五頁，第十七行「現實出來的事，是很少的，這是因爲從事變革」係誤植，應刪去，特此訂正。

關於漢字的字音跟字形

林漢達

一　字無定形與公認的正字

古人說，「字無定形」。這是因為古時候字少，不够用，寫字的人有時候寫不出某一個字，或者壓根兒就沒那個字，就按他自個兒的口音借用另外一個聲音相像的字；要是這麼整個兒的借用不行，他還興借用半個字，再加上一點兒他認為能表顯某一個意思的符號，就這麼造了一個新字。借用同音字或者創造新字雖說也有一定的規矩，可是各人的寫法究竟不能全都一樣。為了這個，古書裡頭有好些字說是可以互相通用的。這互相通用的字可不少哇，裡頭有些字有三五種寫法的，也有十來種寫法的。字越造越多，到了某一個時期，寫某種內容跟語法的字已經够用了。又經過了長時期的使用，大多數同音同義的字都給淘汰了，只留下那些最常用的作為「正字」。到如今，一般說來，漢字已經有了定形（雖說有些字除了正體以外，還有別體，那可不算是白字，比方：稽、稽，𥢕；蟁、蟁、蟁）。除了個別的例子以外，要是寫不出原有的正字，也想像古人那樣按自個兒的口音借用另外一個同音的字，人家就說你寫的是白字。可是所說的正字也不是一成不變的。為了合乎新的需要，或者大家都認為某一個白字比那個正字更簡便或者更精細，大家都那麼寫，新的寫法就變成了正體。那個以前的正字到後來反倒認做簡體字或白字了。比方：

新字	舊字	新字	舊字
個	个	拉	擸
算	祘	傢	家
雲	云	鐙	登
氣	气	咚	鼕
陽	昜	鐵	鐡
網	网	嗅	齅
蚊	蟁	鬍鬚	胡須
騾	蠃	嗚呼	於戲
地	埊	慷慨	抗慨
畝	畮		

二　繁體字跟簡體字

這種改變字形或者使用新字，多半是進步的，可也有例外。這是因為在使用文字的過程當中，也有兩個矛盾的想頭（就是一個人也可能有兩種矛盾的想頭）。一種是：認識到文字是交際的工具，工具越簡便越好，就把原來古文裡頭筆劃複雜的字，寫成了較比簡單的樣兒。那簡單的一種就是古人寫的簡體字。比方：

原來的繁體字：龝、鱻、鼃、蠭、嗁、蜑、醻、饟、僊、㝱、灋。

後來的簡體字：秋、鮮、蛙、蜂、啼、蛋、酬、餉、仙、夢、法。

另一種人正倒過來，認為文字是少數人的玩藝兒，越難越顯出高貴，就存心加上一點兒不必要的麻煩，把原來古文裡頭筆劃簡單容易寫的字，寫成了複雜的難寫的字。比方：

原來的正體字：乱、从、众、旡、厶、勹、冫、㬎、弁、萬、庵。

後來的繁體字：亂、從、衆、無、私、包、冰、濕、棄、晝、靈。

為什麼把原來簡單的字寫成複雜的字呢？我想不外乎三種用意。第一種是為了分化意義不同的同音字，叫文字更精密起來。比方：「句」分成了「句」

跟「鉤」，「須」分成了「須」跟「鬚」，「采」分成了「菜」、「採」、「彩」、「綵」這些個。第二種是存心加點兒麻煩，拿難寫難認的字去吓唬那些字兒認得不多的人，來顯出自個兒有學問，對於文字本身可並不增加任何什麼價值。比方說，現在還有人把庵、玩、時、春、梅、村、乃、稿這些個字寫成了菴、翫、旹、萅、楳、邨、迺、藳這些個，特別是有些舊派的詩人畫家頂喜歡這一套。第三種用意是夾在第一種跟第二種的當間兒。在主觀的想頭上，可能跟第一種一樣，在客觀的功用上，可跟第二種一樣。主觀上想叫文字更精密，就加上好些看來好像挺有意思的其實是不必要的玩藝兒。比方：作為「糢糢糊糊」，或者「稀里糊塗」解說的「蒙蒙」，寫成了「蒙蒙」、「矇矇」、「朦朦」、「濛濛」、「瞢瞢」、「懞懞」、「夢夢」、「儚儚」、「幪幪」、「氋氋」、這些個。你說這許多同音又同義的字兒，還不全是「糢糢糊糊」的意思嗎？它們可都有挺細微的分別：形容太陽還沒有出來的糢糢糊糊是一個字，形容月亮的糢糢糊糊又是一個字，眼睛或者神志的糢糢糊糊又是一個字……乍一看，好像字眼分得挺細膩挺精密。有些人就認為這是咱們漢字的長處。可是這種長處還得考慮一下。

三　不必要的麻煩

這種細膩不但不是必要，而且是沒法兒照顧到各方面的。比方說，有了這麼些不同寫法的「蒙蒙」，還是不够用。太陽、月亮、水、草的「蒙蒙」有了分別了，山頂山脚的「蒙蒙」，戰場上砲火的「蒙蒙」，上半天、下半天的「蒙蒙」，怎麼分別呢？喝醉了酒的糢糢糊糊，電影片子的糢糢糊糊又該怎麼寫呢？

再比方：皮包的「包」字，按正體寫據說應該寫做「鞄」，因為皮包是皮革做成的；扁豆的「扁」寫做「䔍」，因為是五穀一類的草本；毛筆的「筆」有人寫做「笔」，因為是竹桿跟什麼毛做成的；身上長的 geda 寫做「疙瘩」，吃的菜疙瘩麵疙瘩寫做「咯噠」，線糾個疙瘩寫做「紇縫」……這些同音又同義的字用不同的字形寫出來，是不是眞增加了文字的精密性呢？那可不見得。因為皮做的「包」寫做「鞄」，那麼布做的呢？人造絲的呢？綢緞做的呢？紙做的呢？扁豆的「扁」寫做的「䔍」，那麼扁臉、扁腦袋、扁柏、扁花瓶、扁什麼什麼又該怎麼寫呢？毛筆「筆」寫做「笔」、鋼筆、鉛筆、粉筆、蠟筆又該怎麼寫呢？麵疙瘩寫做「咯噠」、線疙瘩寫做「紇縫」，那麼土疙瘩、樹疙瘩、棉花疙瘩、飯疙瘩這些個按理應該寫做垎墶、杚橽、𦖾𦗯、粑䊦……不是成心找麻煩嗎？

由此可見，同音又同義的字分成各種不同的字形，只增加文字的艱難，對於文字的功用可並不提高。

四　簡便的辦法

這種把同音又同義的字細細膩膩地用不同的字形寫出來，只是有閒階級的玩藝兒，人民大衆（還只限於識字兒的大衆），可不搭理這一套。他們另外有個辦法，就是寫簡便的字。這兒所說的簡便的字，你管它叫白字也行，叫新的正體字也行。反正他們就這麼寫了。要是我們把文字當做交際的工具，那麼只要大家看得明白，挑個聲音相同，筆劃簡單點兒的字就行了。要是你說這麼寫是正字，那麼寫是白字，這未免太古板了。老實說，用漢字寫口語的聲音，特別是過去不見經傳的大衆口語，誰寫都免不了用白字，比方說，還沒開的花叫做 guder，按理（就說有理吧）應該寫做「蓇葖兒」，可是蛤螞 guder 怎麼寫呢？寫做蛤螞蛄蝫兒嗎？胳臂上端的一塊肌肉也叫做 guder，怎麼寫呢？寫做牯腂兒嗎？敢情菇得兒、骨突兒、菰朵兒、蓇葖兒、「蛄蝫兒」「牯腂兒」，只是圓不溜丟的一塊玩藝兒（這個丟字一定又是個白字，可是誰寫得出第二個念「丟」音的漢字呢？）用任什麼字寫都免不了寫白字。如果咬文嚼字地必得查遍古書，挑了一個誰都不認識的算是正字，那我們乾脆就甭寫文章了，因為我們現在寫的字，要是對證古本，白字可眞多了。比方：要是有人說，「袜」是白字，應該寫做「襪」，他就該知道「韈」的正字還該寫做「韤」呢！

以上說明拿難寫難認的所謂正字去批評大家寫慣了的某些字，是沒有好處的。就算是白字吧，大家都這麼寫了（頑固的古文家除外），白字也可以變成正字。我說「大家都這麼寫了」，這裡頭是有一種共同的趨勢的，就是：揀簡便的寫，揀容易認識的字寫（最好能挑個南北讀音都相近的字）。我想根據這個簡便的辦法，來回答兩個具體的問題：（1）寫不出字，怎麼辦？（2）讀音跟口語不一樣，怎麼辦？

五　寫不出的字

有好些口語的音，在書本上找不到相當的字，這是因為從前的書很少用老百姓的話寫的。用漢字寫口語，有時候老覺着寫不出字的困難。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目前有三種不同的辦法：第一種是從古書裡或者大字典裡去刨「正字」或者意思相近的字眼。比方：燒飯的時候飯燒開得泛出來叫做 puchulai，這個 pu 字怎麼寫呢？要是寫個「浦」字也勉強可以借用，可是據說這是個白字，正字應該寫做「𣹢」。啄木鳥叫做 bendermu，就寫做「奔得而木」也念得出，可是據說應該寫做「鴘啄而木」。「打破沙鍋問到底」，據說這個「紋問」字又是白字，正字應該寫做「璺」，璺是玉器或瓦器的裂紋，打破沙鍋裂紋裂到底，再由璺字轉到問字。「別扭」也是白字，應該寫做「彆拗」。衣裳的「滾條」也是白字，應該寫做「緄條」。我老覺乎着就說這些全是正字，也只有文字學家感到興趣，對於一般人除了增加麻煩以外，沒有別的好處。

第二種辦法是創造新字。比方：插䦆，𨮻青，𢷬鈀，𡜗聲，𣍐兒，賅錢，擤鞋底，𩯣頭髮，撼𨦭，𢭃手，㬹腰，熼鐵，熇火，衚衕，𢫕拉，什麼什麼的。這些個字要是古書裡頭也找得到，那麼就屬於第一種辦法，要是不見經傳，就是新字眼了。我認為在沒法的時候也不妨造新字，可是最好不要造得太難認。要是不十分需要，還是不造為妙。就說從前本來有那個字也不一定非用不可。比方：該錢、榜青、納鞋底、饰𨦭、搗手、𨰻鐵、着火、哈腰、蓬頭、胡同、搭拉，也不算錯。

第三種法子是借用同音字。我認為這是個又簡便又實用的辦法，特別是能够挑選表音的字，就是不致叫人望文生義引起誤會的字。比方：「嘮嗑」、「別扭」、「够嗆」、「哈腰」、「卜卜登兒」、「老實巴交」、「轟拉瓜唧」、「蛤螞咕得兒」。要是你說「老實巴交」應該寫做「老實巴焦」、「蛤螞咕得兒」應該寫做「蝦蟆骨朵兒」，我實在看不出有什麼好處。「巴焦」跟「巴交」，「骨」跟「咕」，每一個字拆開來說，全沒意義，連寫起來才表出了一個多音段的詞兒。既是表音用的，挑一個聲音相近容易認識的字就行了。

根據上面的理由，有好多詞兒，只要有一個表意的字，另一個用表音的字就更簡便了。比方：

括風（颳風）　　伙伴（夥伴）
疤拉（疤瘌）　　交卷（繳卷）
夾襖（袷襖）　　征粮（徵糧）
收獲（收穫）　　下巴壳兒（下巴頦兒）
利害（厲害）　　黑咕隆多（黑咕籠鬆）
餅干（餅乾）　　花里胡梢（花麗狐哨）
趕麵杖（擀麵杖）
比麻油（篦麻油）

六　讀音跟口語的不同

大衆口語跟漢字的讀音大體上是相同的，因為文字本來是代表語言的。可是有好些說話的聲音早已變了，字可還是那一個字。還有，一個字用在不同的地方要念做不同的聲音。這兩件事對於初學文化的工農大衆來說，是够困難的。比方：「隔」念「革」，可是「隔壁兒」北方的老百姓叫做「介壁兒」；「晶」念「精」，可是「晶亮」念「曾亮」；「訴」念「素」，「告訴」可說成「告送」。這一類的詞兒再舉幾個例子如下：

央告（念央格）　　落下（念臘下）
露臉（念漏臉）　　膩煩（念膩委）
提溜（念低溜）　　呵欠（念哈吃）
暴露（念鋪露）　　一宿（念一朽）
窩僂（念窩鋪）　　繫着（念記着）
圈住（念卷住）　　挺得地（念挺 dəi 地）
擦傷（念蹭傷）　　磨煩（念磨分）

這些口語詞兒要是按漢字的讀音念，管保叫老百姓聽不懂；要是不按「正字」寫，又怕人家看不懂。這眞是兩頭不討好的事兒。為了這個，我只好提出兩個不太澈底的辦法：（一）在不致因為望文生義而引起錯誤的時候，就寫個聲音相近的字。比方：央格（央告），介壁兒（隔壁兒），告送（告訴），曾亮（晶亮）。（二）在不能不寫正字可又怕念別的時候，就在正字旁邊註上一個語音。比方：繫（念記），呵欠（念哈吃）。在還沒採用拼音文字的時候，我認為只好這麼辦吧。

學術講座

對資產階級法學反動本質的批判（上）

一九五一年三月七日在中國新法學研究會上的講演——

蘇聯法學專家 H·Г·蘇達里可夫

在這個講演中，我們將要研究下列幾個基本問題：

1. 資產階級國家與法律科學的階級性。
2. 資產階級法律科學方法論上的根本缺點。
3. 資產階級法律科學發展的基本階段。
4. 資產階級法律科學的現狀。
5. 蘇聯的法律科學。

要對資產階級法律科學所有爲數衆多的學派和主張都來加以研究，我們是不大可能的。這雖然會有其一定的意義，但它是需要相當多的時間，因爲資產階級法律科學從來也不是並且也不可能是某種統一的完整的東西，它永遠是許許多多各式各樣的學說，傾向和流派。只是這一點就足以說明資產階級法律科學的方法論上的缺點，說明它不僅在基本問題的觀點上，甚至在一些次要問題的觀點上，也是無力創造出一個統一的體系。

在研討上述五個問題的過程中，我們當然要研究到某些學派和學說，但只是那些流傳得較爲廣泛的，並且在它發展的一定階段上會經是或者現在是資產階級法律科學的典型的學派和學說。我們也要研究一些在資產階級科學中即至今日仍不失其意義的學派。在法律科學長久存在的時間內，某些個別學派和學說產生出來了並已完全走下了歷史舞台，而沒有任何意義了，就拿所謂國家有機體論爲例來說，這種理論的代表人曾經斷言，國家只不過是一個大的活的有機件，它具有一定的感覺器官，具有爲一般生物所固有的一切屬性。尤其是資產階級學者斯賓塞曾主張過這種國家觀，並在十九世紀的末葉獲得了相當的流傳。但是由於它那種非常明顯地表現出來的不科學和庸俗的觀點，所以並未取得廣泛的發展，而在現時它已經完全失掉了原來即已不甚重要的地位。

資產階級國家與法律科學的階級性

現在讓我們來討論第一個問題，資產階級法律科學的階級性問題。

馬列主義的出發點是：任何一種科學都是階級的科學，任何一種科學都是爲某些一定的階級或者是某一個階級底目的而服務的。馬克思主義者堅决地駁斥了那些說什麼科學可以脫離政治，脫離階級利益而存在的虛僞論斷。文明社會的全部發展史令人信服地證明，超階級的，或階級外的科學，即處於某些一定階級所實行的政治以外的科學是沒有的，也不可能有的。

國家與法律科學所研究的，就是階級統治最尖銳的工具，因此它的階級性是無可置疑的。如果說，國家與法律從它發生的最初時候起，就是某些一定的階級在其爲爭取奠定自己階級統治的鬥爭中，在其爲反對某些階級的鬥爭中的工具，那末，就不可以從某一種抽象的立場，從「純粹」科學的立場來研究國家與法律的起源和本質。從斯巴達克所領導的發生在第一世紀奴隸佔有制羅馬的强大的奴隸起義時起，一直到我們今日，國家與法律永遠是被利用作實行階級强制的基本工具。一九一九年七月，列寧在「論國家」的演說中曾經指出，「當你們已經充分認識，充分領會國家問題的時候，你們在關於國家的問題上，在關於國家的學說上，在關於國家的理論上，就始終都能看見各個不同階級之間的鬥爭，始終都能看見在各種國家觀點底相互鬥爭中，在對於國家作用和意義的估計上反映出來或有其表現的這個鬥爭」（列寧全集第二四卷第三六四頁）。既然法律和國家一直是有不斷的聯系，那末，列寧「論國家」所說的話也可以適用於法律。

馬列主義科學與否認法律科學階級性的資產階級理論家相反，它公開承認並証實國家與法律科學以及一切其他科學的階級本質。反之，一般資產階級科學，特別是資產階級法律科學却堅决否認其階級本質，並想盡方法力圖作出自己的超階級的、與任何階級利益無關的結論來。

馬列主義科學也公開承認並証實任何一種科學與政治的聯系。特別重要的

要注意，法律科學，國家科學與政治是聯系着的。馬克思主義者公然宣稱，國家與法律是爲實現一定階級的政策而服務的。法律如離開政治就什麼也不是了，政治是法律和法紀的基礎，法律的任務，就是要在法律上表現出政治思想，政治目的和政治任務。無論國內法，以及國際法都是爲實現政治目的而服務的。如果我們注意一下美國壟斷資本家在現時所實行的國內和國際政策，那末我們就會看到它們在政治上堅決執行的反動方針是如何地也在法律上獲得反映。反動的法律日甚一日地出現，而這些法律甚至和一百六十多年前所通過的美國憲法都是牴觸的，同時，美國中央的以及地方的國家機關的反動本質也愈來愈公開地表現出來了。

大家都知道，德國哲學家黑格爾是被資產階級的法律家們看成是「哲學之神」，看成是新的國家與法律科學之奠基人的。有一些資產階級的理論家對於黑格爾的「法律哲學」一書佩服到五體投地，認爲是法律思想發展的頂峯，他們直到現時，還是把自己的結論與原則建立在黑格爾這一著作的基礎上。最近，有一位中國同志對我說，北京某大學直到目前在研究哲學課程時，還把三分之二以上的時間花費在黑格爾上面。可是，在我們看來，黑格爾的唯心主義的、反動的思想難道值得加以那麽大的注意嗎？

如果我們讀一讀黑格爾「法律哲學」的著作，那麽我們恰恰在它那裡便會碰到像「道德觀念的現實」，像「神在地上行動」等等關於國家本質的定義。難道在這樣的定義裡，我們能找到任何一種即使是捉摸不定的論述說到國家是服務於極具體的人世的目的，而非天上的目的，它是服務於極具體的人的集團，亦即服務於階級，而不是服務於神的，非現實的觀念嗎？當然在黑格爾的著作中，這種說法是沒有的，也不可能有的，黑格爾是德國反動資產階級利益的典型代言人，掠奪戰爭的狂熱的支持者，按照黑格爾的意見，這種戰爭彷彿是會使人類從停滯中「振作起來」似的，因而，它是必要的。他是勞動人民的狂暴的敵人，對勞動人民，黑格爾除稱之爲「賤民」外，是沒有別的說法的。但是，黑格爾雖否認國家的階級性，而把他的國家頌揚成神力的現象，須知他同時就是爲極明確的階級目的而服務的。須知這就是他所聲明的，「絕對觀念的發展，國家與法律之形式的一般發展，——都在普魯士立憲君主制裡完成了」，依他的意見，這個君主制是最完善的國家形式，並且是最完全地符合於絕對觀念的。

黑格爾關於國家與法律的學說是其全部哲學學說中最反動的部分，只要黑格爾一觸及國家與法律的問題，他立刻就完全公開地叛變自己的辯證法，並成爲暴力和剝削人民大衆的狂熱的擁護者了。

隨着國家與法律的本質及其與政治的聯系之日益公開的表現，那些力圖證明國家和法律不是爲階級利益而是爲抽象的全民利益，爲普遍的理想和正義服務的資產階級法學家，也更加明確地表現出自己的熱心。規範主義法學派（舊譯純粹法學派——譯者註）的領袖，原籍奧國而長期在美國居住並已成爲美國化的奧國人凱爾曾的論斷，在這個意義上是最爲凸出的。在新的環境下，在我們的時代，凱爾曾拉出了那個被康德在當時發展過了的唯心主義概念。凱爾曾本人在他所著「純粹法學說」一書中（從這本書的名稱上我們就已看出它的錯誤和不科學，因爲建立任何純粹的法學說是不可能的），企圖向讀者證明：要想完全瞭解法律現象只有在純粹的形態上去研究國家和法律，而不和現實社會關係取得任何聯系時才有可能。凱爾曾斷言，要認識國家與法律，只有在政治以外加以研究時才可以達成。照凱爾曾的意見，國家與法律只是反映當爲世界，而與現存的東西，即與存在世界毫無共同之處。根據他的意見，國家是純粹法的範疇，它只是爲維持法律規範的遵守而存在的。

凱爾曾完全和另一個資產階級哲學家兼法學家斯坦穆爾相一致的，斯坦穆爾較早就號召要藉助於特別的法律方法來研究法律現象，因爲法律現象是一切其他社會現象的基礎。資產階級學者就根據斯坦穆爾和凱爾曾的論斷，企圖使法律從現實中，首先是從實際存在着的階級矛盾中脫離開來，而把它引到絕對的、極端的境地。

還可以舉出另一個所謂心理法學派代表者的主張，這個學派也很明顯地表明着資產階級法學理論家的趨向，在研究國家與法律現象時，避開階級，避開政治和現實現象，而走入形式教條的說明和唯心主義的構想。這一學派的代表人之一彼特拉日次基在其「法學理論」一書中聯系到道德論而說道，法律現象，只有從法律關係主體的內部心理體驗的觀點去加以研究，才能正確了解。依照彼特拉日次基的意見，只有人類的精神現象，才是法律和法律關係所由形成的現實環境。

上述規範主義法學派和心理法學派，恰好發生在二十世紀，即發生在進步和文明力量與反動力量之間的階級矛盾達到特別尖銳的階段時，這完全不是偶然的。凱爾曾，斯坦穆爾，彼特拉日次基及別的一些人，由於這些矛盾非常明顯而不可能加以否認，於是就企圖使科學的注意力從現象的因素脫離開來，而

轉移到抽象的議論方面去。

但是這些企圖的本身證明，凱爾會，斯坦穆爾及其他的人否認國家與法律的階級性，而自己就是服務於一定階級的目的，因爲他們企圖把羣衆引入迷途，使他們離開階級鬥爭的任務。資產階級的反動理論家們說着法律的超階級性，而其本身就是在爲一定的階級目的，即剝削者的階級目的而服務。

把國家看成一個代表和保護全社會利益的機關，看成是保護社會秩序和安全的守衛者的觀點，在資產階級科學中，曾經獲得廣泛的流傳。

資產階級理論家勞倫茨・斯坦因，拉伯特等人斷言，國家權力是統一的或共同的意見在國家中的表現。還可以引證資產階級科學的其他許多代表人的意見，對於這些意見最典型的就是那種說什麼國家是守衛全社會利益的超階級組織的論斷。這種論斷的目的乃在喚起社會的一切成員，就中也包括被壓迫的人民來關心國家權力的鞏固——因爲資產階級國家好像也爲他們創造着必要的生存條件。

這樣的論斷之所以需要，是爲了要把必須嚴格遵守國家政權機關所有那些彷彿是表現全體意志從而也就是表現被壓迫階級意志的命令、立法文書和行政法令的觀念，灌輸到被壓迫人民的意識裡。

與反動的資產階級法學完全相反，馬列主義法學公開承認國家與法律乃是階級的範疇，它們所表現的是一定的統治階級的意志。國家與法律既然是階級的範疇，那末研究階級社會這些現象的科學，從而也就永遠是有其階級性的，也就是階級的科學。

經常有人對馬克思主義者說，承認科學的階級性，承認科學的黨性，這就必然會使科學陷於片面性，說科學要是有階級性和黨性，就不會使其成爲客觀的，它也就不能把實際上的眞理反映出來。這樣的論證如果也可以提出的話，那末，這只是指資產階級科學說的，而不是指馬列主義科學說的。

馬列主義科學既然是有階級性的，有黨性的，是維護千百萬勞動大衆利益的科學，那它同時也就是揭示出客觀社會發展規律的眞正的科學。這由馬列主義法學即關於國家與法律的科學方面的例子裡，可以特別明顯地看出來。現在就來把這科學的一些原理說一說：

（一）從馬克思主義科學的見地來說，不但資產階級剝削者國家是有階級性的，而且社會主義國家也是有階級性的。我們把這一命題同樣地應用於剝削者國家以及社會主義國家，難道這不是說明對於問題的客觀看法嗎？但是我們不能只局限在這一點上。還要注意的，是剝削者國家是有階級性的，但它是表現一小撮剝削者的利益的，而社會主義國家雖然也是有階級性的國家，但它是表現全社會絕大多數的利益的。

（二）從馬列主義科學的見地來說，一切國家都是強制的機關、機構，和機器。我們並不否認社會主義國家也在一定的情形下使用強制，難道這不是說明馬列主義科學對於國家與法律問題的客觀看法嗎？絕對是能够說明的。但對於上面所說的，我們必須加以補充。剝削者國家裡的強制，主要地是管理人們的基本原則，而強制本身之被廣泛地使用，是用以侵害多數人利益來保證少數人的利益；可是社會主義國家裡強制，並不是管理上基本的因素，而是輔助的因素，如果它在稀有的情形下也被使用的話，那末，也只是爲了有利於絕對大多數人民，而反對一小部分破壞分子和新社會制度的敵人。

（三）從馬列主義科學的見地來說，一切國家都是歷史的、過渡的範疇。一切國家都是由於一定的客觀原因而產生出來並消亡下去，或被暴力所消滅。馬克思主義者依據客觀的原則，認爲社會主義國家在一定的歷史發展階段上，即在沒有資本主義包圍的時候，也是要消亡下去，而成爲無用的東西。難道這不是說明馬列主義科學的客觀性嗎？可是，要知道在資產階級理論家當中，無論何時何地，却從無一人說過資本主義國家是屬於臨時的、過渡的範疇。相反，他們中間每一個人以及全體一致都硬說，國家，特別是現時的資本主義國家，將要永久常存的。

由這些以及其他許多例證裡，就可以得出馬列主義法學是否是客觀的結論。徹頭徹尾浸透着階級利益，即剝削階級利益的資產階級法學，就不能不是階級的科學。但是資產階級法學却否認這一點。

馬列主義科學既是表現着千百萬勞動大衆的意志並服務於他們的目的，所以也就是階級的科學。可是它是公開並率直地聲明這一點的。列寧在說明資產階級的國家與法律科學底階級性時指出：

資產階級「……把關於國家的學說用來辯護社會上的特權，辯護現存的剝削制度，辯護現存的資本主義，正因爲如此，所以在這個問題上期待人們表示無偏頗的態度，在這個問題上希望那些以具有科學精神自詡的人給你們拿出純粹科學的見解，那就大錯特錯了」（見列寧著「論國家」）。

對於資產階級的國家與法律科學底階級本質問題便應這樣去了解。

（本節完，全文未完）

（法編委員會編譯室譯　陳漢章校）

學術討論

關於中國古代社會的性質和分期問題，國內外的史學工作者至今還沒有得出共同的結論。對於這一問題，我們歡迎在本刊展開討論。——編者

中國古代社會的早熟性

嵇文甫

人類歷史的發展，雖然具有一般法則性，雖然原始公社制時代，奴隸制時代，封建制時代，資本主義時代，社會主義時代，是人類社會進化必由的過程，然而在各民族中具體發展的情形是不必盡同的。特別是東方諸國的歷史發展，比起西方來，顯然帶有早熟性。這就是說，東方的「文明期」來得較早，當它的「原始社會」還沒有發展到爛熟的時候，它已經「文明」化了。這種早熟性一直影響到東方歷史的各階段，使它不像西方那樣，大開大合的，從這一階段一直發展到頂點，然後崩潰下去，轉入另一個階段，程序清清楚楚，前後截然兩樣；恰好相反，它是在原始階段中早已奴隸化，在奴隸階段中早已封建化，前後相因，渾融而曖昧，新的混着舊的，死的拖着活的，遂形成一種漫長的停滯狀態。其所以不容易劃分階段而聚訟不決者，也正由於此。倘若每個階段大開大合，明白放在那裡，像西方那樣，還爭論個什麼呢？

即如中國歷史，唐虞以前是原始時代，這是沒有問題的，可是奴隸制時代究竟放在那裡？殷呢？周呢？秦漢呢？甚至究竟有沒有這樣一個奴隸制時代呢？大家所以爭論不決，其癥結就在乎這個早熟性。正因爲沒有注意到這個早熟性，專拿希臘羅馬的典型奴隸制社會作標準，所以有些人看到中國歷史上從未出現過像希臘羅馬那樣高度發展的奴隸制度，就說中國根本沒有經過奴隸制時代；反之，主張中國經過奴隸制時代的人，就盡量誇大中國的奴隸制度，硬把殷代，或周代，或秦漢，描寫得儼然像希臘羅馬一樣。其實中國確曾經過一個奴隸制時代，然而那只是一個早熟的奴隸制社會，而並不是像希臘羅馬那樣典型的奴隸制社會，我曾經有個時候把夏商稱爲「國家初形成時代」，把整個周朝稱爲「原始國家封建化時代」，正是指這個早熟性奴隸制社會的發生及其崩解過程而言的。

本來，在以氏族爲基礎的原始社會中，其最高組織爲氏族聯盟，聯盟首長亦由各氏族部落推選。這時候社會還沒有分化成階級，無所謂統治者，也無所謂國家。傳統中的堯舜禪讓，實際上正是以這種歷史事實爲背景的。「家天下」的局面開始於夏。這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王朝，也就是第一次建立了國家。所謂「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的傳說，正指示出原始民主制度的沒落，而統治者階層的出現。照崔東壁在夏考信錄上的解釋，禹之傳啓，雖傳子而實在仍是傳賢，自啓以後，幾經波折，直到少康季杼之間，傳子的制度才眞正確定了。從偶然的世襲，到定例的世襲，和原始民選酋長轉變爲世襲統治者的歷史過程恰相符合。固然，關於夏代的史實，我們還沒有確鑿可靠的文獻可考。然而據周人時常稱述的「我不可不鑒於有夏，我不可不鑒於有殷」，「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這一類話看來，殷王朝以前還有一個夏王朝存在，總該不成問題的。不過這個夏王朝所建立的「國家」，實在帶有早熟性。根據後來殷人周人秦人追溯其祖宗的世系，其父系只追溯到契，棄，柏翳，都正值唐虞時代，可見那時候還正是從母系氏族轉變到父系氏族的過渡期。「傳賢」與「傳子」的遞邅，正和這個過程相照應。再證以考古學的材料，傳世銅器，大部分都是周器，殷器就很少，夏器便全是贋品了。我們現在只是因殷周銅器之盛興，逆推上去，認爲夏代亦當早有銅器而並無實物上的證據，大概這還是從石器時代剛進入銅器時代罷。剛進入銅器時代，剛進入父系氏族，不過才相當於摩爾根所謂「野蠻期」的「中段」，至多「上段」。然而就在這時候，夏王朝建立了，他已經「文明」化了，已經征服和統治許多氏族部落而成爲一個「國家」了。自然，這樣的國家，還是一種半部落半國家的樣子，帶有濃厚的氏族色彩。

殷代是奴隸制國家，大體上已爲近來許多學者所公認。在殷墟卜辭中，有奴，僕，奚，億……等字，是殷代奴隸制出現的明證；而伐鬼方，人方，羊方，呂方……正爲其奴隸掠奪的來源。看盤庚篇所述，在那裡講話的，分明是個國王，而決不像一個氏族長老，分明已經具有強制性的國家權力。不過我們也不可把殷代國家的性質，殷代奴隸制發展

的程度，估計得過高。我們雖不能照郭沫若先生舊日的說法，拿兄終弟及、多父多母，先妣特祭等，來證明殷代還行着母系制度，彭那魯亞制度，然而從那裡面總可以見得殷代社會還保留着極濃厚的原始色彩。所謂「多子族」，所謂「殷民七族」，「殷民六族」，「懷姓九宗」，顯然還是以氏族爲社會構成的單位。當時土地全屬於王，尚未分劃，尚未私有，可以說是一種土地國有制。所以在殷墟卜辭中沒有「錫土田」的記錄，而處處可見「王」在農業上的活動。如「王呼小臣令衆黍」，「王大令衆人曰脅田」，以及「觀黍」，「受年」之類。試一看胡厚宣氏卜辭中所見之殷代農業（甲骨學商史論叢），連篇累牘，不計其數的例證，就會感到當時的「王」和農事何等密切接近。這就格外帶一種原始味道，而不像後來帝王那樣的高高在上，完全與生產事務絕緣。更可注意的，殷王的農業活動並不限於王畿以內。如卜「商受年」，或「大邑受禾」，自然是在王畿以內。然而還有卜「東土受年」，「南土受年」，「西土受年」，「北土受年」的；也有貞「黍于南」，「黍于北」的；更有指定卜某地受年或耕作於某地者，如「貞蜀受年」，「貞雪受年」，「王往以衆黍于冏」，「貞黍於龐」，「貞呼黍於北」之類。由此可見，殷王對於各地農事之廣泛的干與。倘若當時土地已經分劃，已經有許多封建領主把各處土地私有起來，殷王又何必來多管閒事呢？大概殷代農業，乃是在王和他的官吏督導指揮之下，由「衆人」進行着集體的耕作。不僅在王畿，而且廣泛及於四方各地。至於所謂「衆人」，究竟是些什麼人？是否全係「奴隸」？爲方便起見，我們且把它和周代併案討論罷。

周代奴隸制度的發達，有郭沫若先生從金文中找出的許多例證，似乎無須更舉了。我現在要從晉語中郭偃的一句話講起：

吾觀君夫人也，若爲亂，其猶隸農也，雖獲沃田而勤易之，將不克饗，爲人而已。

這裡所謂「隸農」，不折不扣的是一種農業奴隸。因爲照嚴格的科學的解釋，奴隸所不同於自由人乃至農奴的，就在乎他和工具或牛馬一樣，他的勞動全無報償。工具未嘗不需要修理費，牛馬未嘗不需要養育費，然而那不能算是主人對它們的報償，它們勞動的結果是要全部歸於主人的。自由人不用說，就連農奴也有他一定的報酬，不能說他完全是爲主人而工作。只有奴隸，除下像喂牛馬一樣，主人必需拿出一點養育費以外，他們什麼也得不到。他們是完全歸主人所有的一種工具。這裡所謂「隸農」，辛勤耕作的結果，自已完全「不克饗」，「爲人而已」，分明做一種無報償的勞動，和「奴隸」的科學定義正相結合。這和侯外廬先生在他所著中國古典社會史論中所用「隸農」一名不相干，因爲那是從奴隸到農奴的一種過渡狀態，是侯先生特別使用的譯名，而這卻是見於中國古書原文中地道的奴隸。這樣無報償的奴隸勞動，詩經裡面也有明顯例證。如：

采荼薪樗，食我農夫。（七月）

我取其陳，食我農人。（甫田）

這裡所謂「農夫」或「農人」，不是自營生活的，乃是由旁人用粗惡陳腐的東西養着的。他們辛勤耕作出來的「黍稷稻粱」，雖然「千斯倉，「萬斯箱」，但自己一點也不能享受，而全部都歸於主人。這不分明正是晉語中所說那種「隸農」麼？然而又沒有明白指定說是「隸農」，卻只泛而言之曰「農夫」，曰「農人」，難道說凡「農」皆「隸」，周代的農民全是「奴隸」麼？是的，郭沫若侯外廬兩先生正是如此主張的。他們把當時所謂「農夫」、「農人」、「庶人」、「衆人」，都解釋作「奴隸」。不過這樣一來，「奴隸」的定義就不得不放寬了。有許多地方實在不能適用「奴隸」的嚴格定義。如：

王事靡盬，不能藝黍稷。父母何食？（鴇羽）

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酒誥）

既然「藝黍稷」，那便是所謂「農夫」或「農人」。然而他們的生活資料，乃至其父母的生活資料，卻是由自己耕種出來的黍稷之類，而並不是由主人用粗惡陳腐東西喂養的。這能把他們和上面所謂「隸農」一樣看待麼？又如左傳哀二年：

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

「庶人」和「工商」並提，而與「人臣隸圉」分列。「免」者，免其爲奴隸也。「遂」者，得遂其自由也。可見「庶人」並非「奴隸」，但亦受有某種限制而不得自由。若說是「農奴」倒很像，不過這已經是春秋末年的記載，或許和西周的情形有些不同也很難說。但無論如何，所謂「庶人」或「農夫」，至少不全是嚴格意義的奴隸，卻是很顯然的。

本來在古代社會中，有些奴隸很類似農奴，如斯巴達的黑勞士（ Helos ）即其一例。特別是早熟的東方諸國，由於所謂「貢納制」的關係，被征服的諸部落，除下一小部分被俘爲嚴格意義的奴隸外，其大部氏族成員仍得以半農奴狀態「繼爾居，宅爾宅，田爾田」的存在着。同時征服者氏族中亦起了分化，一部分人因擁有奴隸和貢納品而財富日益增加，權力日益强大，漸漸形成眞正的統治者，

至於普通氏族成員，則地位日益降落，漸漸和被征服的部落大衆混合起來，而形成一個被統治的廣大的「庶民」階層。這種半農奴狀態的「庶民」階層，實際上乃是一種尚未澈底奴化或不成熟的變種的奴隸制度。上引卜辭中所謂「家」或「衆人」，詩經中所謂「農夫」或「農人」，大概都屬於這一類型。正因爲這樣一個「庶民」階層的存在，所以才一方面限制了嚴格奴隸制度的大規模發展，使東方歷史上不能出現一個像希臘羅馬那樣典型的奴隸制社會；另一方面却又促成封建制度的早熟，使東方歷史上拖拉出一個漫長的封建時代。如中國就是照這樣路線發展下來的一個最好例證。中國的「文明」是早熟的。它當氏族制度尙有活力的時候，早就建立起「國家」。可也正因爲這樣，所以當「國家」成立以後很久的時期，氏族紐帶還很強韌地起着作用，限制住奴隸制度的發展。試看上面所述，周代奴隸制度尙停留在一種低級形態下，不要說殷代，更不要說夏代了。

（寄自河南大學）

半亞血族群婚制——媵

丁山

「一，血緣家族，這是家族底第一個階段——恩格斯家族篇說。二，普那路亞家族，是家族組織上頭一個進步。三，對偶家族，在這階段上，一個男性與一個妻生活着；不過，一夫多妻制和偶然的通姦，則成爲男性底權利。」人類婚媾的發展，跟着社會的發展，步驟當然是一致的。蒙昧時代，多數是血緣的族內雜交；到了氏族社會開始，這是普那路亞羣婚；到了父權時代，多數人是對偶家族，只有家長纔能享有一夫多妻的特權。恩氏分析一夫多妻制的來源說，「一夫多妻制，顯然是奴隸制度的結果，而且只有爲佔有特殊地位的個別人物所能辦到。」（詳，張譯本、六四頁）的確，除了「佔有特殊地位的個別人物」，一般從事勞動生產者，誰也無力辦到一夫多妻制。但，中國古代「佔有特殊地位的個別人物」能實行一夫多妻制的發展過程，似乎不盡是由「被擄的年輕婦女都作了勝利者的肉慾底犧牲品，」而其多數是由姊妹羣共同嫁給一個封建主的媵的制度演出來的，如其給這種制度一個名詞，可以强名之曰「半亞血族婚媾」。

媵女制度，大概發生在商代。呂覽本味篇說，「有侁氏以伊尹媵女」；而晚周載記裡往往稱伊尹爲「小臣」或「私臣」，可見私臣即是「媵臣。」——甲骨文曾見「媵臣」（佚存五六一片）名詞，現在自然不能否認商代有「媵女」的制度，媵的制度，尤盛行于周代的封建主階級。如左傳公羊傳所說：

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一聘九女，諸侯不再娶。（莊、十九、公羊）。

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成、八、左傳）。

白虎通嫁娶篇申述以姪娣之義曰，「人君無再娶之義，備姪娣從者，爲其必不相嫉妬，一人有子，三人共之，若己生之也。姪娣年雖少，猶從適人者，明人君無再娶之義也。還，待年于父母之國，未任答君子也」。姊妹姑姪，不論年齡長幼，總是共嫁一夫，不是「普那路亞」婚制的另一方面的遺跡嗎？從西周文獻看：

易、歸妹，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又，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又，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

詩，大雅韓奕，「韓侯娶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一羣姊妹，嫁給一個封建主，這正是由普那路亞婚制發展到一夫多妻制的重要過程，恩氏論家族來源，對於希臘羅馬史料，確能充分掌握，於中國古代婚姻的特有現象，只歸之「奴隸制度的結果」，我們今天正應該運用中國的古代史跡加以補充。

兩周王朝的貴族的家族，是「半普那路亞」婚制，上面推測殷商王朝的婚姻，應如二十年前郭沫若先生古代社會研究、卜辭中之古代社會篇所論定的「普那路亞的亞血族結婚制」，毫無疑義，在此，也不必縷徵了。

一九五一年一月十四日，於山東大學

研究古代史料的一個新途徑

王　燮

新的治學精神是科學的，是要根據可靠資料經過辯証以求得到結論。要探求遠古的社會情形，不能憑古書上的片紙隻言作一個孤証，就可以作出定論。要想清楚地明瞭古代的社會變遷，必須要結合許多實証，推出當時的生產關係方可。在這方面，不只藝術的發展與生產關係的發展是常常不平衡的，許多其他的文化也往往有局部或短時期的畸形出現。所以，只憑一個間接的物証是沒有力量的。

生產力的高下與一個社會的一切都是息息相關的，要瞭解某一個時代的生產情形，必然要研究人在那時如何掌握技術以求生活的美滿。要想瞭解無史時代的生產情形，只根據後人所寫的書是非常不可靠的。最好是找尋直接物証。到甲骨發見後，甲骨文的研究給予我們第一批直接的材料，顯示不少的當時社會情形。其他古器物銘文的研究也有類似的價值。這些材料的整理全是從文字上着眼，但是治歷史的人卻忽略了在學術界另一個角落裡有少數人，在拿着這些甲骨和古器物做着另一套工作，他們的目的雖然並非研究歷史，但是他們的結果能夠給我們很珍貴的史料，同時指示給我們一條最新、最科學的研究上古史的方針。我們可以承襲他們的方法，更深入地研究。

他們不注意那些甲骨文和器物銘文，而去研究那些甲骨，器物的本身。他們用最新的微量化學分析方法，從那些器物上取下很少一部分，加以分析，決定其成分，由所得的結果，可以瞭解當時的製造的方法，原料的來源；在一個社會裡發展一個新的生產技術，必須先要滿足許多生產條件，如此可以間接地推出當時的生產狀況。

例如：有些人曾經作過古銅器的分析，他們分析殷墟出土的一部分銅製矛和戈。發見矛完全是純銅製品，而戈則差不多都是青銅（按青銅係銅和錫的合金）製成，但是其含錫量卻自百分之二以至百分之十五，大有出入。這裡有兩個問題：一個是青銅的性能比銅好的多，為什麼在同一時代有兩種並出？一個是青銅中含錫量有一定的標準方能冶得好的青銅，為什麼錫的含量參差不齊？

我們由這兩個問題可以推出青銅器時代開始的年代是在殷時，因為只有這樣才會瞭解青銅器含錫量之不同是因為當時殷人正在試製青銅，還沒有得到一個最好的含錫量。以往青銅時代的上界是模糊的，郭沫若氏說：「青銅時代……上界却是很渺茫的，中國究竟是在什麼時候由石器時代遞禪到青銅器，在今天誰也無法回答，我們在今天所有的知識，只是知道殷代已經是青銅器時代了。」（見郭著青銅時代，頁二五五），可是化學研究的結果，說明殷時正是銅器時代遞禪到青銅器時代的時候。除此以外，青銅器的發見指示我們當時的人已經知道利用另一個金屬錫，錫的提鍊比銅難（因為初民鍊銅只不過把天然銅鎔鍊而已），所以，他們的其他生產條件，如使用火的方法（當然在那時以前，已知道如何用高溫製造陶器，但是冶金的溫度是要更高的），採礦技術都更進一步了。

朝鮮樂浪等地出土的漢三角鏃，也曾經經人用化學方法分析，其外殼為青銅，內心為鐵；這一點說明了漢時青銅器的地位已經低落了，但是仍然用它裝飾器物，和現在我們鍍金一樣。取出鐵心，用金相學方法研究，發見了當時鍊鐵的方法：他們用鐵礦（氧化鐵）或砂鐵作原料，在炭火中煆燒，同時通入空氣，這樣得到海綿狀的還原鐵，再加以煆冶成煆鐵。這一套比較進步的冶金方法，說明當時的人已經知道如何作很好的炭，已經知道用炭來還原金屬的氧化物成金屬，已經有更好的生產工具（如風箱，高溫爐）。

甲骨文中所填的顏料，也有研究的價值。以往以為紅色顏料是銀朱（即硫化汞），黑色顏料是動物血的炭。所以推測炭是由血液製成，因為我們不能決定殷時是否可以製木炭，所以可能僅僅把血填進去，年代久遠以後變成功炭，也可能在烤動物時的半炭化的血取來填進去。但是用化學分析証明紅色顏料確是銀朱，但是黑色顏料却不是血炭而是普通的炭。這說明殷人已經可以製炭，這一個生產技術上的勝利為鐵器時代的來臨鋪好道路，後人方知用炭來冶鐵。

這些材料固然是顯着瑣碎而價值亦不甚大，但是在解釋古代社會發展上，也是有力的佐證。

（於燕京大學）

新編「哲學史」

第五章 巴黎公社後（一八七一——一八九五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對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發展（二續）

蘇聯科學院哲學研究院
王子野譯

四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科學的美學基礎底創立

馬克思主義底產生在美學學說底歷史上，也引起了根本的改革。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所建立的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底基礎上第一次奠定了關於美術發展底實質和一般規律底科學基礎，並對資產階級的哲學家和美學家底唯心論的美學理論給以批判。馬克思主義的美學科學和他們以前的一切美學理論，包括進步的美學理論在內，有原則上的區別。

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科學地解決了關於美術在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問題。揭穿了把藝術創作當作離開社會歷史條件而獨立的內在的過程底唯心論的觀點，他們指出美術是反映社會存在的社會意識底特殊的（形象的）形式，歸根結蒂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這個反映不帶直接的性質：像政治等等的這種上層建築對它要發生影響。社會存在變化了，美術底內容和形式，人們底審美的標準、趣味和理想也將隨之而改變。把拉非爾同列奧納圖・達・文西和蒂蕭加以比較，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第一個人底作品依賴於羅馬當時的繁榮，是在佛洛連斯的影響之下產生出來的，列奧納圖底作品依賴於佛洛連斯底環境，而蒂蕭則依賴於威尼斯底完全另外的發展。』㊀

馬克思主義底奠基者第一次科學地解決了美術和美學情感底產生問題。在馬克思以前，美術和美學情感是被形而上學地視作某種永久如此的東西。馬克思和恩格斯科學地証明說，美術是在人們底勞動活動發展底歷史過程中產生出來和發展起來的。在『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家族、私有財產和國家底起源』以及其它著作中恩格斯指出說，只是由於勞動，『人的手才達到這樣高度的完善，在這個基礎上它才能似乎憑着魔力地產生拉菲爾底繪畫，索瓦爾生底雕刻以及柏加尼尼底音樂。』㊁在勞動過程中人底美學底能力產生出來和逐漸發展起來，在勞動中人底視覺和聽覺日益完善，因此他獲得了理解現實世界和美術作品底美的能力。關於美術和美學情感產生底馬克思和恩格斯底唯物論學說給予一切唯心論的理論以粉碎的打擊。這些理論把美術看作絕對精神底顯現底神秘的實質和把人們底美感看作特別的、神的賜物，把人們底美學看作是天生的愛美底本能等等。

馬克思和恩格斯揭露了美術在剝削的社會裡底發展規律。他們指出說，在敵對的社會經濟形態發展底特定時期，靠奴役勞動者而達到的生產力底高漲並不等於美術也隨同高漲。

在社會主義時代以前，美術整個的發展水平和個別的它的形式底發展水平，如馬克思所指出，並不與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相適合，而且往往甚至『既不與社會底一般發展相適合，因此也不與後者的物質基礎底發展相適合，而物質基礎構成了社會組織底骨架。』㊂馬克思指出說，古代美術可以作爲証明這種不適合的例子，古代美術底高度水平同古代的生產力底發展水平是不相適合的，莎士比亞的悲劇也可作爲例証。

在生產手段私有佔統治的條件之下，美術發展底階級對立的性質特別地是由壓迫和奴役人底勞動社會分工底形式來決定的，其結果就從社會中產生出一批藝術勞動底代表者，以滿足統治階級底需要，如恩格斯指出說，『當眞正勞動的人口這樣耗費自己的必要的勞動時，他們便沒有時間來從事有一般意義的社會事業——來從事管理工作、國家事務、來從事審判，從事美術、科學等等——這時不可避免地便出現了由眞正的勞動中解放出來的特殊階級。這個階級管理社會事務，但是同時任何時候也不放過機會把勞動底負荷越來越重地加到勞動羣衆底身上去，以滿足自己的利益。』㊃

如馬克思所說，只有在社會主義底條件之下，那時候階級的對抗消滅了，而工人自己將成爲生產力底主人，到那時候才能消滅使藝術勞動成爲少數人底特權事業底勞動分工。藝術創造變成爲廣大的自由的人民羣衆底財產。

馬克思主義奠基者底預見在蘇聯已完全實現了。在這國家裡人民的才能和社會主義內容和民族形式底現實主義的美術已達到高度的繁榮。

馬克思和恩格斯揭露了資本主義制度對文化和美術底敵對性。

㊀ 馬恩全集第四卷第三八〇頁

㊁ 恩格斯：『自然辯証法』第一三三頁。

㊂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二二四頁。

㊃ 恩格斯：『反杜林論』第一七〇頁。

『……資本主義的生產，——馬克思說，——對某些精神生產底部門，如美術和詩，是敵對的。』㊀這件事底原因之一，馬克思主義奠基者認爲是在於那刺激資產階級的首先只是人們底精神活動底某些方面，就是那能夠帶給他們利潤，作爲利潤泉源底方面。『資產階級取消了從來認爲可敬的、被誠惶誠恐地崇拜着的一切行爲底神聖的威嚴。它把醫生、律師、牧師、詩人、科學家變成自己出錢僱傭的工人。』㊁詩人或藝術家底勞動不給資本家帶來利潤，它被資產階級視爲非生產的勞動。馬克思這樣概括了資產階級對於藝術家、詩人和藝人底勞動底觀點：『靠自己的冒險去唱歌底歌手是非生產的工人。然而同是這個歌手受僱於劇院老闆，老闆强迫他爲賺錢而歌唱，這就是生產的工人，因爲他生產資本。』㊂藝術活動服從於資本底利益，其結果是美術底庸俗化，損毀藝術家底思想，培養低級趣味。

資本主義國家藝術家底創作是處在階級局限的、資產階級底自私自利動機底困境裡，它在統治階級底手裡是一種思想武器，統治階級利用美術作爲宣傳資產階級底政策和道德底工具。資產階級社會底思想的和道德的惡習和資產階級底散播人間嫉忌的意識形態也對藝術家發生壞影響，用貪慾、利己主義、功利主義底毒質來害他們。在資本主義國家佔統治的收買、欺詐、僞善、對資本底阿諛，這一些氣氛都直接反映在資產階級美術底衰頹上面，特別地是在帝國主義時代，社會底進一步的發展更表現出這種情況。

當從階級和階級鬥爭學說底見解來考察美術時，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說，在階級社會裡不能有超階級的美術。在每一個對抗的社會形態裡，統治階級底美術乃是統治的美術，它與那些反映被壓迫、被剝削羣衆底狀況、利益、希望和理想底藝術創作是對立的。

當揭露資產階級的關於美術『純粹』和『不問利害是非』理論時，僞善地掩蓋着資本主義社會裡美術對錢袋底依賴，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說，思想性，『傾向性』是每一種進步的藝術作品底不能分離的特點，不僅不降低它的藝術水平，而且相反地地規定它的高度的美學價值。思想性組成藝術家創作成就底無盡的泉源。恩格斯說：『悲劇之父愛斯基爾和喜劇之父阿里斯多芬是兩個非常明顯的有傾向的詩人，但丁和塞萬提斯也是如此，席勒底『狡猾和愛』底價值就在於這是第一部德國的政治上有傾向的戲劇。現代俄羅斯的和挪威的寫過優秀小說的作家全都是有傾向的。』㊃

照恩格斯底見解，無產階級美術底傾向應當是在於如何才能眞實地描寫資本主義社會底現實關係，澄清關於這種關係底性質底誤解，動搖資產階級世界底樂觀主義，引起對資產階級秩序底基礎底不變性底懷疑。恩格斯說，藝術作品底傾向不應當從外面强加上去，而應當從它的內容裡引伸出來，無須加上特別的聲明。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號召的在藝術作品裡施行的無產階級美術底傾向是現實主義底特別形式底傾向，是同無產階級反對資本主義底鬥爭分不開的。

在爲美術中的革命傾向而鬥爭時，馬克思和恩格斯揭露了與無產階級敵對的資產階級的理論『純粹的美術』和『爲美術而美術』。他們還在編『萊茵新聞』時期就開始進行這個爲美術底思想性底鬥爭，而且畢生都進行着這個鬥爭。在這個鬥爭底過程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己周圍團結了一批先進的、爲工人階級底利益而鬥爭的作家和詩人（海爾威格，威葉爾特等等）。巴黎公社底卓越的詩人也在馬克思主義奠基者關於先進美術革命傾向性底學說影響之下。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偉大的德國詩人海湼也發生了不少的影響。

無產階級美術高度思想性底原則在新的歷史條件之下爲列寧和斯大林所豐富了和發展了。

現實主義的美術底傾向性、高度思想性被馬克思和恩格斯當作是不可分離的它的特徵，沒有這個，美術便不能成爲藝術上完美無缺的東西，同時馬克思和恩格斯不只一次地告戒當時的作家不要在他們的作品中用表面的態度去分析特定的傾向。 他們要求藝術作品當把思想的深度、自覺的歷史內容同莎士比亞式的風彩和行動底豐富性完全結合起來。他們堅決反對在藝術作品中底赤裸裸的傾向，不是包裹在活的人物底血和肉中間，反對把這些人物轉變成時代精神底簡單的傳聲筒。從這個觀點來看，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拉薩爾底悲劇『法朗玆・芬・西金根』所作的批評特別有趣味。

恩格斯指出雖然在拉薩爾底悲劇中主要的人物是歷史上存在的特定的階級和派別，然而這些人物只是思想的公佈者，而不是活生生的、具體的形象，因爲作者不善於指出他們的行爲底眞正動機，揭發他們的特質。用恩格斯底話來說，在描寫他們時缺乏『莎士比亞式的』現實主義的因素 。這種情況之所以發生，不只由於拉薩爾作爲戲劇家底缺點，而且還由於他的不正確的歷史的和政治的見解，基本上在於他不懂得人民羣衆在歷史上的作用。

在對拉薩爾的批評中，恩格斯指出說，在一切眞正的藝術作品中，思想性和現實主義應當密切地同人民性連結在一起。人民是在歷史發展中的主要的活動的力量，因此在揭露整個歷史時代意義底作品中，也應當是主要的活動的力量。體現人民性原則底藝術作品，具有最高的美學的和歷史的價值。

在詳細研究先進美術發展基礎上解決現實主義問題時，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爲現實主義是這樣的一種藝術創作底方法，它使作家有最大的可能正確地和完滿地反映社會生活。恩格斯指出眞正的『現實主義除了細節底眞實性之外，還要求復製典型環境中底典型性格底眞實性。』㊄忘記現實主義美術底這個重要原則，便會走到現實底不正確的反映。恩格斯舉了先進的女作家哈克納斯底某些作品來作爲這種不正確反映生活的例子。在她的小說『

㊀ 馬克思：『剩餘價值學說史』第一卷第二三九頁。

㊁ 馬克思：『共產黨宣言』。

㊂ 馬克思：『剩餘價值學說史』第一卷第二六〇頁。

㊃ 馬恩文庫第一卷第三一八頁。

㊄ 馬恩通信選集第四〇五頁。

城市之女』中，哈克納斯把工人階級描寫成被動的、受苦受難的，但決不是戰鬥的羣衆。無產階級底這種描寫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出十九世紀初底實際情況，可是在哈克納斯所寫作的七十年代，它實質上已成爲反現實主義的了。

現實主義的藝術作品，如恩格斯所指出，必須包括工人階級底革命鬥爭底描寫。恩格斯對於現實主義的這個觀點是科學共產主義奠基者世界觀底無產階級革命性底表現，是他們的美學觀點面向共產主義的未來底表現。

恩格斯號召先進的作家描寫無產階級反對資本主義的革命鬥爭，這在俄國高爾基底作品中達到最完滿的藝術的表現。高爾基是新型的現實主義——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底創造者。

澈底地把歷史唯物論底原則擴展到美術底領域，馬克思主義底奠基者第一次奠定了先進的、眞正科學的藝術批評底穩固的基礎，並且作出了採用這些批評原則來分析某些作家和藝術家底作品底光輝的範例。

當從工人階級底立場來考察以前的個別卓越的作家底作品時，馬克思和恩格斯對他們的創作作了眞正科學的分析，揭發了它的內部的矛盾，這是受他們的生活和活動底具體的歷史的條件底矛盾所制約着的。例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偉大的德國詩人歌德底創作中，就揭出了這一類的矛盾。

歌德，如恩格斯所指出，對待當時的德國社會底態度是兩屬性的，這從他的作品中有蛛絲馬跡可尋。從一方面，這個社會以自己的局限性、愚鈍性來和他對立，因此歌德想逃避它，從另一方面，相反地他又力圖同它妥協并保衞着它的基礎，不讓它被日益增漲着的革命運動動搖了。恩格斯說，在歌德身上『經常發生着天才的詩人同福蘭克福的貴族或威瑪的秘密顧問之間的鬥爭。作爲一個天才的詩人，他周圍底悲慘暗示他逃避現實，作爲福蘭克福的貴族或威瑪的秘密顧問，他又看到自己必須同現實妥協并依附於它。』㊀歌德，如恩格斯所說，一下子偉大得了不得，一下子十分渺小，一下子是天才，一下子又是屑人。歌德沒有力量戰勝德國的悲慘；相反地，悲慘戰勝了他。

恩格斯對歌德作品底這個分析是用辯証唯物論來闡明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德國文學底複雜的美術現象底本質底模範。恩格斯用這個分析揭露了研究文學的唯心論的態度底破產和悲局，唯心論者忽視了必須研究這個問題，就是某一作家、詩人、畫家、音樂家或藝術家底創作底特性是由產生他們的社會存在所決定的。

恩格斯對十九世紀法國小說家巴爾扎克作品底分析可以作爲對偉大的文學美術現象底眞正科學的考察和估價底另一例証。

『…巴爾扎克——恩格斯說，——按其政治觀點是保皇主義者。他的偉大的著作是那個上層社會底不能挽救的瓦解底無盡的哀歌；他的同情是寄予命定要死亡的那個階級。然而雖是這樣，他的諷刺、他的反詰任何時候也沒有比在他强迫他所最同情的那些人——貴族階級的老爺和太太行動起來的時候更尖銳、更痛苦。她常常用着毫不掩飾的喜悅所說到的唯一的一些人，乃是他的最鮮明的政治上的敵人…』㊁

揭發了這個根源，就是爲什麼巴爾扎克違反自己的保皇主義和對封建領主底同情，不得不在自己的著作中從否定方面來寫他們，恩格斯找出這個根源是在於巴爾扎克底現實主義，在於他的要求眞實反映現實的方法。

巴爾扎克底現實主義作品底全部內容是同他的保皇主義的、專制主義的世界觀相矛盾的。不是巴爾扎克底保皇主義底世界觀，而是他的現實主義的方法引導他創造出第一流的藝術作品。

因爲在世界的文學和美術底歷史領域內有廣博的知識，馬克思和恩格斯說出了許多深刻的思想，對各種不同的詩人和藝術家作出了許多非常正確的分析。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底著作中我們經常可以碰到對過去的這些巨師如荷馬、但丁、海涅、拉非爾、連勃朗特等等底評價。馬克思和恩格斯特別高估愛斯基爾、莎士比亞、狄德羅和歌德。他們對偉大的俄國文學興趣極濃，『葉古列夫出征記』、普希金、薩爾蒂科夫－謝德林、車爾尼雪夫斯基以及其他許多偉大的俄國作家底作品都被他們讀了許多遍，他們並且對這些作家作了很高的評價，强調俄國文學、俄國的先進的社會思想底卓越的作用。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反動的小說家，擬古主義和自然主義底代表者底否定的態度是由他們爲藝術的眞實，爲美術中的現實主義而作的鬥爭所決定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自由的美術在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條件下底繁榮這個英明的預見已在蘇聯實現了，在這裡，新的、眞正人民的和高度思想性的美術——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底美術已以空前的速度發展起來了。

這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美術問題底基本思想，它證明只有把辯証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擴展到人類藝術創作發展歷史過程底理解上才能引導去創造眞正科學的美學，這種美學對於美術發展和人們底美學教育有着很大的意義。

列寧和斯大林把馬克思和恩格斯底美學理論提到新的、更高的階段，他們從理論上總結了藝術創作底新的經驗，它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之下發展起來的，這新的歷史條件又是同無產階級底解放鬥爭底進一步的發展和蘇聯底社會主義建設密切不可分的。

（本節完，全文待續。）

㊀馬恩全集第五卷第一四二頁。
㊁馬恩通信選集第四〇六頁

學習毛主席的「實踐論」

——中國新哲學研究會座談會記錄——

時間：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上午九時
地點：中國社會科學各研究會聯合辦事處
主席：艾思奇
紀錄：李方濟　楊祖陶　楊憲邦　晏成書

艾思奇： 今天我們討論毛主席的「實踐論」。關於「實踐論」，馮友蘭先生曾經寫了一篇文章，這篇文章的初稿各位已經拿到了，現在就請馮先生就這篇文章先作報告。

馮友蘭：（報告內容請參看本刊三卷六期）

艾思奇： 馮先生已經報告完了，現在請大家討論。無論是這篇文章的整個內容，或者是某一段的內容，甚或是在一些字句方面，大家都可以發表意見。這篇文章曾經清華大學哲學系集體討論。大家一時如果提不出什麼意見，可否請清華哲學系的先生們談一談！

金岳霖： 在我們當時討論時，我有一點感想，現在在馮先生這篇文章裡沒有提到。我感到：解放後兩年來我們每個人都得到了社會的實踐，都學習了馬列主義、社會發展史、新民主主義革命史，這些都幫助我們了解「實踐論」。假如我們沒有這兩年的實踐，是不可能了解「實踐論」的。五年前，如果我讀到「實踐論」，一定會想出一些無關緊要的話來批判。這在當時會是很自然的。因爲那時我們不能從全面的觀點和立場來看問題，自然不會了解「實踐論」。尤其是我們從前有一種抽象地看問題的習慣，會把「知」抽象化，這樣，就會產生許多不相干的問題。有了這兩年的實踐，我們對事物的看法改變了，對「知」也有了新的認識。個人感覺到過去所謂的「知」與今日所了解的「知」，有很大的不同。記得毛主席在東北時有一篇文章，講青年運動。其中說，過去孔夫子辦學堂，學生不少，但是他們就是不愛搞生產，種田種菜都不成。知識主要是從生產實踐得來的，從前士大夫的知識則和這方面脫了節，即使他們講生產，也是從旁講的。就顏習齋來看，我猜想他恐怕也是從旁來了解勞動。我個人也愛種菜，但是確實不能和種菜爲生的人相比，因爲我並不靠種菜爲生。種西紅柿種得好，雖很好，種不好，對我的生活也沒有影響。由不同的生活實踐來講「知」，意味不會相同，所以過去的「知」與現在的「知」，是根本不同的。

艾思奇： 金先生的話很好，希望以後精神好，能寫成文章。請大家隨便發表自己的感想。

任　華： 我們清華同人，對這篇文章已經討論過好幾次，意思大致是一樣，我們這方面少說點話，希望其他的先生多提意見。

傅　銅： 馮先生羅列了過去許多關於知行的學說，這些學說似乎互相矛盾，實則不然。如何了解知行問題，我以爲，金先生的話是個很好的線索。中外哲學史上有許多爭論，只是文字上的爭執。「知」字是個含義很多的字，若對「知」字的不同意義加以分析，表面的矛盾可以消除。中國哲學史上這類問題很多，性善性惡說也是一例。如果分析一下，並且把「性」的意義確定，這兩種學說是並不矛盾，而可以並行不悖的。

知行合一的學說，過去在日本也有一些人談到。其中比較有名的有兩個：高瀨武次郎和遠藤隆吉。關於程伊川與王陽明，他們兩人曾發生爭論。遠藤隆吉認爲王陽明的思想是從程伊川來的，因爲伊川分別「知」爲「深知」，「淺知」，陽明也認爲知有種類的不同；但高瀨武次郎說二人完全不同。他們的爭論完全是因爲名詞的曖昧，沒有加以分析。

知行合一的「合一」也有種類的不同。王陽明傳習錄中所說的有時是同時合一，有時是異時合一。若把「知」的意義解決，這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至於「行」字方面，歧義比較少。總之，要對「知」字加以分析，才能了解知行問題。

沈有鼎： 馮先生文章中提到大學中庸，不知大中學庸算不算是討論了知行問題？我認爲只要是提出了意見，就可算是正式討論了。

馮友蘭： 那是關於知行的見解，而不是討論。

沈有鼎： 中國哲學史上，普通的見解便等於正式的討論。二者沒有像西洋哲學史上那樣清晰的劃分。

朱光潛： 馮先生文章中說，關於知行問題，「孔子的看法不很清楚」。但是在論語裡孔子是很注重行的。

沈有鼎： 顏習齋批評宋儒時，就曾說孔子注重行。

朱光潛： 不但「知」的意義很多，「行」的意義也很多。從前注重的是個人的行；今日，按

兩毛主席的文章，乃是着重在社會的實踐。因此，講知行的關係，從前與現在也不同。

樊弘： 宋儒所謂的「知」與毛主席所說的「理論」，大家都認為不同。個人感覺這不同可以分為三點來說：一、毛主席的「理論」是以實踐為起點，用外觀的方法得來；而宋儒的知是從內省得來，所謂「內省」，就是大學中庸裡講的那一套正心誠意的工夫。這句話並不是說，毛主席的「理論」不包含「內省」，宋儒一點也不講究外觀，我只是從基本上來說，他們的着重點是有所不同。二、宋儒的「知」不受外界事物變化的影響，一經得到，便含有普遍性和必然性，所謂放之四海而皆準，這「知」在時空上是不變的。而毛主席則認為「理論」是隨着客觀的變化而變化的。三、宋儒的「知」不能用實踐、外觀方法去考驗其眞偽。毛主席所說的「理論」則和這完全相反，是通過了實踐的檢驗的。

因為這種方法上的不同，實質上也就有了差別：一、宋儒既認為「知」是用內省方法得來的，注重心中的良知良能，因此他們是反民主的，甚至反對舊民主。覺得我是眞理的發現者，其他的人都是蒙昧無知，因而不能根據多數來反對少數。在政治上，他們主張好人政治，從個人出發，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二、宋儒是維持現狀的，保守的。因為他們認為外界雖有變遷，但「知」是不變的。既不承認「知」是反映外界的，就必然反對變革，維持現狀。我有一位講宋學的先生，他說，皇帝與大總統沒有什麼區別，皇帝就是兩個字的大總統，大總統就是三個字的皇帝。三、宋儒既認為「知」不可以用外觀的方法來否定，因此儘管講的那一套忠孝節義會在實際上發生悲慘的效果，還要堅持原則，所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明知不對，依舊堅持錯誤。由前兩年知識分子對國民黨的態度，我們也可以看出這種思想來。從前大家都知道國民黨很壞，但覺得蔣介石提倡新生活運動，還是不錯，雖然其行為與其所講的忠孝仁愛相去十萬八千里，大家還是不能以其行為來否定大家對他的認識。總之，宋儒的良知與科學的「知」不同，宋儒的「知」是永恒不變的，辯證唯物論的「知」是變化發展的；宋儒的「知」是不能用外觀方法檢驗的，科學的「知」是可以檢驗的；宋儒的「知」不能與「行」合一，辯証唯物論的「知」則能與「行」合一。

個人不懂哲學，以上所說，只是一點感想。至於理論與實踐那一個比較重要，顯然是實踐比理論重要。不過，關於這一點，我以前是模糊的，直到讀了「實踐論」以後，這個觀念才確定下來。

張岱年： 中國哲學中所講的知行與馬列主義的知行，區別很簡單。中國以往講「知」偏重於內省，道德的知識，人與人的關係；雖也講外察，也講對客觀事物的認識，但講的不多。至於馬列主義的「知」，則是偏重於客觀事物的知。又，中國過去的「行」，偏重於改革自己。馬列主義的「行」則偏重在改造自然，在改造自然中來改造自己。

對馮先生的文章，我有幾點補充：撇開中國哲學知行問題，從知行問題本身來談，我認為毛主席規定了認識與實踐的四個原則：一、實踐是認識的基礎；二、實踐是認識的標準；三、實踐與認識互相推進；四、理論服務於實踐。

至於馮先生文章中已經談到的，有兩點，我認為很重要。第一點是毛主席的「實踐論」和斯大林的著作有同等重要的價值。其次，毛主席的思想不只是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的結合，也是馬列主義與中國哲學優良傳統的結合。

任華： 馮先生的文章，照我的了解，不是說孔子，王陽明對知行的看法究竟如何，這是哲學史上的問題，可能引起種種爭論。馮先生的意思，乃是在指出中國哲學大體的趨勢：一、中國過去討論知行是從道德出發，然後推到一般的知行。二、中國過去討論知行用的方法是形而上學的方法，把知行分離，並且對立起來，因而引起許多問題，不能得到正確的解決。三、中國過去的思想把實踐看作是個人的事情，沒有看作是社會的實踐。四、以往的中國哲學家，由於處在長期停滯的封建社會中，不能從發展方面來看問題。

王維城： 毛主席把知和行統一起來，這種知與行的統一觀和知行合一的思想是不相同的。「知行合一」把知行等同起來，陽明說過，知行只是兩個字，說的是一件事。「知行統一」則不然，統一不是等同，而是有系統的聯繫。知行合一的說法決不能發展成為知行統一的說法。

王陽明講致良知，注重理性認識，他的思想是從儒家思想發展來的，也可以說是總結了過去儒家的思想。在他看來，達到究竟眞理的知，是超乎感覺經驗的，這種「知」，不是從學習得到的，但是更接近最高的眞理。他的致良知，就是發揮這種最高的知識。這種學說，把知限制於一種個人的境界，限制於改革主觀的存在，求與自然融合無間，而不求改造自然，改革客觀的存在。過去的學習，凡是想追求絕對眞理的，都是從唯心論出發。因此，他們把知行問題講成為一個道德修養的境界問題，而不能發展成為一個科學的認識論。

「知行統一」說吸收了過去知行問題的「合理核心」，總結了並解決了這個傳統問題。

容肇祖： 毛主席的文章，主要可說是對知識份子說的。最重要的是提供了兩點：就是階級鬥爭與理論的實踐性。過去講知行問題，都是理論與實踐不結合。王陽明雖提倡知行合一，但他是主觀唯心論者，所以不能眞正地發揮，而有一定的限度。顏習齋以為一般人心中省，口中說，紙上寫，不從身上做，都是無用的。他把「習恭」當作實行，也有唯心主義的限制。毛主席從辯証唯物論解決中國舊的知行問題，「實踐論」發揮的是很完滿的。其次，不從階級鬥爭，也不能解決社會實踐的問題。孫中山的行易知難說，要人民盲目地跟着他跑。他沒有了解人民羣衆的創造性、進步性，就是由於他對階級鬥爭沒有認識。只有毛主席虛心作人民的小學生，綜合無產階級的革命實踐經驗，所以能夠從馬列主義的理論結合中國的革命實踐而成為毛澤東思想。階級鬥爭的認識與實踐是毛澤東思想的主要來源。

王維誠： 對於剛才我所說的，還有一點補充。儒家之有所謂境界問題，是由於他們沒有想到眞理是反映客觀存在的，他們把眞理當作了主觀的產物。

邰爽秋： 馮先生對於王船山的估價是否大高了一點？船山誠然是中國傳統的優良代表。毛主席也可能受船山學說的影響。但是我們不能忽略了二十年來毛主席革命實踐的經驗。毛主席的思想乃是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產物。

對於討論的方式，我也有一個意見，我覺得我們應該先好好學習「實踐論」，然後再來批判中國過去的思想。

沈有鼎： 中國舊哲學中所謂的「行」，有三個特點：一、主要是道德的實踐。二、社會實踐限於道德實踐，脫離了自然界。和生產活動沒有直接的聯繫，其原因在自然科學不發達。西洋過去講實踐也是道德的實踐，是法律方面的事情，是講話，不是動手。三、中國以往講實踐，沒有羣衆性，限於個人與個人間的關係。這三點也就是中國哲學的局限性。

朱啓賢： 我有兩個問題：一、「實踐論」與斯大林的著作有同等價值，這是沒有疑問的。不過，眞理報提到「實踐論」發展了馬列主義，今天的討論對這一點談得還不多，個人很想以這點向各位求敎，究竟毛主席在那些方面發展了馬列主義？二、馮先生文章中提到知行難易問題，說難易是主觀的範疇，在客觀地分析事物時，沒有這個問題。這一點也許有問題。個人感覺，過去談知行問題，把層次不同的知和種類不同的行混淆起來，所以談得很亂，沒有結果，而不是因爲是主觀範疇的緣故。因爲這個問題不是基本問題，所以在毛主席的文章中沒有提到。

艾思奇： 今天發言很踴躍，是一個好現象，表示大家都很重視這個問題。但因時間關係，討論到此爲止，大家言有未盡的，將來還有機會發表，現在先請馮先生講話，然後我再簡單說幾句。

馮友蘭： 各位先生提的意見都很寶貴，非常感謝！大家都認爲「實踐論」所講的知行與過去所講的知行不同，這是對的。因爲今天的立場，觀點，方法和過去的都有所不同。其次，有位先生說，不能肯定毛主席很受王船山的影響，這也是完全正確的。毛主席的思想主要是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的結合。至於朱先生的兩個問題，第一個是發展的意義，個人的想法，與中國革命結合就是發展。說到難易，我們說這是主觀的範疇，因爲他們沒有客觀的標準。我們的稿子需要修改的地方很多，各位還有意見，請以書面提出，寄到清華。

艾思奇： 我還想簡單地提一兩點意見。毛主席的「實踐論」是中國革命鬥爭的思想武器。毛主席寫這篇文章是爲了要從哲學上，認識論上肅清革命運動中的不正確的思想。這篇文章主要是用馬列主義的方法總結中國革命的經驗，說明認識的正確規律，說明正確認識與錯誤認識的基礎是什麼。這是總結了革命經驗，反過來又爲革命服務的思想，我們學習這篇文章，不能忘記這一點。學習了這篇文章以後，可以拿它作爲武器，批判歷史上的錯誤思想。批判過去乃是爲了現在。因爲現在思想上的一些錯誤，是受過去思想的影響。不知道馮先生的文章可否聯繫過去知行學說在今日知識界的影響來談一談？這樣，可以批判了過去，也接觸了現在。研究馬列主義的秘訣就是爲了現在。

辯證唯物論的對象可以擴大地講。馮先生的文章可能給人一個印象，以爲哲學的對象就是認識論和邏輯。不是的，馬列主義是要研究世界總的規律，認識論和邏輯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這二者是舊哲學留給新哲學唯一有價值的東西，其他的東西，如宇宙觀，則沒有價值，可以拋棄。

說辯證唯物論是研究自然的，歷史唯物論是研究社會的，「實踐論」是研究認識的，這種分法不太適當。辯證唯物論是研究世界總的規律，包括自然，社會，認識在內。歷史唯物論是辯證唯物論具體地應用來研究人類社會歷史。「實踐論」也是總規律在認識上的具體運用。

今天大家都提出了關於知行的了解，過去和今日的不同。我認爲關於「知」的了解不同只是發展上的不同，不是根本有什麽區別。例如，過去對感性認識與理性認識的分別很模糊，今天毛主席則明確地說明了這兩者的區別和聯繫。但是，舊哲學的行和新哲學的行却有根本區別。從前講實踐和現在講實踐的區別，主要在要不要人民。辯證唯物論之不同於以往的哲學，在於它是人民的哲學，它以廣大勞動人民的實踐作基礎，因而能全面地處理問題，把知行問題條理化。舊哲學在狹小的基礎上，眼光狹小，因此不能科學地解決知行問題。實踐沒有純粹個人的，都是社會的，它與廣大人民息息相關。自覺地認識這點，才有可能了解馬列主義；否則，永遠也不會了解。

此外，對於馮先生的文章，在文字上，我還有一點意見。馮先生說，「實踐論」討論知行問題「不是從道德活動出發」，這句話容易引起誤會，以爲我們不講道德。

還有，說「革命的理論跟着帝國主義的侵略一同來到中國」，這句話說得太簡單，恐怕也易引起曲解。過去托派的理論就認爲帝國主義不侵略中國，中國就不會進步。

「顏習齋，王船山與勞動人民接近」這個判斷也可以斟酌。

邰爽秋： 毛主席到底對馬列主義有何發展，這問題很重要。

艾思奇： 這問題以後再討論。簡單地說，馬列主義所謂發展與舊時的了解不同。馬列主義所謂發展，不完全是拿出一些嶄新的東西來。把舊的向前推進一步，也就是發展。例如相對眞理與絕對眞理，馬恩列斯雖也談過，但只是說了些大的原則。毛主席從相對眞理絕對眞理與主觀反映客觀的問題聯繫在一起講，明確地說了出來，這就是發展了馬列主義。毛主席對於這一點的分析規定了革命工作者永遠不能滿足自己的知識，永遠要隨着客觀的發展變化而發展變化。每個人都能夠這樣，就會減少革命工作的錯誤，就會對革命工作的開展有很大的幫助。

至於難易問題乃是隨條件而變的。舊哲學把二者形而上地對立起來，沒有想到難可以變爲易，易可以變爲難。「實踐論」就不提這樣的死問題，來自己限制自己。馬列主義永遠在設法克服困難。

時間已經不早，我們今天的討論就到這裡，現在散會。

學術問答

〔問〕 關於經學古文派與今文派的鬪爭，好像是一個學術鬪爭性質，爲什麼能與政治發生聯繫？古文派的反動性何在？今文派的進步性又何在？如康有爲又如何利用今文派進行改良主義的政治鬪爭？ （長春 丁 文提）

〔答〕 學術是有階級性的。學術和政治本來有聯繫；沒有政治聯繫，何來學術鬥爭？

「經學」這個名稱起自漢代。所謂經，專指儒家的經典說的。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儒家的經典就成爲封建時代統治階級的理論和實踐的準繩。所謂「以禹貢治河，以春秋斷獄，以三百篇當諫書……」就是。西漢特設五經博士，置博士有弟子若干人。所謂博士，好像現在的大學教授；博士弟子好像現在的大學生。當時的經都由專家傳授，各有「家法」「師法」。例如詩有齊詩、魯詩，論語有齊論、魯論、家派不同，傳授的方法不同，經義的解釋也不同。所以一種經不只設一個博士，西漢有十四博士。當時的本子都是用隸書寫的。那時候通行隸書，跟現在的楷書一樣，大家都認識。後來發見了一些藏在壁裡的書，是用近乎篆書之類的文字寫的。這些文字漢朝已不通行，專家才能辨認，所以把它叫做古文。古文本子中間有左氏所傳的春秋，有毛公所傳的詩，有逸禮（今已失傳），有古文尙書（今已失傳），都沒有立於學官。所謂沒有立於學官，用現在的情形來比，就是沒有在大學裡規定這門功課。因此，這些古文本子沒有取得「國定教本」的資格。到了西漢末年，從劉歆的力爭（他的有名的移讓太常博士書，就是爲爭取把古文經傳立於學官而寫的），才把春秋左氏傳、毛詩、逸禮等立於學官（周官經六篇亦置博士。周官經就是現存的周禮）。因爲新立的幾家都是古文，就把以前十四博士所傳授的叫做今文，從此經學就有今文和古文兩派。這兩派當初並不怎麼樣壁壘森嚴，所以後漢的鄭玄徧注羣經，採取今文派的說法，也採取古文派的說法。後來研究左傳和毛詩的人漸漸多起來了，西漢十四博士的家法、師法又多失傳了（只剩一部公羊傳算是全書，其餘多成爲斷片殘簡了），古文派就此得勢起來。

劉歆爲什麼用全力來爭取把那些古文經典立於學官呢？那是爲了要達成他的政治目的。那時候因爲土地集中，農民破產，農民暴動到處起來，劉漢的政權搖搖欲墮。一般人都相信劉家的氣運已盡（這是根據五德終始之說來的，這兒不詳細解釋），劉歆想幫助王莽取得政權，實行改良政策，以挽救地主階級政權的崩潰，就憑藉這些古文經典來作爲王莽掌握政權和實行改良政策的理論根據。所以王莽的一切改革，都是在「復古」這個口號下來進行的。例如他要實行王田制，就說這是恢復古代的井田制；他的設官分職，大體都是根據周禮的。

上面說明了經學上今文派和古文派鬥爭的由來和爲什麼與政治發生聯繫的道理。現在我們來談談康有爲如何利用今文派進行改良主義的政治鬥爭。

漢儒說經，偏重訓詁（亦作「故訓」，詮釋名物，由今通古的意思），宋儒偏重義理（不拘泥於名物訓詁，專講大道理，如義理之辨，天理人欲等等）。到了滿清乾（隆）嘉（慶）時候（十八世紀三十年代到十九世紀初），滿清的統治勢力已很鞏固，一般讀書人不敢談政治，就專做考據。做考據當然重視訓詁。他們認爲西漢十四博士都重訓詁，講家法，而他們是上接十四博士的傳統的，所以把考據之學叫做漢學，把偏重義理的叫做宋學。到了道（光）咸（豐）以後（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以後）漸漸有人主張漢宋兼採，就是說，不要專尙空談而不重考據，也不要專重考據而不講微言大義，必須古訓明而後義理明。這時因爲那時候已經經過鴉片戰爭，中國走向半殖民地化，一般學者覺得世局在變，研究經典應該着重濟世致用，僅僅考據字義固然不對，一味放言高論也不成，必須從經典裡面，找出一種道理來，作爲治國平天下的根據。就在這個時候，經學界「異軍蒼頭突起」，有所謂公羊學派起來了。

起頭有個武進人叫莊存與（一七一九——一七八八），著書發揮公羊傳的微言大義。莊存與有個姪子叫莊述祖（一七五〇一

一八一六），也是講公羊學的。述祖有兩個外甥，劉逢祿（一七七六——一八二九）和宋翔鳳（一七七九——一八六〇），都是經學家，承受外家的學統，大大地發揮了公羊學說。剛好那時候社會風氣正在轉變，而宋翔鳳的文章又寫得比一般漢學家來得活潑充暢，頗爲當時人所欽佩。道光末年，邵陽人魏源著了好多種書，大爲今文派張目，而且立場分明，從此今古文的壁壘就森嚴起來了。跟魏源同時的仁和人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和稍後的井研人廖平（一八五二——一九三二）都是今文派健將。廖平所著的知聖篇和闢劉篇，大大地啓發了康有爲。康有爲是個具有政治野心的人，又生當衰亂之世。宋學迂腐，漢學瑣碎，都不合他的情理。剛好今文學興起，什麼微言大義，什麼撥亂改制，都可以借來大加發揮，再配合現實，加上一些自己的意見，不難成爲一家之言。他就從這方面發展，從事著書立說。他所寫的「新學僞經考」和「孔子改制考」，就是他的改良主義運動的理論根據。這裡爲篇幅所限，不能很詳細地說。最近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康有爲」（宋雲彬撰），關於這一點說得極詳細，如有興趣，不妨買來一看。

至於問古文派的反動性何在，今文派的進步性何在，我覺得問得不大恰當。這兩派都有他的反動性和進步性。例如康有爲從公羊三世之說演繹成一套理論，說歷史是進步的，從據亂世、升平世到太平世，這和以前的歷史倒退論（例如讖緯家說「三王趨，五帝步」，認爲今不如古）或歷史循環論（例如五德終始之說）要進步得多。然而他把孔子當作受命於天的素王，主張建立孔教等等，那就是反動的了。古文派鑽在考據的牛角尖裡，近乎瑣碎，魏源說他們「錮天下智慧爲無用」。然而他們不像今文學那麼樣夸誕，他們實事求是，頗有「愛科學」的精神，這不能不說是帶有進步性的。康有爲的改良主義運動，在當時有它的一定的進步性，但是到了革命已經起來，康有爲還要保皇，那就反動了。而一方面古文派的章炳麟站在革命黨方面，就古文派的立場駁倒了康有爲的一切理論（詳可看「駁康有爲論革命書」和「駁建立孔教議」），這就表現出古文派的進步性來了。

（宋雲彬）

〔問〕恩格斯批判費爾巴哈的唯物論，說他是「下半個唯物論者，上半個唯心論者」，爲什麼恩格斯不說是，「上半個唯物論者，下半個唯心論者」？

（瀋陽　何玉冠提）

〔答〕 費爾巴哈認爲：我們自己所屬的物質的、可以感覺到的世界，乃是唯一現實的世界，我們的意識和思惟不論它是怎樣超感性的東西，總是物質的肉體器官即頭腦底產物。物質不是精神底產物，而精神本身不過是物質底最高產物。

他在基督教的本質裡說過：自然界不依賴於任何哲學而存在。自然界是基礎，我們人是自然界底產物，是在這個基礎上面生長起來的。在自然界和人以外，再沒有什麼東西了。我們的宗教幻想所造成的最高存在物，只是我們自己的本質之幻想的反映吧了。

恩格斯說這是純粹的唯物論，不過費爾巴哈達到這裡就停止了。費爾巴哈自己說：『退後一步，我是跟唯物論者完全一致的；向前進一步，我就不跟他們一起了。』恩格斯說：『費爾巴哈就是沒有「前進」到社會的領域。』關於社會方面他是唯心論者。他缺乏歷史的觀點，他完全不懂歷史唯物論。他更不瞭解什麼叫社會的上層建築，『即社會對於政治、法律、宗教、藝術、哲學的觀點，以及適合於這些觀點的政治法律等制度。』所以恩格斯說：『作爲哲學家的費爾巴哈，停留在半路上，下半是唯物論者，上半是唯心論者。』

意思是說費爾巴哈在論及物質與精神，自然與人類的關係上是唯物論者，換句話說在基礎上，在「下半」是唯物論者。當論及社會，論及在自然的基礎上生長起來的人，人的社會，以及關於人類社會的上層建築宗教、哲學等的時候，他就是唯心論者，他「上半」是唯心論者。

馬克思和恩格斯喜歡把基礎叫做下層的東西（如社會的下層基礎）把在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叫做上層的東西（例如社會的上層建築）。所以恩格斯說：費爾巴哈「下半個是唯物論者，上半個是唯心論者」。

（陳珪如）

〔問〕什麼叫「土地購買年」？它如何計算的？爲什麼說中國土地購買年很短？購買年短，何以證明封建剝削之嚴重？

（上海　董　剛提）

〔答〕 在資本主義社會，土地雖然也和其他商品一樣地會有買賣，但是土地並不是勞動的產物，當然就無所謂價值；它之所以也被人們當作被買被賣的對象，而且在它被買被賣的過程中，雖然也和其他商品的買賣一樣地是以貨

幣表示它的價格，但它絕不能和其他商品的價格一樣被認爲是價值之貨幣的表現；它的價格，不是別的，乃是以土地所提供的地租，依通常利息率來計算的購買價格，或依年租的多少倍來計算的購買價格。

以土地所提供的地租，依通常利息率來計算的土地的價格，這就叫做「地租的資本化」，因此，所謂土地價格，那無非就是「資本化的地租」。

「地租資本化」的計算土地購買價格的原則，除了要以土地所提供的地租依通常利息率計算的方式之外，也還可以表現於另一種的計算方式，即依年租的多少倍來計算的土地購買價格。正如馬克思所說：「英國土地的價格，是依年租多少倍來計算的。這不過是地租資本化的一種不同的表現。」（「資本論」，卷三）

在後一種計算土地購買價格的方式中，計算土地購買價格所需累積的地租的年數，亦即每年的地租累積至等於土地購買價格所需的年數，就是所謂的「土地購買年」。

土地購買年的計算方法是以地價爲被除數，年租爲除數，所得商數便是我們所欲求出的購買年。例如某塊土地的價格爲四千元，年租額爲二百元，求出它的購買年，則可作出如下的計算：

4000 ÷ 200 = 20年

（地價）（地租）（購買年）

關於土地購買年的長短，若舉西歐的資本主義國家來說，英國在十八世紀末的工業革命時期中，共「購買年」原爲二八至三二年，即在整個德國經濟陷於極度衰落的第一次歐戰後，也只降落爲二〇至二五年。至於中國解放前的「購買年」據過去國民黨反動政府所設立的中國農民銀行關於四川九縣一八三田場的調查報告，從一九四〇年春季至一九四一年春季，其中樂山的購買年是一·六六年，巴縣是四·五二年，溫江是五·八四年，萬縣是六·二三年，南充是六·六六年，綿陽是七·三〇年，內江是八·〇一年，安縣是一〇·二七年，宜賓是一三·六八年，四川各縣平均是七·一三年。（見中國農民銀行調查報告第七號「四川租佃制度」二三頁）又據中山大學農業經濟系調查廣東連縣十七個村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〇年上田「購買年」是三·二年，中田「購買年」是二·三年，下田「購買年」是二·四年。所以我們認爲中國解放前的土地購買年很短。

土地購買年的長或短，是與地租的重或輕成反比例的。因爲土地購買年長，就是說明須有很多年的地租才能累積成土地的價格，累積成地價的地租既然可以平攤於較多的年數，則其每年的地租額就會顯得低（或者顯得輕）；反之，土地購買年短，它就說明只須很短幾年的地租就可以累積成土地的價格；累積成地價的地租既然只須很短的年數，則其每年的地租額就會顯得重。

地租，在資本主義社會來說，只是勞動人民所創造的剩餘價值的一部份，只是平均利潤以上的額外利潤。中國解放前土地購買年的短，所反映出的地租額既然是如此的高，當然中國解放前地租的性質，就不只是平均利潤以上的額外利潤，就不只是農業勞動者所創造的剩餘價值的一部份，而是農業勞動者所創造的剩餘價值或其剩餘勞動的全部，甚至侵佔到農業勞動者必要勞動的一部份。這種不以平均利潤以上的額外利潤爲限的全部剩餘勞動的剝削，從其剝削的性質來說，這將顯得是一種嚴重的封建剝削。

（朱劍農）

編後記

四卷一期又與讀者見面了。在分欄上，與三卷各期大致相同，祇是增闢了「學術講座」一欄。本期的「學術討論」欄以中國古史研究爲中心，就暫改爲「中國古代史討論」欄。

上期的「學習實踐論」特輯，很受讀者歡迎，並紛紛來信，要求繼續多登幾篇，所以，在這一期裡，關於學習實踐論的文章和座談記錄，又佔了較多的篇幅。

在偉大愛國主義的旗幟下，全國的學術工作者已經更緊密地團結起來了。我們希望各方面的專家都能結合這一偉大的運動，指出各項學術研究工作今後努力的方向，並歡迎交本刊發表。

最近，我們收到大批讀者寄回的意見書，對本刊提出了許多非常寶貴的意見，眞使我們覺得無限的歡奮和慚愧。我們將以更大的努力，來答謝各方面的期許。意見書正在整理，決於下期作出總結，希望在讀者們的督勉和指導下，能使本刊的工作再提高一步。

關於發行工作方面，我們已把讀者們的意見轉送新華書店參考了。

書評

關於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下）

彭澤益

這道諭旨見於東華續錄，繫年爲咸豐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即一八五三年一月四日，與馬克思論文中日期恰恰晚了一天㉕。這可能是馬克思論文中日期有誤，或是東華續錄紀日干支有誤。（因東華錄和清實錄也有紀日干支弄錯的事。）不過還有一種更大的可能，這道諭旨是一月四日頒的，第二天發佈出來登在五日的京報（即英文Peking Gazette）上面，因爲京報錄載諭旨不註降旨日期，馬克思引用這諭旨可能是根據京報（本書中曾註出有引用京報上的記載），且以這天日期爲準。自然當天頒發的諭旨不可能登在當天出版的京報上，而每天出版的京報也不一定都是登載先一天的諭旨和奏摺（例如前述王茂蔭因條陳鈔法，咸豐四年三月初八日傳旨對其申斥的上諭，在三月初十日的京報上才登出來。）這道諭旨之所以迅速的在第二天京報上登出來，因爲這在當時是一個很重要的政令，馬克思的文章中之所以引爲論證，也是因爲重視其重要性。他在引文之後緊接着說：「我們記得，在一八四八年，在奧地利——這是日耳曼的中國——也有過這樣的言論，這樣的讓步。」㉖顯然可見，咸豐帝頒發這樣的「諭旨」，表示對小民剝削「讓步」——蠲緩錢糧和不得浮勒，主要是因爲洪秀全起來革命，希望藉此來「速振軍心」，以挽救其封建統治地位免於崩潰。

在解放社譯文中有「命令武昌總督及漢陽巡撫」一句，只就譯文字面看來則不及李大釗譯爲「頒給武昌漢陽等處以及南方各省督撫令……」較爲合乎事實，但照諭旨原文看來，這還是有問題的。要知淸代舊制，湖北屬湖廣省，一六六七年（康熙六年）裁湖廣省，分設湖北省。淸初設湖廣總督，駐武昌，總轄主管湖南湖北兩省的民政軍政。這個制度中經變革，到一六八〇年（康熙十九年）又改回來，湖廣總督仍駐武昌。巡撫之制乃沿襲明代，爲一省的行政長官，初設湖廣巡撫一人，後湖廣分省，改湖廣巡撫爲湖北巡撫，仍駐武昌府。武昌府領州一縣九，漢陽府領縣二，各設知府一人駐其地，漢陽府同知則駐漢口鎭㉗。知府統轄州廳縣，管理錢刑穀名的事。由此可知，當時並無所謂「武昌總督」（自然說「武昌總督」和叫「北京皇帝」也是可以說得過去的，但嚴格講來還是欠妥的）和「漢陽巡撫」的職官名稱。只要仔細讀了馬克思引用的這道「諭旨」中文原文，要知「諭旨」又被一再輾轉迻譯，所以譯文（或原文的）錯誤的由來，便昭然若揭了。

3、在馬克思論鴉片貿易（第二篇）中又有一段（頁九九）提及許乃濟的史事說：

「中國最出色的國務要人之一許乃濟，曾提議使鴉片貿易成爲合法的貿易而從中收稅。……」

許乃濟當時的官職是太常寺少卿。在禁烟問題上，他是主張全部弛禁的，辦法是一方面提倡鴉片在國內廣爲種植，「外夷」之利日減，迨至無利可牟，「外洋之來者自不禁而絕」；一方面主張讓外國鴉片進口照舊納稅。他在道光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一八三六年六月十日）上的奏摺中說：

「……今閉關不可，徒法不行，計爲仍用舊例，准令夷商將鴉片照藥材納稅，入關交易，只准以貨易貨，不得用銀購買。……」㉘

這個有名的摺子是許乃濟以一個廣東嘉應州文人吳蘭修的文章爲藍本，「稍稍潤飾條上」。在這以前，廣東一般官紳就有此主張，「以例方嚴」，「終不敢明請弛禁」㉙。後來許乃濟便因此受了

㉕ 案第二天即一八五三年一月五日有由軍機大臣寄諭湖廣總督徐廣縉等，其中有「與昨降諭旨實相脗合」的話。（見同上書頁三五）。所謂「昨降諭旨」即指一月四日的這道諭旨。

㉖ 馬恩論中國，頁四十二。

㉗ 張仲炘等纂湖北通志（民國十年刻本）卷一一五，職官志九。

㉘ 全文見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一，頁一——五。

㉙ 梁廷枏，夷氛紀聞（一九三七年商務印書館版）卷一，頁五——六。

申斥降職的處分。

4．馬克思在中英條約（第二篇）論文中引用中英天津條約（一八五八年六月二十六日簽訂）第十款，繙譯時採用條約原文，這是本書譯文引證原來文件僅有的一例。按條約原文中的一段是「准將自漢口溯流至海各地，選擇不逾三口。」而在本書中寫成「准將自漢口溯流至海口各地，選擇不渝三口。」（頁一一九）即上一句少了一個「口」字，下一句的「逾」字誤作「渝」字了。

二　關於書中史事應加的註釋和補充

如果不認爲讀者的要求過高，繙譯本書時有些地方（不論人名、地名、史事及譯文本身）應作較詳細的註釋和補充說明，幫助讀者加深理解，像不久前出版的恩格斯軍事論文選集（第五分冊新華書店出版）中所做的註釋補充工作一樣，是很必要的。本書中雖已稍稍做了一點，但還嫌不够，希望本書訂正再版時儘可能的再多做一些註釋和補充的工作。現只舉幾個史例來談：

1、本書頁五十九引格列伊（可能就是Charles Gray——引者註）爵士發言說：「鮑林（案即（John Bowring）爵士求見葉總督，總督應許了，並指定城外商人伍家爲相見之地。然而鮑林爵士卻大抬身價，以爲不能隨便到那裡相見而只能到總督衙門去。」

案鮑林舊譯作包冷，葉總督指兩廣總督葉名琛，「商人伍家」指廣東舊洋商伍怡和行的仁信棧房。此屋於一八五七年爲英國侵略軍焚燬。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前後，廣東地方官接見外國人都是在這裡。（本書頁七十上又說：「葉總督願意按照通例在城外一個地點相會，」也是指此。）伍怡和行一家歷嘉道兩朝位居十三行總商，包攬對外貿易和交涉事宜。這次亞羅船事件發生，廣東地方官仍沿舊例要伍崇曜（原名元薇，別字紫垣，西文作Howqua IV）會同官紳辦理和議，相傳在交涉中英國領事巴夏禮曾打過他的嘴巴。根據中文史料正確的記載，在這次事件中葉名琛自始至終都不曾答應和「夷酋」會面交涉的要求，鮑林（包冷）爲了掩飾自己交涉失敗，這話大概是自欺欺人的。

2、本書頁六十八論亞羅船事件經過說：「當亞羅船收帆停泊廣州時，船桅上並未懸掛任何旗幟。此時制軍得到了消息，說船上躲有犯人，於是制軍將他們拘捕了。」接着說英國領事「於是急忙忙的回到領事館向兩廣總督提出命令式的書面要求。」

此事發生在一八五六年十月八日（咸豐六年九月十一日）上午八時許，當時上船捕人的是廣東水師千總梁定國[二十]，巡防緝盜是他的職責。執行任務時他可以事先受指示，在一般情況下也可以先做後報。像亞羅船停泊廣州時並未懸掛任何旗幟，自然是可疑的，不必等待上級的指示，而是可以自行處理然後報聞的。所以就事論事，譯文的「制軍」可能是「水師千總」或其他官職之誤。因照清代直省官別名舊制，總督才稱制軍。就譯文字面看來好像兩廣總督親自到亞羅船上去捕捉海盜，這是不合事理的。

3、本書頁七十四論第一次鴉片戰爭說：「一八四一年至一八四二年的侵略，是一八四一年八月二十一日（按爲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初五日）由香港出發的；首先佔領了廈門（案爲八月二十六日即中曆七月初十日），十月一號（按即八月十七日）接着又佔領了舟山島，把這個島變成了此後軍事動作底根據地。」

關於第一次鴉片戰爭時間問題，一般史書都記載着爲一八四〇年至一八四二年間的事。其實在一八三九年十一月三日因禁烟問題中英水師即在穿鼻洋發生了海戰，從此兩國關係已處於非正式的交戰狀態。英國方面決定發動對華侵略戰，即于一八四〇年派遣所謂「東方遠征軍」來到中國，六月二十八日起封鎖廣州，七月五日陷定海，八月二十七日由舟山北上天津，八月十九日英艦駛抵白河，遂有大沽談判。後來交涉回到廣州也沒有什麼結果。一八四一年一月七日英軍又攻陷沙角大角炮台，琦善遂答應了義律（Charles Elliot）提出的要求，成立協定——即所謂穿鼻草約，中英政府雙方都沒有批准它。滿清政府乃於這年一月二十七日下詔對英正式宣戰，四月底英方也撤換了義律而代之以璞鼎查（H.Pottinger）。璞鼎查是八月十日夜駛抵澳門的，接着開始發動有計劃的軍事侵略行爲，直至簽訂江寧條約。上面恩格斯的一段話，只是指璞鼎查到華後的英軍侵略行動。如不加以註釋說明，很容易使人誤會這就是鴉片戰爭開始爆發的日期。

4、本書頁七十六說：「清軍副都統，看見戰門已遭失敗，遂焚燒了自己的房屋，本人也投火死了。」

這個「清軍副都統」是指京口副都統海凌（亦作齡）。揚棨出圍城記說海凌在英軍侵入鎮江城時逃走，死於金壇。清官方報告則說海凌確係「在署內自縊盡節」。據「丹徒士民顏崇禮郭湘等十六人具狀言，海凌夫婦實是在署內燒死，廨宇骸骨雖盡，而所着藍紗袍及所載玉耳環尚未全燬可證。」

[二十] 見七弦河上釣叟：英吉利廣東入城始末，鵠齋叢書本。

㉑關於海淩死事，恩格斯的記載大概是據英軍的報告，這是可以和這段中文史料——顏崇禮等的報告相互印證的。

5、本書頁七十六說鎭江未失陷前，「對岸的瓜州城投降了，並償了三百萬元的賠款。」這應該是指鎭 江對岸的揚州向英軍繳贖城銀事㉒。當時揚州官商以江壽民等爲首的投降派爲了保全身家財產，請求英軍不要攻打揚州，乃向英軍送了漕平銀三十五萬五千兩作爲贖城費。此款每元作銀七錢一分計折合爲五十萬元，在鎭江城下之日（一八四二年七月二十一日）交付，後於江寧條約第一次賠款六百萬兩銀數中扣除。根據史事來看，「瓜州城」應是「揚州城」之誤，「三百萬元的賠款」數目應是五十萬元（或三十五萬五千兩）之誤。

6、本書頁九十三的「上海道台」是指蘇松太道宮慕久。上海開埠時他是和英國駐滬首任領事巴富爾（G. Balfour）辦交涉的一任道台。

此外，馬克思恩格斯寫作中國問題時所引用的書籍報誌及官方報告等，就論文中已註出的名目約有十餘種，到現在都成爲極難得的珍貴資料。我寫本文時所能找到的不過三四種而已。在這裡順便舉出來：如頁九十一引英人蒙哥米爾·馬丁的話，即引自K. Montgomery Martin著的"China"一書。共兩卷，一八四七年倫敦出版。如頁一〇五前倫敦泰晤士報駐上海和香港的通訊員枯克，和頁一二七的楊格羅夫·枯克應是一個人，原名是George Wingrovce Cooke，在一八五七年至五八年間他替泰晤士報上所寫的關於中國通訊，後輯印成一書叫做"China"，一八五八年在倫敦出版。馬克思引用他的文章即見於本書，但爲節錄。又如馬克思引用英國政府藍皮書：關於額爾金爵士專使赴華赴日之文件，我所見到的是一卷殘本，從二十五頁至四七四頁，其中載有一八五二年三月十五日英國駐廣州代辦米特切爾（W.H. Mitchell——按原文發音應譯作「米琪爾」）致文翰（S. G. Bonhan 本書譯名作喬治彭特拉姆）的長篇報告，檢討過去十年來英國對華貿易狀況，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文件㉓。馬克思在對華貿易（頁一六二——一七〇）論文中引用他的報告也是節錄。有些人常常即根據馬克思的這段節錄把這篇報告引用來作爲分析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的典型材料。由此可見，馬克思研究寫作中國問題所參考的材料是相當豐富而又是多方面的，決不僅止於郭實獵的有關中國問題著述㉔。

三　關於人名、地名及統計單位

在本書中外國人名一般是採用音譯，但其中很多外國人名在清代官書中已有習慣的繙譯，而這些舊的譯名且在一般著作中沿用已久。本書中的外國人名既沒有照着習慣的舊譯（只有極少數人名是例外，如額爾金、普魯斯、布爾布隆），音譯也沒有附註原文。這不但不能使讀者結合中國史料作深入的研究，且易於引起一種思想上的混亂。例如：

1. 英國駐滬第二任領事亞爾可克（頁四十五，以下只註初見頁數），原名 Rutherfard Alcock，清代官書舊譯（以下簡稱舊譯）初作亞利國，後通作阿禮國。

2. 英首相巴麥斯頓（頁五十二）或巴姆（頁二一五）即第一次鴉片戰爭初期的英外相，原名 Lord Palmerston, Henry John Temple，舊譯作巴麥尊。

3. 英公使鮑林（頁五十五），原名 John Bowring，舊譯作包冷。

4. 英駐廣州領事巴爾克士（頁六十四），原名 Harry S. Parkes，舊譯初作夏巴，或夏禮巴，後通作巴夏禮。

5. 代表英方簽訂江寧條約的亨利·波廷格爾（頁七十四），原名 Henry Pottinger，舊譯作璞鼎查。

6. 英水師提督馬基·西穆爾（頁六十九、頁一五七），原名 Michael Seymour，舊譯作西馬，全譯名作西馬·糜各里。

7. 瓦爾佛爾上尉（頁九十三）原名 George Balfour，舊譯作巴富爾，他是一八四四年上海開埠時的英國首任領事。

㉑楊棨：出圍城記（京口掌故叢編本）頁一二。

㉒事見夏燮：中西紀事（同治四年刻本）卷八；梁章鉅：浪跡叢談（道光二五年刻本）卷二；黃鈞宰：金壺浪墨（金壺七墨全集本）卷三，頁五—六，頁七。

㉓如 N. A. Pelcovits. Old China Hands and the Foreign Office (New York.1948) 書中（頁二七、三一）即非常重視Mitchell報告書對英國方面的政治影響，書中並用了很多的篇幅來討論它。

㉔郭實獵的著作很多，關於中國問題的主要著作有中國沿海三次航行記（一八三四），中國歷史簡編（一八三四），中國之開放（一八三八）及道光皇帝傳（一八五二）等，並在裨治文(E. C. Bridgman)主編的華事月報（The Chinese Repository, 1832—1851）上發表不少關於中國問題的論文。

8．英海軍將領阿布（頁一三二），原名James Hope，舊譯初作赫伯，後通作何伯。

9．俄國木喇夫岳福將軍（頁一四一）英文作Nikolai Nikolaivitch Muraviev，舊譯作木哩斐岳幅。

10，喬治彭特拉姆（頁一六三），原名Samued Gearge Bonhan，舊譯作文翰，他是第三任香港總督。（又頁七〇上的「約翰博亨姆爵士」按史事看來，也應是文翰，但譯音却不對。）

11，「額爾金和金家騰」（頁一五七），原文是Elgin and Kincardine，一八六〇年十月二十四日在北京簽訂的中英續增條約中譯文作「額羅金並金額爾田二郡伯爵。」我們知道，Elgin舊譯通作額爾金，則「金家騰」如照舊譯應譯爲「金額爾田」。

12，寧波英領事卡爾維（頁一七二）原名Frederick Harvey舊譯作夏福禮。

13，德國傳敎士古士拉夫（頁二一二），原名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英譯作Charles Gutzlaff，舊譯通作郭實獵。

以上只就見於淸代官書已有舊譯的外國人名舉例而言，其他外國人名沒有習慣繙譯的（特別是「國會關於對華軍事行動的討論」等文中的外國人名）未嘗不可以採用音譯。但有時音譯也不一定很準確，最好能够附註原文。

地名的繙譯也有譯錯的。如作爲鴉片私販地點之一的「馬口」（頁九十四、九十八），應該譯作澳門。「馬口」顯爲Macao音譯之誤。

書中的貿易統計，如頁一六五的表和頁一九八的表，都沒有註明貨值的單位（元？兩？鎊？）應該查明註出。書中其他統計數字難免沒有印誤的地方，再版時都應根據原文仔細校對一番。

四 關於馬恩論太平天國

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太平天國運動的論述，在本書中有很多地方被提到。一八六二年七月七日發表在潑萊塞報上的中國事件一文（頁一七一——一七六）是馬克思對它的一個專篇記述。這篇文章是馬克思根據當時英國駐寧波領事館夏福禮（本書譯作卡爾維）寫給英國駐北京公使普魯斯Frederick W. A. Bruce）的報告全文摘述。

寧波是在一八六一年十二月九日爲太平天國侍王李世賢部黃呈忠范汝增的軍隊所佔領。在太平軍佔領寧波前後，英、美、法三國領事爲了保護他們侵華旣得的權益，曾和太平軍將領有過多次接觸和書信交往；並劃定外人居住通商區域，禁止太平軍及淸軍「侵犯」，以示願保持「友好」和商務關係。寧波被佔領後夏福禮即令英國傳敎士離城，這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他給普魯斯的報告中說太平軍在寧波設立海關（案在江東，以衛天安潘起司關稅），組成常備軍隊。到一八六二年二月一日普魯斯乃訓令夏福禮調査寧波太平軍情形和商務情況，夏福禮給他的呈覆寫於三月二十日，時在寧波爲太平軍佔領已有三月。（原信中亦有「寧波在革命太平軍之手已有三個月了」一語可證。）

在這個報告中夏福禮懷着極大的敵意詆譭說：「太平軍不知何者爲良政府，不思組織政治及商業之機構，無維持秩序之意思」。「彼有十年之訓練，而無一毫之生產，百方破壞，無力建設，如此得承認之爲國家乎？」「太平軍多秘密之陰謀詭計，使人莫測」，「其嗜殺之流毒最烈」，「其假宗敎之名，而造作罪惡，誠前史所無」。報告結語又說：「吾人如眞知太平軍行動者，當以劇盜視之。凡基督敎文明國與中國通商者，應竭力撲滅之」（二五）。這是一篇敵視中國人民極惡劣的報告。

馬克思的中國事件即是根據夏福禮這篇報告寫成。照馬克思的說法，太平天國革命本身並不是什麼特別的東西，因爲在東方各國常是社會基礎不發生變動，同時將政治上層建築奪到自己手裡的人物和種族則不斷更迭。因此在中國社會停滯的基礎上產生的太平軍大概就是中國人腦子裡所幻想的那種現身的「魔王」。（見中國事件）馬克思所以摘述這篇報告而寫成中國事件，也許爲的批評太平天國後期的革命腐敗。用他自己的話說，他引述夏福禮信中的話，就是「爲要形容這種『天災』起見。」

但我們所要討論而必須加以注意的是在本書「列强與太平革命」標題下，摘錄馬克思恩格斯合著國際概況（下註一八五〇年正月三十一日）中的一段文章（頁二一二——二一三）。這是一段通常被引用爲馬恩論太平天國的典型文章。我從前也是這樣引述過，直到現在仍然爲人所引用。這段文章按國際概況後註的年代——不論是寫作年月或出版年月，一八五〇年正月三十一日（即道光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以洪秀全爲首的太平天國運動還沒有在金田起義，也沒有在永安建國，這是一個歷史事實。但有兩點可以證明這段文章的寫作或出版年

（二五）這篇報告在A. F. Lindley (Lin-le), Ti-Ping Tien-Kwoh: the History of the Tiping Revolution (2 Vols. London. 1866) Vol.II, pp. 522—526中以極大篇幅把它引述來評論。這裡是用孟憲承譯文，見太平天國外紀（民國四年商務印書館版）卷中頁一一三——一一六。

月是無誤的：

第一，文中所說的德國傳教士郭實獵（即古士拉夫），原是在中國沿海一帶以傳教來掩護他爲英商渣甸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私販鴉片的行動，後來投靠英國政府，在鴉片戰爭期間他曾爲英軍駐舟山的地方長官，江寧議和時他是英方的中文譯員之一，自一八四三年起任英國香港殖民地政府華文秘書。他在中國多年來的活動，都是替英國外交部做間諜工作。一八四九年下半年他回到歐洲(二六)，先後到過英格蘭（南部和西部）、愛爾蘭、荷蘭、德國遊歷，到處發表關於中國歷史和傳道的講演，頗受歐洲統治階級的重視和欣賞。一八五一年一月中旬後由歐洲回到香港。這年七月底得病，在八月九日就死去了(二七)。由此可見，一八五〇年郭實獵正在歐洲，太平天國這時還沒有起義。當時馬克思恩格斯在他們的文章裡之所以有興趣的提及他，乃是由於他新從中國帶來了一些「標本式的奇聞」（語本本書譯文）。這種「標本式的奇聞」的表現，可能就是郭實獵在歐洲時所發表的演說和文章。但這時太平天國還未起義，這「標本式的奇聞」中，就根本不會提及太平天國革命，事實昭著。從前日本福田德三博士就根據了這段文章而一口咬定說馬克思因讀了郭實獵有關中國問題的著述而習得了中國問題，不瞭解史事的眞相，用一點來概括全部，不但過甚其詞，而且也是一個錯誤的結論。

其次，在這段文章中有「八年來（中國）已處於社會革新底前夜」的話，也可以證明此文寫作或出版於一八五〇年。因自一八四二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以來，至此在時間上正有八年的光景。

如果年代沒有錯誤，馬克思恩格斯合著國際概況中的這段話就不能認爲是記述太平天國革命事件的本身。但就它的內容來看，這段文章應是記述自鴉片戰爭以後到太平天國革命前中國人民在各地不斷起義，反對滿清統治和封建地主的鬥爭(二八)。要知當時領導這些貧民起義的，大半又是天地會黨人。一般說來，在天地會（通常所謂洪門會、三合會、三點會都是這一名的數稱）會衆中間不僅具有民族革命——反清復明的政治思想，而且具有仇抗豪富和平等公有的強烈階級意識。他們起義的口號是「官逼民反」、「朱明再興」、「劫富濟貧」、「替天行道」等等，聲威浩大，彼伏此起，正是太平天國革命的前奏和先驅。

我們知道，通常批評一本譯著，照理應該把原著拿來參考校對。但寫作本文時由於客觀的困難却沒有做到這一點，因此在譯文文字本身方面表示的意見很少，但這並不是說譯文本身沒有問題。以上指出各點，只是根據一般歷史知識來衡量，而在本書中也是比較表現得突出的例子，可能還有不少沒有被說到和遺漏的地方。我們希望能够因此而引起各方面的注意和討論，在不久的將來，我們願見有一本內容更充實譯文更正確的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的新版出現。

(二六) 日本野原四郎：「太平天國の亂」說郭實獵是在一八四八年回到歐洲的，並由此作出的推論是錯誤的。（見世界歷史大系第九卷東洋近代史第二編頁二〇一，昭和九年平凡社版）。

(二七) 參看Herman Schlyter. Karl Gutzlaff: Als Missionar in China (Lund, 1946), Kapitel VII.

(二八) 如廣州府屬的三合會、臥龍會結黨聚會，千百爲羣，「持械戕官，擄官勒贖」（一八四五年），及廣州人民拒抗英人入城搗毀府署（一八四六年）；耒陽楊大鵬（一八四四年）奉化張名淵（一八四五年）及松江府人民（一八四四年）等抗不納糧，「阻截糧戶，糾衆攻城」；湖南新寧會黨雷再浩（一八四七年）及李沅發（一八四九年）先後起義，獲致廣西全州靈川等地會衆響應。在廣西各地有三合會黨張家祥豎「替天行道」旗起義（一八四八——九年），大頭羊張釗、大鯉魚田芳、捲嘴狗侯成、豆皮滿王膺（一八四九——五〇年）在梧州一帶起事，「肆行無忌」。而天地會衆在廣西鬱林州的「聚百人或數百人，定期拜會結盟，推一人爲首，稱曰大哥，次一人曰老晚，其餘羣稱兄弟。凡入會者，必自言明無父母妻子，惟結盟之兄弟是親，惟大哥之命是聽。……迨後起賊匪，放火殺人，則自稱洪家，亦曰紅家，逼脅鄉村入會曰轉紅，交納租石謂之交紅租，其不從者曰白家。道光間，州中此會最多，至甲辰（一八四四年）乙巳（一八五五年）尤盛，幾無村不有大哥云。」（文德馨等纂光緒鬱林州志卷十八、頁二〇。）這都是顯著的史例。

·新學術小叢書第一種·
學習「實踐論」
李達等著　本社出版
每本定價三千元
新華書店總經售

學術文摘

文摘這一欄，主要是爲了節省讀者的時間，摘錄的部分，只能包括各篇論文的要點和結論，以便讀者瞭解全文的大意 ——編者

毛澤東同志發展了眞理論

艾 思 奇

一 眞理的問題是對於革命成敗攸關的重要問題

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論」，反覆地論述到關於眞理的問題。他依據辯證唯物論的認識原理，爲我們正確地指明了眞理的性質，判定眞理的標準，以及如何解決理論的東西之是否符合客觀眞理性這個問題。毛澤東同志之所以在理論上這樣重視眞理的問題，歸根結底，又由於它在中國革命的長期歷史實踐中，始終是一個成敗攸關的極其重要的問題，也是一個需要用艱苦努力來解決的困難問題。

鴉片戰爭失敗，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期間，中國人民經過了八十年左右的鬥爭，由於沒有找到最好的眞理，革命運動始終沒有獲得勝利。自從中國人民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最好的眞理，產生了中國共產黨之後，才不過二十八年，毛澤東同志就在他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裡，『宣佈中國人民自己的革命鬥爭已經取得了基本勝。就中國共產黨二十八年的歷史來說，革命領導之能否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眞理，也是與革命的勝敗密切聯系着的。

眞理的認識對於革命和人民是如何重要，直到現在在我們的工作幹部中間，還有許多人不能深刻了解，甚至於完全不能了解。有些人不肯用刻苦努力的精神來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眞理，其藉口是不學習理論似乎也可以照樣工作，而不知道不學習理論決不能把領導工作做好，決不能在領導工作中避免錯誤，或減少錯誤。有些人在工作和學習中，不能夠積極地堅持眞理，對於眞理和錯誤的界限劃分採取無可無不可的態度，不能勇敢地來揭發錯誤和對錯誤進行鬥爭。

要善於堅持眞理，就必須了解什麼是眞理，必須學會判別眞理和錯誤，必須懂得如何才能使我們的認識經常保持客觀的眞理性。而要解決這些問題，就必須認眞研究「實踐論」中所發揮和發展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眞理學說，並把它應用到自己的工作和學習當中。

二 實踐之作爲眞理標準的原理

什麼是眞理？眞理就是符合於客觀事物規律性的正確認識。人的思想如果不符合於客觀事物的規律性，這就不是眞理的認識，而是錯誤的認識。如何判別眞理和錯誤？如何証明我們的思想和認識是否合於客觀事物的規律性？毛澤東同志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原則給了一個明確的答覆：「通過實踐。」

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論」，把辯証唯物論的實踐概念的具體內容作了系統周密的發揮，他依據精密規定的意義，有時特別稱之爲「社會的實踐」，或「變革現實的實踐」，這就有別於舊哲學中和一般人心目中的那種意義模糊的概念，有別於那種反對變革現實的帝國主義反動派所要求的「實效」。毛澤東同志指出：「只有人們的社會實踐，才是人們對於外界認識的眞理性的標準」。社會實踐的具體內容，最主要的，是生產活動的實踐和階級社會的各種形式的階級鬥爭的實踐。

毛澤東同志指出：人類對於眞理的認識的程度，是隨着社會實踐的發展而發展，首先是隨着生產活動的發展而發展的。同時，在階級社會中，階級鬥爭的發展，也是人類認識發展的一個決定條件。歷史上每一次進步的變革現實社會的階級鬥爭，總使人們對於眞理的認識前進一步。到了伴隨着巨大生產力的大工業而出現了無產階級的時候，人們終於能夠對於社會歷史的發展作全面的歷史的了解。這樣就出現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眞理。

因此，只有「社會的實踐」，「變革現實的實踐」——變革自然界的生產活動和變革社會的階級鬥爭的實踐，才是人類認識發展的眞實基礎，任何人如果希望使自己對於外界的認識不斷地接近客觀的眞理性，就只有參加在變革現實的實踐當中。就今天來說，脫離了世界各國人民反對以美英帝國主義爲首的一切反動勢力的階級鬥爭的人，以不問政治而自鳴清高的人，以少數上層人物的所謂修身踐履行爲而自滿自足的人，留戀舊社會甚至於站在保守舊社會的反動立場上的人，要想正確認識社會歷史發展和革命發展的眞理，是不可能的。

三 接近客觀眞理的辯證法道路

人們如何在實踐中使自己的主觀認識接近客觀眞理？毛澤東同志指出：這是一個依循着辯証法規律的能動的發展過程。我們在工作一個時期之後，要把各方面的工作經驗做一個總結，這就是爲着要使認識達到理性階段。但是

，僅僅達到了理性認識階段，還不能完全解決我們的思想之是否符合於客觀眞理性的問題。「要完全地解決這個問題，只有把理性的認識再回到社會實踐中去，應用理論於實踐，看它是否能夠達到預想的目的。」如果能夠達到預想的目的，那就証明理性的認識已符合於客觀的眞理性。如果不能達到預期的目的，或不完全能達到預期的目的，這就証明它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客觀的眞理性，就要加以全部的或部分的修正。

列寧在『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裡這樣寫道：「從生動的直觀到抽象的思惟，從思惟到實踐——這就是認識眞理、認識客觀實在的辯証法道路。」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論」把列寧所指出的這一條認識眞理的「辯証法道路」作了詳盡的闡述，這是毛澤東同志對於眞理論，對於實踐之作爲眞理標準的原理所給與的重要發展。毛澤東同志的這些發展，是與中國革命歷史上反對各種錯誤思想的鬥爭密切地結合着的。他總結了這些鬥爭經驗，從認識論的基礎上，揭發了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這兩種基本錯誤傾向之所以失足的原因。

教條主義者不懂得感性認識是接近客觀眞理的一個必要階段。因此，他們也就不知道應該從實際經驗中去抽出反映客觀現實的生動理論，而把「道聽途說的一知半解」或書本上支離破碎地抄引下來的現成條文當作公式到處亂套。這樣就離開了接近客觀眞理的道路，而走上懸空的主觀主義的道路。

經驗主義者又是從另一方面遮斷了人們接近客觀眞理的道路，這就是不了解「認識的感性階段有待於發展到理性階段」這一個「認識論的辯証法」原理。他們以個人所有的一點點直接實踐經驗自驕自滿，沾沾自喜於一得之功與一孔之見，輕視各方面的間接經驗，不會有系統有組織地從事周密的調查研究和學習各方面的經驗，不知道把豐富的感覺材料加以改造提高，使之成爲理性認識的必要，不懂得總結經驗的必要。因此，經驗主義者的知識就停頓在狹小的、低級的感性階段，不可能認識事物的全體，事物的本質和事物的內部規律性，不可能在實踐中「通觀客觀過程的全體」，掌握明確方針，看出遠大前途，對於事物發展的客觀眞理是處在盲人的狀況中。

這樣，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是在兩個不同的方向上，離開了認識眞理的辯証法道路。毛澤東同志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眞理學說，詳細指明這條正確的道路，就給我們指出了避免重犯這些歷史錯誤的明確方針。

四 眞理的相對性和絕對性

毛澤東同志嚴格依據辯証唯物論的原理，指出認識眞理的過程決不是一次完結的，而是永不停息地向前推移和發展的過程。因此，人們對於客觀事物的某一過程和某一發展階段獲得正確的認識之後，即使是在實踐中受到了檢驗，証明其爲完全符合於客觀規律性的眞理，仍然不能把它看作無條件的絕對眞理。人們如果要使自己的認識經常保持客觀的眞理性，那就決不能在任何一個時候使自己學習的努力停頓下來，就要不斷地跟着實踐的發展前進，而使自己對於客觀事物的認識也發展前進。

毛澤東同志充分論証了眞理認識之不斷發展的必要，因此也就「深刻地說明了和發展了著名的恩格斯和列寧關於絕對眞理和相對眞理的原理」（眞理報編輯部）。

我們能夠認識絕對眞理嗎？馬克思主義者的答覆是肯定的。絕對眞理是「無數相對的眞理之總和」。因此，我們對於客觀事務的認識之不斷前進發展的過程，就是我們認識絕對眞理的過程，只要我們持續不斷地努力學習，只要我們經常不懈地從實踐過程中，從客觀事務發展過程中，抽引出新的眞理，來充實和發展舊的眞理，我們就已經是親身游泳在「絕對眞理的長河中」，我們就能通過無數的相對眞理來接近絕對眞理。自然，這一個游泳的過程，是永遠沒有完結的，那是因爲「客觀現實世界的變化運動永遠沒有完結」，而「人們在實踐中對於眞理的認識也就永遠沒有完結」；那是因爲絕對眞理的本身，就是一個不能完結的、人類認識日益向更高程度發展的活生生的過程。因此，沒有形而上學者所幻想的那種最後完結了的絕對眞理。就革命工作中的問題來說，教條主義者把某些抽象的公式當作最後完成了的眞理，不顧一切條件、地點、時間任意拿來亂用。有些經驗主義者把局部的經驗誤認爲普遍眞理，在任何條件下，都要堅持這些局部經驗，不肯學習新的經驗。這些錯誤思想，都是片面地堅持眞理的絕對性質，而否認相對眞理的存在，在各種實際工作中，是都要遭到嚴重的失敗的。

毛澤東同志指出「人們對於在各個一定發展階段上的具體過程的認識只具有相對的眞理性」，這決不能得到另外一種形而上學的片面的結論，說一切眞理歸根結底都只是相對的，而沒有任何絕對的性質。有一種哲學上的相對主義者，以爲世界上的眞理是沒有任何絕對的客觀標準的，只要人們主觀上覺得是眞理，就可以算作眞理，因此，人人都可以把自己的是非作爲是非，而不必承認世界上有什麼眞正的是非，這就成爲一種懷疑主義和極端的主觀主義。

馬克思主義所承認的相對眞理，決不是與絕對眞理完全隔絕的。第一，它是「人們對於在各個一定發展階段上的具體過程的認識」，因此它的眞理性就有着客觀的——絕對的標準，而不能由人的「主觀上覺得如何」來隨便顚倒是非的標準。第二，它的總和構成了絕對眞理，因此它本身就是絕對眞理的一部分。第三，它反映着絕對的總的宇宙發展過程中的一定具體過程，因此它在絕對眞理的無限延長的鏈鎖中是不可少的環節。

毛澤東同志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眞理論所給與的一個極重要的發展，是在於總結反對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這些歷史經驗，而創造了著名的「馬、恩、列、斯主義的普遍眞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互相結合」（「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原理，作爲我們正確掌握馬克思主義活的眞理的基本方針，作爲糾正教條主義與經驗主義這兩種偏向的一個思想方法的重心。

「實踐論」的重新發表，將推動我們進一步去克服教條主義，尤其是克服經驗主義，使一切參加革命的實際工作和研究工作的幹部，更善於在馬克思主義的絕對眞理的長河中游泳，更善於担當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任務，使中國人民的革命運動和中國的學術界在不久的將來獲得更光輝、更偉大的勝利。（一九五一年三月二日人民日報）

中國古代在天文學上的偉大貢獻

竺可楨

古代天文學最發達的民族要算巴比倫、印度、希臘和中國。可是過去資本主義國家談天文學史的人，多推崇巴比倫和希臘，蔑視中國在天文學上的偉大成就。

中國古代天文學上的成就，有兩點和巴比倫與希臘不同的。第一是注重實用，我們天文學上的成就，許多是爲配合實際需要而得到的。第二我們有悠久的歷史，各時代繼續不絕的有紀錄，有發現，有創造。我們若把中國天文學發達史分爲三個時期，即（一）從殷周到兩漢三國，（從六朝到唐，（三）從五代到元明，則每個時代統有傑出的人才，在繼續不絕的勞動着，才能創造我們古代在天文學上偉大的貢獻。

在第一個時期，我們最大的貢獻是在曆學上。從殷墟時代起，我們已是農耕社會。一年四季寒來暑往的規律，對於農產品的培養、生長和收穫是有決定性作用的。必得把握這寒來暑往的規律才能把農產物搞好。稻麥五穀早種或遲種十天的差別，常會使農人一年辛苦的勞動變爲成功或失敗。我們從甲骨文上可以看出三千年前殷代已經有十三月的名稱。西洋在巴比倫時代或希臘羅馬時代，也夾用陰陽兩曆，和中國原是一樣。不過，同一時代，我們的曆法要比希臘羅馬來得進步。

中國古代定一年四季的方法，最初以黃昏星宿的出沒爲主。尚書堯典以鳥、火、虛、昴四宿爲仲春、仲夏、仲秋、仲冬黃昏時之中星。殷墟甲骨文中已有「火」和「鳥」的星名。司馬遷史記稱古代有火正，專門觀測大火的昏見。可見我國三千年前，春季黃昏大火，即心宿第二星的初見，爲一年中農業上的大事，季節由大火的昏見而決定，到了春秋中葉，我國曆學有了顯著的進步。

除曆學而外，我國古代可靠的天象紀錄，也多在世界各國之先。不但時間最早，而且也最詳盡。如以日蝕而論，我國即使把殷墟甲骨上所記的日蝕，和書經胤征，詩經小雅所載的日蝕，因爲年代不能確定不談外，單春秋一書二百四十二年中，記有三十六個日蝕。其中有三十二個已証明是可靠的。比西方最早可靠的記錄，即希臘人泰耳所記的日蝕要早到一百三十五年。

我國有二十八宿，印度也有二十八宿。我們若把中國二十八宿和印度二十八宿相比較，知道中國二十八宿距星和印度相同者有角、氐、室、壁、婁、胃、昴、觜、軫、九宿。距星雖不同，而同在一個星座者有房、心、尾、箕、斗、危、畢、參、井、鬼、柳、十一宿。其距星之不同，屬於一個星座者，只有亢、牛、女、虛、奎、星、張、翼、八個宿。而其中印度却以織女代我們的女宿，河鼓即牛郎代我們的牛宿。從此可以知道，二者是同出於一源的。從中國二十八宿以角宿爲帶頭，和牛女兩宿的變動看起來，二十八宿的發祥地，無疑是在中國。

西方最早的恒星表，要算多祿米的恒星表，在公元後二世紀所成，係抄錄公曆紀元前二世紀希普克斯觀測的結果。到了東漢和多祿米同時的張衡，已知道「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爲星二千五百，而海人之占未存焉。」張衡創渾天學說，作渾天儀，立黃赤二道，相交成二十四度。分全球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立南北二極。佈置二十八宿及日月五星，以漏水轉之。某星始出，某星方中，某星今沒，和實際完全一樣。其精巧爲以前中外所未有。

在第二個時期從六朝到唐六百年中，我們和印度大食間的文化交流是很盛的。在晉成帝時候（公曆三百三十年左右）虞喜比較古代星宿位置與當時不同，發現了歲差，定出每五十年春分點在黃道上要西移一度。到七世紀初隋朝劉焯定歲差爲七十五年差一度。則與實際已相差極近。但西洋同時尚牢守百年差一度的舊說。

在六世紀中，北齊的張子信，因爲避亂到海島上，化三十年工夫專以渾儀測候日月五星。發現一年中太陽的行動快慢，和日月蝕的規律。他說，「日行在春分後則遲，秋分後則速。合朔月在日道裡則日食，若在日道外雖交不虧。月望值交則虧，不問表裡。」張子信這兩種發明，於預告日蝕大有裨益。到唐明皇時代，僧一行和工人梁令瓚造黃道銅渾儀，以測量星宿的經緯度，發現了一樁重要事實，即把當時的星宿位置和古代相比，不但赤道上位置和離極度數，因爲歲差的關係有不同。而且黃道上位置亦有不同。在唐開元的時候，我們在天文學上還做過一條大事，即是量子午線一度的長短。我國從漢代以來，天文學家被周髀算經的唯心學派所誤。周髀假托周公之說，以爲天圓地方，日晷之影，千里差一寸，從漢到隋沒有人能推翻這荒謬的理論，影響了我們天文學的進步。隋朝的劉焯是第一個人用事實來証明周髀影千里差一寸之不可靠。

在第三個時期，即從五代到元明，亦是六百年，我們在天文學上繼續有不少光輝的貢獻。在這個時期，我們最偉大的發現，是指南針之應用於航海。北宋宣和元年（公曆一一一九年）朱彧作萍州可談，記廣州蕃坊市舶。其中有「舟師……夜則觀星，晝則觀日，陰晦指南針」等語。可知那時指南針用以航海已極普通。宣和五年，北宋要和高麗結好，派徐兢出使高麗，留了一個多月。回國後，寫宣和奉使高麗圖經上陳徽宗。其中很生動地講到指南浮針如何在風暴中應用着。

沈括是我們歷史上一位勤勞而富於創造精神和奮鬥精神的科學工作者。他爲了測定天空北極所在，化了三個多月工夫，夜夜觀測，晝了二百多張圖，方知那時北極離開極星尚三度有餘。沈括於曆法主張拋棄一切前人之說，以節氣定月，澈底爲陽曆，不管月亮的朔望，把閏月完全去掉。

元世祖至元四年波斯人札馬魯丁西域儀象，並造萬年曆。但不久郭守敬創立授時曆，以三六五•二四二五天爲一歲，和實際地球繞太陽一周的週期只差二十六秒，與目

前世界所用格里哥萊曆一歲周期相同。格里哥萊曆比授時曆要遲三百年。郭守敬又製造了簡儀、候極儀、玲瓏儀、渾天象等十三種儀器，機巧精密，勝過前人。郭守敬又發起全國測量緯度的大事業，計東起高麗，西至涼州、成都、昆明，北至鐵勒，凡二十七個地點，並立了二十二個測候所。這可稱為中國古代天文學極盛時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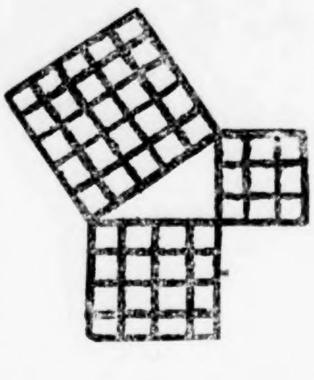
我們天文學從兩漢經唐宋元各時代統代有進步，為什麼到明朝卻會墨守成法，停頓下來呢？大概明朝提倡科舉，以八股文取士，使一般知識分子統把時間化在玄而又玄的八股文上，是一個大原因。到滿清，怕漢族的民族革命，更要利用八股文來作欺騙人民的工具，所以終清的一代，我們在天文學上卻沒有什麼創造。

（「科學通報」、二卷三期）

數學是我國人民所擅長的學科

華羅庚

一 句股各自乘，併之為弦實，開方除之，即弦也。



這圖形正是我先民所創造的，見諸記載的就有二千年以上的歷史了！當然這也是勞動人民的產物，用來定直角、算面積、測高深的。其創造當遠在記錄於書籍之前。我們古書所載還不僅此一特例，還更進一步的有：「句股各自乘，併之為弦實，開方除之，即弦也。」換成近代語：「直角三角形，夾直角兩邊的長的平方和，等於對直角的邊長的平方。」這就是西洋所羨稱的「畢達哥拉氏定理」。而這定理的敘述，卻較畢氏為早。

二 圓周率

談到圓周率，我們也有光榮的歷史，從一周三的記載是極古的。漢朝劉徽（紀元二六三時人）的割圓術，不但奠定了計算圓周率的基礎，同時，他也闡明了積分學上算長度，算面積的基礎。他用折線逐步地來接近曲線，用多角形來逐漸地接近曲線所包圍的圖形。他由圓內接六邊形、十二邊形、二十四邊形等；逐步平分，來計算圓周率。他算出的圓周率，是三·一四一六。在宋時（紀元四二九——五〇〇）祖冲之算得更精密，並且預示着漸近值論的萌芽。例如他証明圓周率在三·一四一五九二六與三·一四一五九二七之間。並且用 $\frac{22}{7}$ 及 $\frac{355}{113}$ 作疏率和密率。在近代漸近分數的研討之下，這兩個分數，正是現代所說的「最佳漸近分數」的前二項（下一項異常繁複）祖冲之的密率較德人奧托早了一千多年（奧托的記錄是一五七三年）。

三 大衍求一術

又名「物不數」、「鬼谷算」、「隔墻算」、「秦王暗點兵」、「物不知總」、「剪管術」、「韓信點兵」等等，歐美學者稱為「中國剩餘定理」。

問題敘述，「今有物不知其數，三三數之賸二，五五數之賸三，七七數之賸二，問物幾何」？

算法歌訣：「三人同行七十稀，
五樹梅花廿一枝，
七子團圓正月半，
除百零五便得知。」

算法：以三三數之的餘數乘七十，五五數之的餘數乘二十一，七七數之的餘數乘十五，總加之，減去一百〇五的倍數即得所求。例如：前設之題，二乘七十，加三乘二十一，再加二乘十五，總數是二百三十三，減去二百一十，得二十三。

這方法肇源於孫子算經（漢時書籍）較希臘丟番都氏為早。光大於秦九韶之數學九章（一二四七年）較歐洲大師歐拉（Euler, 1707—1783）拉格朗日（Tagrange, 1736—1813）高斯（Gauss, 1777—1855）約早五百年。同時秦九韶也發明了歐幾里得算法。

四 楊輝開方作法本源

1
1 1
1 2 1
1 3 3 1
1 4 6 4 1
1 5 10 10 5 1
1 6 15 20 15 6 1

這種三角形之構造法則，兩腰都是一。其中每數為其兩肩二數之和。此三角形是二項式定理的基本算法。這就是西方學者所稱的巴斯噶（Pascal, 1654）三角形。但根據西洋數學史家考証，最先發明者是阿批阿奴斯（Aplanus），時在一五二七年。但我國的楊輝（一二六一）朱世傑（一三〇三）及吳信民（一四五〇）都在阿氏之前，早發現了二百餘年。

五 秦九韶的方程論

大代數的和湼（Horner）氏法是解數值方程式的基本方法。是和湼氏在一八一九年所發明的。但如果查考一下我們的數學史不難發現在「議古根源」（約一〇八〇年）早已知道這方法的原理。中間經過劉益、賈憲的發展，到了秦九韶（一二四七）已有了完整的方法，比和湼早了五百七十二年，繼用此法的李冶（一二四八）朱世傑（一二九九）都比和湼早了五百多年。

（一九五一年二月十日人民日報）

特載

在北京第三屆人民代表會議上的講話

（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劉少奇

主席、各位代表！

首先，請讓我向北京市第三屆人民代表會議致以熱忱的敬禮和祝賀！

我們很感謝你們，感謝首都的人民！因爲中央人民政府各機關取得首都各界人民很多的幫助，所以它們能够在這裡安排下自己的辦公處並進行了一年多的工作。然而這也引起了首都人民一些困難，最顯著的就是房屋的困難。不少的人民已向我們提出了這種困難，我們也認爲應由政府與人民合作來逐步地解決這個問題，聽說你們的會議已對這個問題進行了討論，這是很好的。我想這個問題是能够逐步加以解決的。

北京市第三屆人民代表會議在它的民主化的基礎上比前兩屆是更進了一步的。代表的人數增加了，百分之八十三的代表是由人民選舉的，只有百分之十七的代表是經協商邀請的，其中只有百分之三的代表是代表政府的。首都的人民，由於有了過去兩年和兩屆人民代表會議的經驗，開始熟悉了他們中間的政治代表人物，所以他們進行這種選舉就已開始成爲可能。他們選舉代表的方式，在公營工廠企業和專科以上學校，是以生產或學校爲單位由選民大會直接選舉，而郊區農民及工商界、青年、婦女代表和區域代表，則由選民代表會議選舉。在選舉時，除開各學校因選民全部識字又有過多次選舉經驗採用了無記名投票而外，在其他地方，則在討論了候選名單之後，都是採用舉手表決的方式。我認爲這樣作是完全正確的和必要的。這樣，就使作爲北京人民民主政權主要組織形式的人民代表會議在組織基礎上更廣大、更密切地聯系了人民羣衆，在組織形式上也比以前兩屆更完備了一些。如果代表會議又討論了和解決了人民中間更多的問題，它所選舉的政府委員會和協商委員會又能忠實履行代表會議的決議，那末，我們就可以想像，它將在人民中更加提高自己的威信，它在人民民主政權的建設過程中就已前進了一大步。這是值得大家慶賀的。

我認爲不獨北京的人民代表會議應該如此，在其他地方，凡是條件業已具備了的，也應該如此地來召集人民代表會議。在人民已經有了相當組織的城市，在土地改革已經完成了的鄉村，人民已經開始能够選出自己的代表的時候，就應該不遲疑地讓人民直接地或間接地來選舉各級人民代表會議的代表。選舉的方式，也大體上可以採用北京的經驗。

說到選舉，有些人就常常想到「普遍、平等、直接、無記名投票」這句老口號。無疑問，過去在蔣介石反動的獨裁政權底下，提出這個宣傳口號去反對蔣介石的獨裁政權，那是有它的進步意義的。但是這個口號如果拿到今天新民主主義的政權底下要求立即實行，對於中國人民中目前的實際情況則是還不完全適合的，因而也是不能完全採用的。中國大多數人民，主要是勞動人民還不識字，過去沒有選舉的經驗，他們對於選舉的關心和積極性暫時也還不很充分，如果在這種情形下，就來普遍地登記選民，機械地劃定選區，按人口比例一律用無記名投票的辦法來直接選舉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根據我們過去在若干地區實行過的經驗，這樣的選舉反而是形式主義的，它給人民許多不必要的麻煩，損害人民的積極性，在實際上並不能使這樣選舉產生的人民代表大會具有更多的代表人民的性質，因而也就不能用這種辦法使今天的人民政權更加民主化，更加密切地聯系人民。資產階級的舊民主主義者是注重這一套形式主義的辦法的，他們也常常滿足於這一套形式，以便他們能够在選舉中加以操縱，假代表人民之名來實行資產階級專政之實。然而我們是新民主主義者，我們首先注重的不是這一套選舉的形式，而是它的實質，就是說，要使人民，主要使勞動人民眞能選舉他們所樂意選舉的人去代表自己，並要代表能忠實地把他們的意見和要求反映到政府中去。只要選舉能眞實地作到這一點，我們就不在選舉的方式上去斤斤計較，而儘可能地採用羣衆所熟悉的和便利的方式去進行選舉。北京的這種選舉方式，證明對於人民是便利的，是在目前可以採用的方式。「普遍、平等、直接，無記名投票」的選舉方式，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

還不能因而也不應該一下採用。這只有在各種準備工作均已做好，中國大多數的人民經過了相當長期的選舉訓練並大體識字之後，才能最後地完全地實行這種選舉方式，在最近的將來，我們還只能依據中國大多數人民中的實際情況，逐步地做好各種準備工作，並逐步地實行更加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或間接的、用舉手表決方式的選舉。對於被人民選舉出來的各級人民代表會議的代表，要責令他們經常地、密切地聯系自己的選民，向政府反映人民的要求和意見，並將政府的政策、人民代表會議的決議向人民作解釋。各級人民政府和協商委員會要建立專門的有能力的機關來適當處理每個人民向政府提出的要求，答覆人民的來信，並用方便的辦法接見人民。這樣，使各級人民政府密切地聯系人民，切實地爲人民服務，而廣大的人民也就可以經過各級人民代表會議和人民政府來管理自己的事務和國家的事務。這是我們在目前就能逐步地達到的。這樣，就能無限制地擴大各級人民代表會議和人民政府的代表性。

人民代表會議與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們國家的基本制度，是人民民主政權的最好的基本的組織形式，我們的國家就是人民代表會議與人民代表大會制的國家。目前的各級人民代表會議已在代行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在不久的將來，就要直接地過渡爲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各級人民政府，各民主黨派，各民主階級的人民，都應該依據共同綱領和中央人民政府頒佈的法令，按照各個地方實際可能的情況，積極地努力地把各級人民代表會議實際地而不只是形式地建立起來，使它在政治上和組織上更廣大更密切地聯系各民主階級的人民羣衆，在組織形式上也逐步地使它完備起來，使目前的各級人民代表會議能够在最近幾年內逐步地過渡爲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完全能够代表人民行使各級政權的人民代表大會。這樣，就能依靠人民代表會議與人民代表大會這一個有偉大功效的制度把全國人民緊密地團結在各級人民政府的週圍。在中央人民政府的統一領導之下，形成爲一個強大的統一的力量，去履行我們全國人民迫切需要履行的建設任務和國防任務。這樣，我們就沒有任何困難是不能克服的，也沒有任何任務不能完成。由毛澤東主席所製訂的完全適合中國目前國情的人民代表會議與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將保証我們國家和人民的長遠勝利。

新民主主義的人民代表會議與人民代表大會的國家制度，已經證明，在將來的歷史上還會要証明它是比任何舊民主主義的議會制度要無比優越的，對人民來講，它比舊民主主義的議會制度要更加民主一萬倍。

爲了在我們國家建立這種制度，並使這種制度儘可能迅速地成爲我們國家

從下至上的系統的經常的鞏固的制度，各級人民政府必須依照中央人民政府的法令和組織通則的規定經常定期地召集各級人民代表會議，根據各地經驗，這種人民代表會議在大城市每年至少應召集四次，中小城市應召集三次，省每年至少應召集一次，縣每年至少應召集兩次，區鄉可按規定召開。我說的是至少，當然還可以多開。經驗還証明：有十萬人口以上的城市應召集各城區和郊區的人民代表會議，以便處理人民中許多具體的在人民看來是很重要的問題，而這些問題常常是市人民代表會議和人民政府難於處理的，須由各區人民代表會議和區人民政府來處理。爲了保証各級人民代表會議能經常召開，各級人民政府應責成民政部門對下級政府加以督促，並規定日期要下級政府向自己作關於人民代表會議的報告。因爲有些政府工作人員是不大願意召開人民代表會議的，他們習慣於少數人包辦一切，而不習慣和人民的代表商量辦事，他們認爲召開人民代表會議『太麻煩』，他們藉口『工作太忙』，或又藉口『沒有事』，而不召開人民代表會議，對於這些人，必須由上級加以督促。否則，他們就不按規定時間召開人民代表會議。對於沒有充分理由而不按規定時間召開人民代表會議者，應給以批評以至處分。如有充分理由必須推遲召開者，亦須報告上級人民政府批准。如此，就能保証各級人民代表會議能經常定期召開。根據各地經驗，各級人民代表會議只要能够召開，就有好處，過去絕大多數都開得很好，對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好處。但也有少數開得不好或不大好的，然而也有一種好處，它可以暴露這些地方工作上的缺點和政府工作人員的官僚主義，它可以督促和教育這些地方的政府工作人員並引起上級的注意，因而就使這些地方的工作有可能獲得轉變。因此，各級人民代表會議不論有事無事都應按期召開，『工作太多』更應召開，以便動員更多的人民和團結人民中的積極分子把這些所謂太多的工作分頭地去作好。所以除非是有某些緊急情況發生使我們不能不暫時改變經常的工作方式，得暫時推遲人民代表會議的召開而外，在一切通常的情況下，均必須遵守我們國家這項重要的制度，按期召開各級人民代表會議。要使各級人民代表會議（在土地改革的鄉區是農民代表會議）成爲各級人民政府一切工作和一切活動的中心環節。各級人民政府的一切工作和一切活動應向各級人民代表會議作報告，並接受其質詢和審議，重要的工作和活動還須預先經過人民代表會議的討論和決議，然後大家團結一致地去加以執行。

此外，還請各位注意到：北京人民民主政權更加走向民主化，是在軍事管制的條件之下進行的。有些人覺得：既要實行軍事管制就不應或不能實行民主

。或者說：國家處在軍事時期，就不能實行民主。他們把人民解放軍的軍事管制與人民民主政治的實行和發展看作是絕對對立、彼此不相容的東西。這種觀點是完全錯誤的。中國今天還是處在軍事時期，戰爭還在一些地方實際地進行着，全國也還在軍事管制時期，然而我們在全國各地又正在很好地實行着民主，按期召開各級人民代表會議，並要進行各級人民代表會議的選舉，把國家的和地方的各種政策交給人民和人民的代表會議去作充分的討論和決定。一方面，戰爭和軍事管制並沒有妨害人民實行民主，另一方面，人民實行民主也並沒有妨害戰爭和軍事管制。相反，它們二者倒是相互幫助，相互加強的。這是什麼緣故呢？這是因為我們的軍事管制是人民的軍事管制。人民解放軍本身就是人民的軍隊，人民解放軍的軍事管制對於敵人和反動派來說，它是無情的公開的軍事專政，對於人民來說，它就是意味着人民的民主。它對於人民不獨不會有什麼束縛和不方便，相反，它保護人民，替人民解除舊勢力的壓迫和束縛，給人民極大的方便，鼓舞人民起來作主人，把自己的和國家的命運操在自己手中，由他們自己來管理自己的事務和國家的事務。毛澤東主席在論人民民主專政的文章上說：人民民主專政有兩個方面，即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人民解放軍的軍事管制就是最初的人民民主專政，它強力地鎮壓反動派，它同時竭盡一切方法保衛、鼓勵和幫助人民建立各級人民代表會議和人民政府，並且在條件成熟時逐步地把權力移交給各級人民政府機關。在反革命已經肅清，土地改革已經完結，人民大多數已有組織，各級人民代表會議和人民政府已能完全履行自己的職權，那時，軍事管制就自然地成為不必要了，它的一切權力也就自然而然地為各級人民政府所代替了。所以我們的軍事管制不獨不妨害各級人民代表會議的召集，相反，它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要召集各級人民代表會議，建立各級人民政權。所以藉口軍事管制或軍事時期而不召開人民代表會議的說法，是不對的。

經濟建設現已成為我們國家和人民的中心任務。但是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建設必須有新民主主義的政權來領導和保障，沒有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就不能有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即不能有以社會主義的國營經濟為領導的五種經濟成份相結合的經濟。這也是我們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區別於過去資產階級革命的一個顯著特點。在資產階級革命即資產階級政權建立以前，就存在着並發展着資本主義經濟，但是以社會主義的國營經濟為領導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就只有在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政權建立之後，才能加以組織並使之發展。新民主主義的政權建設，人民民主政權的發展，我們國家的民主化，和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建設，人民經濟事業的發展，我們國家的工業化，是不能分離的。沒有我們國家的民主化，沒有新民主主義的政權的發展，就不能保障新民主主義的經濟發展和國家的工業化。反過來，新民主主義的經濟發展和國家的工業化，又要大大地加強和鞏固新民主主義政權的基礎。因此，我們的基本口號是：民主化與工業化！在我們這裡，民主化與工業化是不能分離的。自由和富強的新中國萬歲！人民代表會議與人民代表大會的國家制度萬歲！

（原載三月十三日人民日報）

本刊三卷六期要目

「實踐論」開闢了我們學術革命的思想道路　人民日報社論

專著

新哲學研究的方向　潘梓年

學習「實踐論」

「實踐論」解說　李達
「實踐論」的認識　王亞南
「實踐論」——馬列主義底發展與中國哲學傳統問題底解決　馮友蘭
「實踐論」——中國思想史（知行關係）的科學總結　侯外廬

凱恩斯主義批判　陶大鏞
實用主義批判　陳元暉
姓與氏　丁山
關於編寫與講授本國史的指導原則（下）　尚鉞
意識狀態試論　黃葯眠

譯文

新編「哲學史」　王子野譯
關於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書評）　彭澤益

新建設第三卷分類總目錄

新建設月刊發刊辭 (一·四)

論著·譯文

·哲　學·

關於幾個哲學問題 艾思奇(一·九)
康德哲學批判 鄭　昕(三·三)
從「新理學底自我檢討」說到新哲學底區別 馮友蘭(三·三四)
韓非思想探微 楊榮國(四·二九)
新哲學研究的方向 潘梓年(六·六)
實用主義批判 陳元暉(六·三六)
新編「哲學史」(一) 蘇聯科學院哲學研究院 王子野譯(五·七七)
新編「哲學史」(二) 蘇聯科學院哲學研究院 王子野譯(六·九九)

·學習實踐論·

實踐論 毛澤東(五·四)
學習「實踐論」，提高新中國的學術水平 社　論(五·二)
「實踐論」——毛澤東思想的哲學基礎 李　達(五·三)
「實踐論」開闢了我們學術革命的思想道路 人民日報社論(六·四)
「實踐論」解說 李　達(六·八)
「實踐論」的認識 王亞南(六·六)
「實踐論」——馬列主義底發展與中國哲學傳統問題底解決 馮友蘭(六·一九)
「實踐論」——中國思想史(知行關係)的科學總結 侯外廬(六·二七)

·史　學·

金田起義一百週年紀念 范文瀾(一·五)
百年前人民的武裝組織——太平軍 劉桂五(一·七)
太平天國革命人民如何對付外國侵略者 王　忠(一·二五)
歷史學在社會科學中的地位 徐特立(二·三)
怎樣研究中國歷史 翦伯贊(二·四)
關於整理近代史料的幾個問題 金毓黻(二·八)
魏晉玄學的社會意義——黨性 侯外廬(二·二六)
明代蘇、松、常三府人民反官僚地主的鬥爭 丁　易(二·三六)
中國與朝鮮的歷史關係 周一良(三·二五)
從甲午中日戰爭說起 宋雲彬(三·三一)
論三國時代劉孫聯合抗曹的得失 何幹之(四·三五)
五十年前台灣人民抗日游擊戰爭 繆楚黃(四·四二)
論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歷史地位 華　崗(五·二三)
關於編寫與講授本國史的指導原則(上) 尚　鉞(五·三〇)
關於編寫與講授本國史的指導原則(下) 尚　鉞(六·四五)
論中國父權社會對於男權的抑制 潘光旦(五·四二)
奴隸社會意識形態的研究 周谷城(五·四四)
姓與氏 丁　山(六·四三)
「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的起源」序 聯共(布)馬恩列學院 陳其人譯(四·五九)

·經　濟·

學習政治經濟學的目的與方法 王學文(一·一九)
馬克思的週期恐慌學說 樊　弘(一·二七)
資本主義各國勞動人民的貧窮化 沈志遠(一·三四)
論「新解放區農業稅條例」 千家駒(一·三九)
蘇美兩國的社會經濟制度及其世界政策 王亞南(三·八)
現階段土地改革的理論分析 朱劍農(三·三〇)
論腐朽的垂死的美帝國主義 沈志遠(三·八)
新民主主義經濟第一年 孫曉邨(四·一三)
論人民經濟的價值法則 許滌新(四·二〇)
人民租稅綜論 周伯棣(五·三四)
剩餘價值說與馬列主義經濟學 王　台(五·三九)
凱恩斯主義批判 陶大鏞(六·三一)
論商品與貨幣(上) 英·J·伊頓等著 吳恩裕譯(一·六二)
論商品與貨幣(下) 英·J·伊頓等著 吳恩裕譯(二·五四)

·政　治·

東方的和平是不可分割的 社　論(二·四)
十月革命與蘇聯和平政策 柯柏年(二·五)
粉碎美帝侵略，爭取持久和平！ 社　論(三·四)
美國政體的特性與現政府的軍事冒險性 張志讓(三·五)
美帝的世界擴張政策與聯合國 梁純夫(三·一三)
美帝發動侵朝戰爭後的西歐局勢 范承祥(三·一八)
論中國人民的統一 嚴景耀(三·二〇)
人民民主建政 謝覺哉(五·一六)

·法　學·

肅清舊法學底影響 何思敬(一·四三)
國際法與侵略戰爭 梅汝璈(一·四八)
從犯罪分類上談肅清舊刑法觀點 王紀新(五·二〇)

·文化教育·

新中國文化建設的基本方針 何幹之(一·六六)
迎接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建設高潮(新年筆談) 張奚若等(四·四)
中國文化之生成及其發展 嵇文甫(四·二三)
關於書的幾個問題 向　達(四·五二)

·文　藝·

關於中國原始藝術的發展 常任俠(三·四一)
「嘎達梅林」和「阿那爾漢的歌聲」 臧克家(三·四四)
論文藝上的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 王淑明(三·三七)
美術遺產漫談 徐悲鴻(三·四〇)
語言學家的新任務 季羨林(四·四八)
意識狀態試論 黃藥眠(六·四八)
生產爲藝術的基礎 美·L·哈拉普著 朱光潛譯(一·六六)
朝鮮解放後的新文學運動 朝鮮·金達壽作 陳秋帆譯(四·六一)

·科　學·

向蘇聯學習科學普及工作的經驗 袁翰青(一·五九)
科學和宗教 蘇Б·A·伯格達諾夫 周邦立譯(三·三〇)
關於生物學(上) 恩格斯原著 曹葆華·于光遠譯(三·五六)
關於生物學(下) 恩格斯原著 曹葆華·于光遠譯(四·六四)
愛因斯坦的新理論 波蘭·L·印菲爾德作 皖　泰譯(五·五七)

座談記錄

討論日丹諾夫關於亞歷山大洛夫西方哲學史的發言 中國新哲學研究會(一·七五)

紀念太平天國起義一百週年　中國新史學研究會　新建設雜誌社(二·九八)
帝國主義與侵略戰爭　中國新經濟學研究會　新建設雜誌社(三·四一)

學術討論

資本主義經濟週期性危機的原因　季陶達　樊弘(三·五〇)
論國際法中的世界主義思想　林欣　梅汝璈(三·三三)
太平天國起義百年紀念日期的攷證　羅爾綱(四·五五)
黨性、階級性、個性和民族性　莊本先　賀麟(四·五七)
論對於殷代史材的研究態度　楊紹萱(五·四二)
關於「馬克思的週期恐慌學說」　蔣學模　樊弘(五·四九)
關於「希臘時代的藝術爲什麼會比資本主義時代進步」　朱光潛　常任俠(五·五二)
關於「怎樣研究中國歷史」　劉晴　翦伯贊(六·五〇)
中國山水畫的發展和成就　楊竹民　徐悲鴻(六·五五)

書　評

關於「米邱林選集」——附米邱林年譜　英·A·G·莫頓著　舒貽上譯(一·七九)
美帝國主義對華政策的崩潰——評陳伯達著「中國四大家族」和「人民公敵蔣介石」　蘇·Д·查普拉夫斯基　茹曾譯(二·六五)
對呂著簡明中國通史隋代部份的幾點意見　羅元鯤　高振鐸(二·六七)
論蘇維埃大百科全書第二版　蘇·И·開洛夫著　仲英譯(三·五九)
評吳澤編「近代合作思想史」　周明星(三·六十)
評一本美帝的世界歷史教科書　謝璉造(四·七一)
評劉大年著美國侵華史　李光霖(五·六七)
關於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上)　彭澤益(六·七〇)

學術文摘

論蘇聯哲學中的世界主義理論　蘇·M·B·米丁(一·八四)
「新理學」底自我批判　馮友蘭(二·七三)
杜威批判引論　曹孚(四·七四)
中國奴隸社會　郭沫若(一·八三)
論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的原因　范文瀾(三·七〇)
中國古代的封建社會　翦伯贊(四·七五)
中國古代史的劃階段問題　П·Б·西英洛夫斯卡雅(六·七六)
馬列主義與新民主主義社會經濟形態　王亞南(一·八三)
論凱恩斯學說　美·W·Z·福斯特(一·八九)
論社會主義經濟中的價值律　沈志遠(三·七三)
由「實踐論」說到經濟工作　王學文(六·七三)
從經濟看美國政治　陳翰笙(六·七四)
十月社會主義革命與中國革命　陳伯達(二·七一)
學習蘇聯的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　艾思奇(三·七〇)
美國對華侵略的作風和路線　邵循正(五·七二)
論斯大林所論「馬克思主義在語言學中的問題」在中國文字改革運動中的問題　黎錦熙(三·七一)
文學與政治　蘇·И·列蘇乙夫斯基(一·八九)
論民歌　何其芳(五·七二)
人類學上唯物論對唯心論的鬥爭　蘇·M·C·普利斜茨基(四·七六)
受了歪曲的亞洲大陸　李四光(五·七〇)

學術問答

·哲　學·

形式邏輯與唯物辯證法有那些根本的區別？我們今天還有研究形式邏輯的必要嗎？(馬特答)(二·四七)
新康德主義與康德主義有何不同？它的反動性表現在那些地方？(鄧昕答)(三·六三)
我們說，在黑格爾上，辯證法是倒立着的，必須把它顛過來，然後才能在神秘的外殼中，發現合理的核，這究竟是什麼道理呢？(馬特答)(五·六六)

·史　學·

田中義一奏章的主要內容是什麼？所謂大陸政策爲什麼是侵華的政策？它和今天美帝的侵華政策有沒有本質上的不同？(尙鉞答)(三·六四)

·經　濟·

中國的農業稅和蘇聯實行新經濟政策初期的糧食稅有沒有什麼不同？今天中國和當時蘇聯的情況是不是有些類似？(千家駒答)(二·四八)
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爲什麼一定會發動侵略戰爭？我們說帝國主義是垂死的資本主義，這有些什麼根據呢？資本主義總危機和一般的經濟危機有沒有不同？(千其答)(四·六九)
資本主義國家是否可以實行計劃經濟以避免經濟危機？(季陶達答)(五·六五)

·政　治·

資本主義國家的貨幣政策與人民民主國家的貨幣政策在本質上有什麼不同？一九五〇年波蘭的貨幣改革與蘇聯廣布改爲金本位有無相同之點？(王烈望答)(六·六七)
世界主義的具體內容是什麼？什麼是世界主義的社會基礎？它與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有何不同？它是否有着明顯的反蘇傾向？(馬特答)(五·六二)
什麼是聯合國憲章的基本精神？聯合國組織與戰前的國際聯盟有沒有不同？聯合國是否也會重蹈國際聯盟的覆轍？(梁純夫答)(六·六四)

·法　學·

國際公法和國際私法的基本內容，有那些不同？當一個國家違反國際公法的時候，誰來執行國際公法上的規定呢？(李浩培答)(一·四八)
法、法律、法權的含義各如何？法律與法權二者是否可以混用？國家與國度兩者有何區別？(李浩培答)(六·六八)

·文　化·

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建設和舊民主主義的文化建設有那些最根本的不同？爲什麼說文化的普及和提高是不可分的？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究竟應該怎樣普及和怎樣提高呢？(何幹之答)(五·六五)

·文　藝·

古代藝術的起源是怎樣的？希臘時代的藝爲什麼會比資本主義時代進步？(常任俠答)(四·七〇)
馬爾的語言學，自稱是「唯物主義的」，他的內容是怎樣的？主要的錯誤在那裏？(王輔世答)(六·六八)

·科　學·

古生物和今生物之間的關係是怎樣的？生物是怎樣由簡單進化到複雜的？所謂「從猿到人」，意思是說人是從猿演變而來，試問現在某一種猿，將來是否也可以演化成人呢？(楊鍾健答)(四·六八)

學術簡訊

科學院編譯局

統一科學名詞工作近況

中央人民政府文教委員會，爲了適應各方面的迫切需要，特於去年五月間制定「統一學術名詞工作的初步方案」。成立學術名詞統一工作委員會，下設自然科學、社會科學、醫藥衛生、時事、文學藝術等五組。中國科學院編譯局根據這個方案，担任自然科學組各科學術名詞的審訂工作。截至目前爲止，所審訂的科學名詞，已經文委批准付印的有：動物植物中文命名原則試用方案，化學物質命名原則，天文學名詞等三種。在審查及整理中者：有物理學、化學、地質學等十六種。在編訂中者有脊椎動物分類學、無脊椎動物分類學等九種。

南京博物院發掘古墓

祖堂山下發現南唐陵寢

國立南京博物院在去年受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委託，清理江寧縣祖堂山下被盜古墓。該院於去年十月六日組成田野工作團開始工作，現已告一段落。總計清理了兩座古墓，據出土文物証明，是南唐烈祖李昪。和中主李璟的陵寢，距今已有千年。兩墓的建築均甚宏偉，都分成前、中、後三室，各室兩側並附有安置殉葬明器的便房。墓室四壁的斗拱和樑柱，原均施以彩繪，但因被早期盜掘所遺的淤土浸潰日久，大部分已模糊不清，只李昪陵前室的彩畫還大致完整。

方俊鑫研究高眞空

獲得初步成就

上海國立交通大學助敎方俊鑫，經過八個月精心鑽研，把一部擱置十五年的眞空抽氣機重新裝置起來，又以原有零件裝成一具可拆金屬X光管，克服了敎學上的困難，現正準備把眞空系統實際應用到封閉X光管和高眞空電子管的修理工作上去，幫助國家解決有關修理技術的問題。

交大爲了繼續發展這一研究工作，由物理系和電機系成立了電子管研究工作委員會，並且得到華東敎育部的鼓勵和協助。

蘇聯部長會議頒發

一九五〇年斯大林獎金

綜合塔斯社莫斯科消息：三月十五日各報刊載了蘇聯部長會議關於頒發一九五〇年科學方面斯大林獎金的決定。對於在物理、數學、化學、地質學、地理學、生物學、醫學、語言學等方面有卓越成績的科學家，已頒發了八十二個斯大林獎金。

十六日各報繼續刊載了蘇聯部長會議關於頒發一九五〇年發明與改進生產方法方面的斯大林獎金的決定。在機器製造方面的有五十九個，在精密儀器製造方面的有三十二個，在冶金方面的有二十九個，在勘查及開採有用礦物方面的有十九個，在化學和化學工業方面的有二十個，在動力發展方面的有十八個，在建築工程方面的有三十二個，在運輸及電訊方面的有二十八個，在農業方面的有四十九個，在輕工業和食品工業方面的有十三個，在醫藥方面的有十一個。

各報於十七日刊載了榮獲一九五〇年文學與藝術方面斯大林獎金的得獎人名單。對於小說、詩歌、戲劇、電影、音樂、繪畫、雕塑及建築等方面的卓越作品及表演，共頒發了一百七十三個斯大林獎金。

波蘭出版大批馬列主義書籍

一九五〇年內，波蘭『書籍與知識』出版局已將列寧全集和斯大林全集出版到第五卷。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一卷也用波蘭文出版了。還有馬克思主義的三十四種古典作品是以『學習聯共（布）黨史輔助讀物』爲題而出版的。『書籍與知識』出版局馬克思主義文獻部印行了一百二十種書，共計七百多萬册。波蘭勞動人民對書籍的要求驟增，每天出版三——四種新書，還供不應求。

芬蘭出版『資本論』第二卷

在芬蘭已經以芬蘭文出版了『資本論』第二卷，本書出版之日，芬蘭共產黨召集了一個會議，由留埃麥和勒亨分別作了『論馬克思「資本論」第二卷對工人運動的意義』、『作爲科學世界觀看的馬克思主義』兩篇報告。

美國進步作家法斯特新作

一九五〇年美國進步作家H·法斯特出版了兩本著作：「文學與現實」對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內的進步文學提出了具有頭等重要性的、首先是創作方法上的問題。法斯特指出，生活本身的邏輯迫使資本主義世界中稍具眼光的作家去尋找一種新的、有效的創作方法，以便更爲正確，更爲深刻地描寫客觀現實及其發展，並積極地影響事件發生的過程，加速新事物對舊事物鬥爭的勝利。這就是蘇聯文藝中所廣泛倡導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另一部作品是以美國獨立運動爲題材的歷史小說——「驕傲的自由的人們」。它揭示了美國革命中各個不同階級——家奴與大地主，黑人士兵與奴隸佔有者，手工業工人與投機商——的不同要求與希望。法斯特所表現的主題是：普通人民的希望與理想，遠遠超過了資產階級革命的範圍。

日本第二屆學術會議

日本第二屆學術會議（即日本科學界全國最高會議）已在一月二十日在東京開幕。代表的成份比第一屆學術會議進步得多，在大會上，代表們慷慨陳詞，大聲疾呼，並通過擁護世界和平，要求對日全面媾和反對重新武裝日本的議決案。

北京市軍管會登記新字二一九號
北京郵政管理局登記執照第九號

新華書店期刊預定價目表

刊物名稱	刊期	單價	預訂期數	三月訂價	預訂期數	半年訂價	預訂期數	全年訂價
爭取持久和平 爭取人民民主	週刊	1,000元	12	12,000元	26	26,000元	52	52,000元
時事手册	半月刊	500元	6	3,000元	12	6,000元	24	12,000元
世界知識	週刊	1,600元	12	19,200元	24	38,400元	48	76,800元
新觀察	半月刊	2,400元	6	14,400元	12	28,800元	24	57,600元
新華月報	月刊	11,200元	3	33,600元	6	67,200元	12	134,400元
新中國婦女	月刊	2,100元	3	6,300元	6	12,600元	12	25,200元
中蘇友好	半月刊	2,800元	6	16,800元	12	33,600元	24	67,200元
新建設	月刊	4,000元	3	12,000元	6	24,000元	12	48,000元
翻譯通報	月刊	2,800元	3	8,400元	6	16,800元	12	33,600元
科學通報	月刊	6,000元	3	18,000元	6	36,000元	12	72,000元
中國科學	季刊 道林紙 報紙	48,000元 24,000元		不訂	2 2	96,000元 48,000元	4 4	192,000元 96,000元
人民教育	月刊	2,800元	3	8,400元	6	16,800元	12	33,600元
人民文學	月刊	4,600元	3	13,800元	6	27,600元	12	55,200元
文藝報	半月刊	1,800元	6	10,800元	12	21,600元	24	43,200元
說說唱唱	月刊	1,200元	3	36,000元	6	7,200元	12	14,400元
攝影工作	雙月刊	4,000元		不訂	3	12,000元	6	24,000元
人民音樂	月刊	3,400元	3	10,200元	6	20,400元	12	40,800元
中國農業研究	季刊	10,000元		不訂	2	20,000元	4	40,000元
農業科學通訊	月刊	2,400元	3	7,200元	6	14,400元	12	28,800元
蘇聯農業科學	雙月刊	2,400元		不訂	3	7,200元	6	14,400元
中國輕工業	月刊	3,200元	3	9,600元	6	19,200元	12	38,400元
中國紡織	月刊	4,800元	3	14,400元	6	28,800元	12	57,600元
人民交通	月刊	4,000元	3	12,000元	6	24,400元	12	48,000元

歡迎長期訂閱　地址：北京和外延壽寺街新華書店總店期刊訂閱科

新建設 月刊
第四卷・第一期

負責人　費　青

編輯委員（以姓氏筆劃爲序）
千家駒　向　達　•沈志遠
•吳　晗　狄超白　李廣田
金岳霖　范文瀾　•胡　繩
袁翰青　孫曉邨　•陶大鏞
•費　青　費孝通　•張志讓
•傅彬然　聞家駟　雷潔瓊
樊　弘　•鄭　昕　潘靜遠
錢偉長　錢端升　儲安平
鍾濳九　•謝覺哉　嚴景耀
（有•者，爲常務編輯委員）

出版者　新建設雜誌社
地址：北京東華門南夾道六十二號
電話：（五）五九六六
上海辦事處：上海延安東路中匯大樓六一八室

總經售　新華書店
定價人民幣四千元

訂閱：
三個月三期　一萬二千元
半年六期　二萬四千元
全年十二期　四萬八千元
平寄郵費免收　掛號郵費另加

本刊每月一日出版
定價人民幣四千元